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Marxism of a New Era



Christian Wagner

Peking - 2024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

本作品已通过人工智能从德语翻译成中文，可能仍然存在各种翻译错误。出版社将需要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完整的校对和出版。这第一版是对我们后现代时代悲剧性发展的必要且紧急的回应。

Christian Wagner
Peking 2024

© 2024 Christian Wagner, 北京。部分权利保留。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因此允许自由传播，并可为非商业目的完整或部分使用，前提是必须注明作者。未经作者明确书面许可及未签订合作协议，严禁将本作品用于商业目的。

本书中提到的所有商标、产品名称、标志和注册商标均为各自所有者的财产。使用这些名称、标志和商标仅用于识别目的，并不意味着得到各自所有者的支持。

本书为第一版，未通过出版社和正式印刷发布。出版社和专业印刷以及最终校订将在未来的第二版中进行。

如有问题、建议或个人联系需求，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christian.wagner.kontakt@gmail.com 直接联系作者克里斯蒂安·瓦格纳

前言

我撰写这部作品，是因为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传统结构正在瓦解，新的力量正在登上全球舞台。多极世界秩序已成为现实，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变革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但其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仍然存在着深刻的误解——甚至在那些全球范围内信奉共产主义的人群中也是如此。因此，这部作品旨在弥补这一知识空白，并从根本上消除这些误解。这部作品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它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逐步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可以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它为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并展示了有效解决全球冲突的途径。

中国并不寻求将其意识形态强加于其他国家，而是采取了一种尊重各国独立和主权的方式。这个已被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对世界许多人来说还不为人知，但在本书中被作为一种可以灵活应用于各种社会结构的模型进行介绍，而无需进行激进的制度变革。相反，它促进了结构、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它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分析工具，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引入的背景下，展示了如何创建一个和谐而公正的世界秩序。此外，这部作品还深入分析了塑造我们偏见和错误行为的心理机制。它将马克思主义定位为与法西斯主义——理想主义最高形式——相对立的关键力量。通过研究社会工程、再语境化和宣传的策略，本书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应对当前的挑战，还能够保护人类免受理想化和脱离现实的危险。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种分析；它回答了“中国的目标是什么”这一问题。它是一种邀请，邀请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世界，并铺就通向未来的道路，在这个未来中，和平、正义和全球合作将成为核心。它展示了如何以人为本，最有效地为世界各国人民服务。这就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致谢

我要感谢多年来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所有人，特别是我的家人，他们常常为我的安危担忧。对我而言，目标一直比积累个人财富或关注生活中的琐事更为重要。我感谢那些过去十年来每天与我并肩作战的德国同志们。同时，我也感谢过去几年来自中国、蒙古、孟加拉国、卡塔尔、韩国、日本、尼泊尔、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朋友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成长和知识积累的重要支柱，而这些知识我始终用来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学习的天才。你们的热情在我心中回响，成为你们的映照。我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和中国的其他同志们，正是他们让我得以开展田野研究，帮助我进行翻译并与普通民众交流，并始终相信我，相信我能将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架起沟通的桥梁。

“没有真理，只有信息。以及编程的艺术”

- Christian Wagner



目录

第一章	1
1.1. 真理.....	2
1.2. 社会工程学.....	7
1.3. 西方意识形态社会.....	13
1.4. 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发现.....	18
1.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思维构建.....	24
第2章	28
2.1. 通过历史理解主观真理.....	29
2.2. 中日战争与朝鲜的历史背景（1894-1945）.....	30
2.3.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33
2.4. 悲惨的战后时期与中国的开放.....	38
2.4.1. 国内的挑战	39
2.4.2. 外部的挑战	40
2.4.2.1 朝鲜战争.....	40
2.4.2.2. 台湾.....	44
2.4.2.3. 与苏联的决裂.....	45
2.4.2.4. 越南战争.....	45
2.5. 开放时代与和平时代.....	46
2.5.1. 与国际机构的合作	47
2.5.2. 双边合作与投资	48
2.5.3. 学术合作	50
2.5.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与中国省份的角色	50
2.5.1.1. 中国的自治区和少数民族.....	51
2.5.1.2. 特别行政区（SAR）.....	52
2.5.1.3. 特殊经济区（SEZ）.....	52
2.5.5. 社会不平等与腐败	53
2.6. 中国过去的痕迹留在人们的骨子里.....	53
第3章	55

3.1. 重新语境化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56
3.2. 西方自由主义作为“共产主义”	62
3.2.1. 西方的“新左派”	62
3.2.2 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语境化	65
3.2.3. 法西斯无政府主义主导着当今西方的民主结构 ..	69
3.3.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	71
3.4.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	72
3.5. 非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73
3.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思想.....	74
第4章	78
4.1. 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领导的角色.....	79
4.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79
4.3. 邓小平：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开放中国.....	83
4.4.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85
4.4.1. 民主集中制与新的集体民主	86
4.4.2. 通过专业性实现言论自由和讨论文化	89
4.4.3. 促进文化与自然的和谐	90
4.4.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的“看不见的手”	91
4.4.5. 学术发展与青年	93
4.4.6. 各阶级共同打击敌人：贫困	97
4.4.7.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99
4.5. 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107
4.5.1. 内部现代化.....	108
4.5.1.1. 向未来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109
4.5.1.2. 高新技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110
4.5.1.3. 融资与金融基础设施.....	112
4.5.1.4. 以人为本的发展与自然和谐.....	113
4.5.2. 第二次对外开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115
4.5.2.1. 正确处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117
4.5.2.2. 新丝绸之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	118
4.5.2.3. 中国的第二次开放作为现代化改革.....	122

第五章	124
5.1 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利益的核心...	126
5.1.1. 意识形态比帮助残疾人更重要	127
5.1.2 阻碍脱贫与新疆的未来前景	130
5.2 主观真理、重新语境化与缺乏能力.....	132
5.3. 正确处理与西方的矛盾.....	137
第六章	141
6.1. 关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正确应用.....	142
6.2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145

第一章

“人只能看到自己知道的东西。”

-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810 年

要理解这部作品，你需要准备好在心中和头脑中摒弃所有曾经被灌输的基础和信息。让旧有的知识在寂静中沉睡，敞开心扉迎接新时代的全新事物。

1.1. 真理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事实？在关于真理的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能被量化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也许只能用概率来表示。天空再蓝，空气中总会有微量的水分，这些水分本质上就是云朵的存在，只是我们看不见它们。然而，比起概率的表达，真理更像是每个人眼中的一面镜子，因人而异。当你观察一颗钻石时，它会根据观察角度的不同，展现出各自的美丽。而这还取决于光线、入射角度、观察者的眼睛，最重要的是观察者的情感反应，即这颗钻石是否美丽，或者说它的美丽程度如何。因此，不同个体之间有着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观察角度、不同的光线和不同的情感尺度。

谈论真理时，情况也是如此。每个个体从不同的机械视角来看待事物。对一个人来说是事实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并非如此。对一个人来说是绝对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只是高价值的一端，但未必是绝对的。此外，还有个体的经验和知识。健康的常识和逻辑的工具也参与其中，帮助理解基本要素和事实。没有逻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处理信息，人就会变得愚蠢。愚蠢的人会简化真理，忽略那些更接近真理的因素。因此，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概率和尺度基础上的信息集合，是个体提供给自己的事实。然而，个体是什么？处理哪些尺度和信息，才能展现出真理？

在个体的经验和知识之外，还有社会的经验和知识，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创造出一种真理。然而，社会的信息流又可以像个体一样分成不同的社会形式，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性。问题在于，这些经验和知识究竟基于什么。因此，经济和文化因素在定义真理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脑的构造以及通过逻辑分析情境的方式，在此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关键要素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了每个人自己的“真理”。

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社会里，每天食用辛辣食物，个体和整个社会的味觉感官在口腔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迟钝。辛辣食物

的尺度会降低。如果一个来自欧洲的人到中国，吃到标注为“不辣”的食物，仍然会觉得辣。因此，中国人的辛辣尺度较高，而欧洲人的较低。那么，问题就来了，应该根据哪种真理来定义食物的辣度？是欧洲标准？还是中国标准？需要根据个案来衡量辣度的具体百分比和数值。然而，这是否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做到呢？或者说，通过重复、信息传递和普遍感知的相对真理，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真理？当中国人前往欧洲时，觉得食物淡而无味，是否意味着所有欧洲人都应该改变饮食，因为中国标准是绝对真理？答案显而易见。

因此，完全不同的文化视角在定义真理的机械和客观因素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真理没有唯一的标准。人类可以被视作生物机器，虽然具有人类的心灵和灵魂。当人类创造机器时，机器会根据收到的信息工作，将其转化为不同的电压值、数字和事实，并加以处理。当测量到干扰值时，机器的真理和精度也会变得不准确。因此，人类通过所接收到的信息来生活、讨论和理解。讨论、媒体以及教育水平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是所有处理过的数据和信息的社会核心要素之一，用于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精确化真理，并构建社会集体的互动形式。

另一个关于信息处理的例子可以在宗教讨论中找到，比如关于伊斯兰教的讨论。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但也是最具争议的。每个曾经对伊斯兰教持批评态度的人都会问自己：是否曾亲自阅读过《古兰经》、深入研究或探讨过学术性讨论，能够因此参与有关伊斯兰教及其发展问题的专业辩论？或者人们头脑中的信息是否已经是被他人处理过的，评论过的，甚至分析过的？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就转向了那些进行分析的人，他们是否具备真正的能力和素质来完成这些分析？当谈论到中国时，当专家被征询意见时，同样的问题再次浮现：这些专家具有什么核心能力来恰当地评估和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或政客是否能够在从未踏足中国、从未研究或了解中国人民的情况下评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发展？

这里关注的不是利益，而是个体和整个社会的信息、交流与信息处理。如果一个社会和个体使用不同的工具进行分析，那么他们将发现不同的真理。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真理会导致误解。当讨论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时，当讨论中国的专业知识时，当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往往已经存在一种基础性的误判行为。每个文化中的信息在人的头脑中已经被错误分析了。无论真理多么准确，这些围绕中国的发展的基本测量值和标准都有严重的真理误差。真理误差自动导致误解、误读，从而导致错误的结果。错误的结果进一步引发经济和政治的脱钩与对抗。

然而，各国的历史在形成真理的视角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真理不仅仅是基于当前感知的客观或机械反应。相反，历史事件以及至今的社会发展都是时间相关的，且在未来的概率上，每个事件都有自己独特的衡量标准，并通过它们的总和得出真理的结论。这类似于一个数学的加总游戏，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得出一个总结果，即真理。真理是一种工具，用来推进全人类的进步，实现合作而非对抗。真理与人类的基本道德相结合，如对生命的尊重、不杀生，以及纪律和法律，从而促成了和谐的共处。

回到历史。单个历史因素对于发现社会价值标准以及展示理解至关重要。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记忆文化。这种记忆文化和信息基础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外交行为。当词汇如“独裁”被使用时，德意志民族在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独裁记忆会立即被纳入主观的真理中，成为一个因素。这种情感可能会完全掩盖德国社会中的客观或实际真理。例如，在英国，君主被称为君主，而不是独裁者。君主并没有像独裁者那样的主观情感，尽管从客观上看，两者可能具有相同的独特特权或特性。假设两个国家 X 和 Y 分别由一个王室和一个独裁者统治，两者在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完全相同。然而，仅仅因为其中一个被称为独裁者，就足以使德国的讨论中将该独裁者与阿道夫·希特勒的残酷个性等同起来。媒体、教育和信息中心，以及专家们都依赖于这样的用词来工作。每个

用词都会在社会中激发情感，并在每个人中形成新的真理，而无需深入探讨客观事实和深度分析。

随着客观或专业信息的缺乏，主观真理越来越占据上风。这可以比作一架天平——正义女神的天平。使用越多的客观和中立的事实或不带情感的词汇，主观和情感的真理在文化和历史中的影响力就越小。然而，如果一个从未关注过中国的普通人，比如一个住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突然通过媒体和现有的教育系统与大量情感用语联系在一起，他的主观和感知的真理就会超越实际的真理，模糊他的认知。因此，这种真理也是一种真理。这是那位生物学家的真理，但这也是中国人的真理吗？一个在中国生活和研究的德国生物学家的真理呢？或者再往上说，一个在中国生活并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德国生物学家，他能够在公共场合以专家身份参与政治决策，因此在政策和文化上有更多的见解，能提供更多的客观事实？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条信息和每一个信息的传播者都对理解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前时代的一个挑战，特别是在西方，是这架天平处于失衡状态，感性认知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现象与系统本身的运行方式、教育体系和历史体系密切相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每位政治家都将自己视为专家。在基层辩论、学校、大学及所有社会层面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凭借互联网的普及，每个人都可以迅速获得信息，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能够提供快速答案。因此，讨论变得更加活跃，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信息的优势。然而，这种误解正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信息虽然传播得非常迅速，但这些传播的信息却是值得质疑的。信息从何而来？谁能够准确地将信息分类和解读？这些信息是否只是基于经济利益集团的意图？

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全球政治格局中的各种议题，首先需要对中国文化有基本的经验和知识。在历史上，世界一直受到军事、技术或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定义和方法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处于弱势，经济状况不稳定，通常会认为经

济更发达的国家或民族更接近真理，能够指引世界发展的方向。事实上，奴隶制的辩护也是基于此逻辑。因为非洲人民生活在“落后”状态中，他们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不文明的、错误的。因此，为了参与到更高级的发展中，弱势民族必须被迫接受来自霸权国家的价值观和标准，而他们的弱势地位同时被用于为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从殖民时代开始，这种真理和方法被视为主导力量，直到今天在国际辩论中仍然具有主导地位。因此，围绕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讨论也相应地在这种感性真理的基础上进行，这种真理以经济为基础，也常常是为了合理化剥削行为。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却确实奏效了。如果我们从讨论中剔除道德和良好风俗，殖民主义确实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巨大增长和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

许多发展看起来是合理的。因此，不应该全盘否定西方历史中的一切，尤其是在关于人类自由和自我实现的问题上。如果谈论的是基本的道德观念和人类共处，那么西方的视角也是一种真理。这些价值观在许多人心以主观和情感的形式存在，不应被低估。然而，这些价值观在全球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应被高估。在当前的世界讨论中，它们并非绝对的。随着经济的崛起，其他国家基于自身文化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视角也逐渐涌现出来。中国及其当前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仅仅通过西方的主导视角来观察世界已经不再足够，尤其是在全球多极化的时代，各国的发展日益重要，将其视角纳入讨论，并重新审视那些之前未曾被分享的真理，并将其纳入相对性衡量中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的价值观、文化、政治制度，尤其是它们对基本国际问题的定义，都应纳入讨论之中。

1.2. 社会工程学

“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道德经》，公元前约 6 至 4 世纪

另一个在真理发现和相互理解问题上至关重要的核心要素是社会工程学。社会的思维模式按照特定的模式被塑造，价值尺度也被设定，用来评估社会中的某些客观事件。这种价值尺度对应于大脑在分析事件时的逻辑。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思维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评估事件的标准都有所不同。这些模式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因此，在社会工程学的构建中，除了通过软实力的媒体作为参与者之外，社会工程的构建本身在真理发现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关键在于方法论。

一个高度相关的方面是逻辑思维的方式。从儿童时期开始，教育系统和在教育机构及媒体中的讨论环境便会强烈影响人们思考事件的方式，进而影响真理的形成。在西方体系中，所谓的绝对事实，通常是基于西方视角构建的，被更强调。特别是数据和图表，在简单的逻辑思维模式中起到了推动讨论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基于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真理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往往忽略整体环境的影响，仅仅通过简单的数据作出决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方式和整体文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方法，使得一个文化和文明中的人们在其行为、政策甚至未来的发展上变得可预测。无论是在讨论中使用的论点，还是在行为和决策中，他们都是可预测的。

在当前的西方辩论和发展的背景下，新媒体的出现，包括从娱乐产业到简单的新闻和人工智能的信息流动，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病态，这极大地改变了以往社会整体状况的标准。曾经情感与客观真理之间的平衡原则，现在逐渐被一种虚假的客观性取代，扭曲了逻辑思维的整体图景。客观与理性的思维模式与主观感受相混合，形成一种综合形式的真理现象。可以将其比作一个双层

球体，其中最外层代表客观真理，而下一层则代表主观真理，这层同时也构成了整体真理的核心，并作为客观真理的镜像存在。

新媒体及其当前的技术和新世界观带来了信息的过度刺激，个人无法逐步消化这些信息。这种现象在研究和文学领域的影响已经讨论了很久，现在在社会工程学领域变得更加明显。这种标准的扭曲在难以想象的程度上，从普通民众到专家，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现象，影响并统一了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设定。1931年，德国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曾写道，宣传在纳粹国家的功能和目的如下：

„没有其他政治运动像国家社会主义者那样深刻理解宣传的艺术。从一开始，他们就把心灵和灵魂投入到宣传中。与所有其他政治党派不同的是，他们能够洞察人民的内心，并能够用街头人的语言说话。他们利用了现代技术的所有手段。传单、海报、大规模集会、新闻、舞台、电影和广播——这些都是我们宣传的工具。它们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对人民有害，取决于它们的使用目的。从长远来看，宣传只有在每个阶段都保持一致时，才能打动广大群众。没有什么比缺乏清晰度或没有目标更让人困惑。目标不是向普通人介绍尽可能多的不同且相互矛盾的理论。宣传的本质不在于多样性，而在于从更大的池中选择出思想，并以多种方法将这些思想深深植入群众的心中。

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是我们政治活动中最重要的方面。它在我们的实际目标中占据中心位置。没有它，我们的所有知识都将是徒劳且无效的。宣传必须将知识转化为新的形式。它必须传递给人民，必须让人民相信我们知识的必要性。它为运动赢得新的斗士。它将成员变成追随者，将追随者变成烈士。今天，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密集的国家社会主义宣传网络。对每一位观察者来说都应该清楚，我们不仅在为今天的任务做准备，还在为未来的任务做准备。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是为了启蒙民众。它的任务不仅是为今天的任务赢得支持，还要帮助改变广大群众的性格。我们相信，只有在彻底改造我们的民族性格和建立全新的

民族思维方式之后，德国才可能迎来新的政治。这是我们最紧迫的任务，而如果我们今天为这些任务努力，我们就为明天的重大政治任务做好了最好的准备。”

社会工程学在真理发现和理解方面的深远影响，尤其体现在戈培尔宣传的措辞中。社会工程学涉及到思维模式的塑造、意志形成的方式，尤其是所谓的“启蒙”。然而，什么是启蒙？什么是宣传？在 17 至 18 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被提到了首位，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或迷信形成了强烈对比。国家与宗教分离，政府治理方式、宗教、技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价值观都根据新的标准进行了重塑。

如果我们从戈培尔宣传的定义中探讨启蒙的意义，那么启蒙是一种手段，通过它重新构建逻辑框架、设定标准，并在新的思维模式中将客观和主观真理融入其中，进而定义一种新的真理。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通过简单的方法创造新的价值观和意志形成。法学家可能会将其视为“良好的风俗”。至于这些风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否有利于或损害整个社会，实际上并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它们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屠杀，也可能将数百万人从贫困中解救出来。事实上，仅仅引用戈培尔这个杀人犯的言论，是否在此刻就已经在读者心中激起了一种情感反应，使整篇作品被某种主观感受所强调？这确实令人惊讶，不是吗？在主观感受中，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说话的人是谁，这会使每一句话都被置于特定的思维框架中进行分析和定义。如果同样的话语由康德或尼采说出，读者对其严肃性和接近真理的主观感觉是否会立刻提升？

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当代例子。假设我们将戈培尔引用的第一段话改为专注于当前的气候辩论：“没有其他政治运动比气候保护者更需要深刻理解启蒙的艺术。从一开始，他们就将心灵和灵魂投入到启蒙中，以拯救世界。他们与所有其他政治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够洞察人民的心灵，并能够用街头人的语言说话。他们利用了现代技术的所有手段。新媒体、海报、

大规模集会、新闻、舞台、电影和广播——这些都是我们启蒙的工具，并且都融合在大众媒体中。它们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对人民有害，取决于它们的使用目的。从长远来看，启蒙只有在每个阶段都保持一致时，才能打动广大群众。没有什么比缺乏清晰度或没有目标更让人困惑。目标不是向普通人介绍尽可能多的不同且相互矛盾的理论。启蒙的本质不在于多样性，而在于从更大的池中选择出思想，并以多种方法将这些思想深深植入群众的心中。”

在这里，焦点是气候保护，以及保护世界免受气候灾难的意图。每一个具有健康常识的人都意识到这一事实及其合理性，并且希望以客观标准来确保这种保护。如果将这一事实作为真理发现的绝对真理，那么其他标准将瞬间失去其价值。气候保护的意识形态原则或标准会立即被客观和其他主观观点所取代。数据或价值观、客观分析和科学家的对立观点不再重要，并失去了作为客观标准的价值。启蒙确保了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能够接受这种新的标准设定。这种社会工程学的完美形式实际上包括了完美形式的宣传，将自己的理念作为一种启蒙的手段传递出去。它定义了唯一的真理，并且在社会整体和个体层面上，成功地将人们的视角置于单一的思维模式之中。

因此，其他领域的社会互动，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历史视角，也都会采用新的标准设定。曾经工作保障、家庭建立和经济繁荣是思维模式和逻辑形成的核心，现在这一核心被新的标准——气候保护所取代。启蒙不过是一种新的标准设定，一种新的真理发现。启蒙仅仅在人的头脑中发生，并设定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新的事件发生并根据这些标准被塑造并得到更多的关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艺术社会中，在人类行为和所有活动的评估中，艺术被置于核心位置。那么这个社会将立即转变为一个艺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新的发展中，艺术标准将成为推动所有社会活动变革的动力。因此，我们在法国、俄罗斯或韩国看到了一个突出的、受文化影响的艺术和时尚水平。

我们看到，真理的定义是根据社会的标准设定和逻辑构建而不断变化的，这些标准和逻辑在一定的时间内会被置于一个新的视角之中。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像编程一样重新调整一个人的大脑，那么这些机械性的感官就会完全重新定向，人类这台生物机器会对某些感官给予更高的优先级，而对其他感官则给予较低的优先级。个人对这些感官进行判断并自行决定哪个感官更重要的能力似乎微乎其微，但实际上这种能力是存在的，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周围环境的直接影响。因此，个人周围的环境因素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涉及到个人的优先级设定和时间因素。

如果一个社会在每天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进行这种社会工程，导致人们以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感知他们的环境，那么问题在于他们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和个人环境中。这种环境至关重要。如果环境与这种变化大相径庭，那么这种变化就难以实现。想象一下，一个单亲母亲有十个孩子，她担心所有孩子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和安全的的生活。她的优先级还会是气候保护吗？气候保护是通过社会行为和逻辑思维的密集构建而设定的优先级。然而，对于一位母亲而言，孩子们的福祉在健康常识的指导下会占据更高的优先级，因此她的决策也会有所不同。她的真理是另一种，她的真理是金钱，是挣钱养家的优先级，无论其他标准如何。甚至她自己的生命或健康都可能比为孩子们提供足够的保障具有更低的优先级。因此，这位母亲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影响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社会内部的分裂和矛盾。

随着越来越多新的意识形态标准被设定，这些标准与经济现实相距甚远，那么这些启蒙标准融入社会的难度也随之增加。然而，总会有一些个别情况，这些人或多或少会遵循这些启蒙标准，并已经在自己的优先级中确立了这些标准。当我们谈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相互理解时，了解一个社会的标准并相应地选择言辞、合作方式和交流途径是必要的。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标准和重要性。各自的媒体或教育系统不会采用相同的社会工程形式。它们

的文化和传统拥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标准。因此，当我们谈论真理时，真理在不同社会中有所不同，并带有各自的特征。

为了将社会工程学的概念简化到人际关系中，只需观察每个人的直接环境。一个能够最大程度触动我们的情感并对我们产生最大影响的环境。这关乎爱，就像生活中的一切一样。爱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更伤害我们，但也能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更让我们幸福。爱触动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行为变得不理性，并最终远离任何客观真理。想象一段充满起伏的情感关系。在两人分享的时刻中，当社会工程的影响被放大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塑造深层次感情时所能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简单的互动和在对话中交换思想和信息，两人的思维方式逐渐被彼此了解。有些领域，两人愿意接受新的视角和信息而不会感到厌倦或疲惫，而在其他领域，他们会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时刻可以唤醒一种意识：一种像旅行者的双手塑造坚硬木材后的黏土的能力。

在每一次对话中，都有机会通过提供信息或言辞来改变对方的视角。你会发现自己成为了对方在个人成长旅程中的一部分，像是自己反射出的影子。但这不仅仅是为了改变对方的个性或触动敏感的情感，而是为了促进自我反思，并最终通过一种隐蔽的方式实现目标：首先给予他们他们想要的或所爱的，然后再将一切夺走。随着互动的发展，双方都会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共同追求神圣的情感。而这种神圣的情感便是爱，它包含了这一切。最终，这并不是为了强迫改变，而是为了间接地促进成长和个人转变。它涉及到让双方彼此赋能，打破对他人的美好信任，并提供那些不会再被重复的情感，无论是在一起还是未来与其他人之间。在一段男女关系的个体层面，文化的影响下，新的信息和相互尊重使得主观视角发生调整。随着关系的持续，情感和精神状态所受到的影响越大，个性也会随之客观且长久地改变，并且人也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自我，看到新的真理。这是一段精神的旅程，一段意识形态和行为构建的旅程。

1.3. 西方意识形态社会

当今时代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历史的重演。中国有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因此，历史事件经常会再次发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未来重蹈覆辙至关重要。当前，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在不同层面上再次上演。其中一个层面就是新一轮的理想主义阶段。但首先，让我们回到基础。

《德意志意识形态》由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于1845-1846年间撰写，解释了曾经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而如今在西方通过新的世界发展表现得更加明显。费尔巴哈批评了德国思维方式中的唯心主义。德国哲学史上，黑格尔、费希特和谢林等人的思想倾向于忽视人类生活的具体现实及其基本需求和自然。相反，他们将重点放在精神和理想上，将世界视为精神或理念的表现。G. W. F. 黑格尔提出了绝对精神的概念，认为世界是精神的表达。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则强调了人类自我意识的思想，认为绝对的“我”是自我设定并构建自身现实的主体。然而，费尔巴哈指出，费希特关于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思想脱离了现实环境的实际情况。唯心主义因此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思维方式，它超越了具体的、物质的条件。这里的“物质”主要指经济条件，以及人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

要理解当前世界中的西方，必须理解其思维模式和思维形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真理在唯心主义中得以体现，并导致历史的重演。在上述社会工程学的基本原则和媒体的作用中，这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标准被投射到人们身上。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总是反映经济或物质现实，而更像是在一个现代、发达的精神社会中，高度理想主义的新形式。通过强调精神而脱离现实环境，理想就像启蒙时代的基督教宗教一样，成为了一个焦点标准。在过去，宗教是制定价值观和决策的标准，或是为了寻找客观和主观的真理、意义和逻辑，而这些逻辑和思维模式塑造了人们的思维。随后，在启蒙时代，这种以神为中心的唯心主义转向了人类自身。根据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观点，人类作为神圣

的投射体，根据自身的理想塑造了世界。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纳粹主义的唯心主义深刻影响了德国历史，继而被解放后的共产主义思想所取代，直至今日，现代主义的新时代到来，唯心主义的基础再次被更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重复着唯心主义的循环，直到一场巨大的文化灾难出现，迫使系统重新从物质基础上重建。

那么，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在具体意义上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其发生的事件意味着什么呢？黑格尔辩证法的概念一直是解释世界发展的主导哲学构造，并且至今仍然可以用来解释当代西方的唯心主义世界。因此，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提出了一种哲学技巧，基本上通过“正题—反题—合题”的构造推动世界的发展。根据这一构造，正题代表某一特定概念的立场。反题则是与正题相对立的立场，也可以被视为原始立场。合题则是在正题和反题之间的对立中形成的。两者的对立通过克服矛盾，最终导向更高层次的新状态。克服的过程主要集中在消除旧的东西，包括反题，以使正题能够通过与反题的结合形成新的东西。这种新状态超越了原来的正题和反题，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黑格尔认为，这种技术或现象是推动全球事件发展的关键动力，基于精神的存在。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这种唯心主义形式被极大地应用和推广。新的标准被重新设定，这些标准根植于精神和个体的发展。思维模式，如身份认同的形式，纯粹是理念的产物，几乎不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影响。这里不去评价诸如性别角色问题的“好”与“坏”，而是用它来解释这种唯心主义原则。根据客观标准和整个人类历史的标准，纯粹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客观的真理是只有两种性别。然而，客观上也存在极少数的情况可能会提出不同的主张，如畸形。然而，在关于“存在”的精神和意识形态视角上，性别问题始终根据一个单一的标准进行评估。在现代社会的新意识形态形式中，这些标准在主观层面上发生了变化，转向了一个由纯粹唯心主义推动的多性别社会。各类技术和信息形式的启蒙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以使整个社会接受这种新的“真理”，这种真理表

面上也是客观正确的。因此，那些主观上认同多性别社会的人也寻求在社会中获得客观的接受。

唯心主义主要在纯粹的主观真理领域运作，而不考虑物质或客观的事实。在当前的西方社会中，正如费尔巴哈所指出的那样，主观真理被用来取代和压倒物质现实。在唯心主义社会中，“对”或“错”并不重要。事实上，没有所谓的“对”或“错”，这本身也是一种理想，即自由社会中的理想，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真理。每一种主观真理都是其唯一的真理。这种唯心主义导致了一个以矛盾为基础的社会，每个个体都与其他个体形成对立。由于每个主观真理都被视为自由的客观真理，因此每一场辩论都会变得荒谬绝伦。自由在这里意味着主观真理被当作客观标准。这种唯心主义在内部造成了分裂，但也带来了自由。它导致了矛盾，同时也催生了基于个人理想的新标准和原则，这些标准和原则可能是富有创造性的。

这种社会分裂在西方世界的社会状况中被信息传播中心以巨大的规模所强化。关于“存在”的问题，即作为自由社会意义的存在自由，脱离了宗教或纪律性的理想，因为它们与自由的理想相冲突。可以将这种新兴的核心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与前启蒙时代的保守宗教进行对比，或者与当代作为主导世界宗教的伊斯兰教进行对比。在现代世界的唯心主义伊斯兰教中，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遵循真主或《古兰经》及其内容。因此，宗教中的终极标准是与宗教相关的良好风俗。虽然可以有唯心主义和个体发展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受到具体框架的约束，这些框架旨在防止社会分裂，而是保护社会，阻止自由理想的过度扩展。

虽然宗教确实是唯心主义的，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但另一方面，费尔巴哈没有看到，这种唯心主义和宗教是在与社会经济现实相协调的框架内形成的。《古兰经》有着强大的逻辑结构，这与《圣经》的一些部分类似。例如，《古兰经》只承认两种性别。这是《古兰经》的一个客观标准，并且成为了个体的主观标准。目前，穆斯林中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存在超过两种性别。尽管媒体进行了

大量的“启蒙”和相关的社会工程，但《古兰经》的标准是不可改变的、稳定的，因此在长期内也是无法被控制的。相比之下，《圣经》因其多次修订和翻译的变化而可能在长期内被新的社会变革所影响，例如对同性婚姻的认可。《古兰经》更像是一种真理，它客观地塑造了穆斯林的思维模式，虽然允许一定的例外情况。然而，《古兰经》的措辞是可以解释的，不同的解释会导致不同的主观真理，这也是伊斯兰教内部冲突的原因。因此，像戈培尔和纳粹宣传那样的纳粹理想，几乎不可能改变伊斯兰教，因为《古兰经》在社会基础中有着更为深厚的根基。不过，通过特定的主观解释，至少在某些问题上仍可能扭曲真理。因此，尽管世界宗教在当今看来具有唯心主义的性质，但它们内部包含了重要的客观真理，这些真理是不可改变的，从而在社会互动中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结构，并阻止了自由唯心主义理想的过度扩展。

最终，西方的唯心主义在极端情况下正趋于失控，并且正在设立新的真理标准。显而易见，新媒体是这种真理扭曲的驱动因素，并试图设立新的标准。这些操作背后的动机和背景将在本书的后续部分详细探讨。在当今世界的外部层面上，西方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全社会现象。从基层群众到高层政治家，即使他们非常聪明和有能力，也经历了一种新的社会工程学层面的真理扭曲，这种扭曲通过他们自己的新媒体和技术工具实现。这种真理扭曲和新的优先级设定如此强烈地与客观真理相交织，以至于在这种唯心主义的框架下，任何行动都被视为客观真理，包括涉及全球政治事件的行动。

过去，唯心主义是纳粹世界大战的一个理由。对于德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而其他文化是“低等文化”，因此是“劣等人类”。这是纯粹的理念，与实际的真理毫无关系。这是人类唯心主义根据自身原则创造出来的真理。没有任何客观真理可以证明某些人群优于其他人。这是纯粹的幻想或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和真理构建的思维模式的变化也是欧洲放弃教会统治的原因之一，因为启蒙思想家们通过理性面对一种新的真理。然而，无论是讨论民族主义者还是启蒙思想家，二者都涉

及精神发展的观念，这些观念为这一唯心主义运动的追随者带来了新的真理构建和思维模式。

在当前的新世界发展中，一种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运动再次变得显而易见。这种新的“真理”被用作推动世界政治发展的动力，这些真理深深植根于主观的真理构建之中，却被视为客观真理，甚至被认为是唯一的真理。新的西方核心价值观，如所谓的自由热爱、个性化和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或是西方民主作为唯一正确的社会生活形式的理想主义思维，主导了西方社会领导者的主观真理和标准。在此过程中，不再讨论对错问题。对西方来说，他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通过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工程，尤其是通过新媒体、教育系统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已将他们引向这个唯一的、绝对的“现实”，一种新的幻想构建。这种新的主观、意识形态的真理的发起者尚不明确，后续将对此有更多的探讨。

当谈到国际理解、合作以及理解中国或其他国家时，西方专家、政治家或媒体面临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无法识别其他文化的标准，只看到自己的主观真理，并将其视为客观真理，从而导致一种扭曲的自身真理。这具体意味着，他们以自己社会的思维模式和标准来判断、行动和评估其他民族。在具体的全球政治案例中，这种情况意味着，当这些标准深入人心时，几乎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沟通。西方的唯心主义因此导致了对现实的巨大误判，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崩溃和对抗。乌克兰战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场战争以捍卫民主的名义展开，但并不是因为与战争相关的具体物质现实。在台湾问题上，也以捍卫民主为名，而不考虑与该岛相关的具体客观现实。即便是世界大战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以捍卫他们的“真理”或理想，哪怕这要付出数百万生命的代价。归根结底，这涉及理想原则和自身的真理，而不接受或承认其他的真理或思维方式。这是一种自我定义的唯一正确的真理，不允许其他标准的影响，哪怕有客观因素与之对立。

在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在社会中确立的同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整体与其直接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也导致了冲突。历史之所以重演，是因为人类的盲目唯心主义不断重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看到了真理、绝对且唯一的真理。这样一来，人类将自己置于类似神的地位。但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新的理想世界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不能成为客观的真理，因为客观真理本身只是通过人类的主观测量方法形成的。改变这些测量方法，也会改变整个人类的稳定性，或塑造出一种新形式的人类。只要人类保持脚踏实地，将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放在首位，而不是理想主义原则，那么和平就可以维持，冲突也可以避免。脚踏实地的生活方式是应对物质环境的正确道路。日本有句谚语：“只追求自由，永远不会真正自由。”（自由ばかり追ふせていると、自由になれない）。只有首先理解并掌握自己的需求，即内在的自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和追求自由的意愿。内在的自由还建立在内在和外在的纪律基础上，这种纪律与直接环境相协调，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共处。自由必须与物质和精神的纪律相结合。

曾几何时，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应该是自由的，通过供需原则和竞争思维促进经济发展。竞争、矛盾和市场行为被视为发展的工具。然而，现在这种自由经济理念被应用到个人自由的层面上，导致了精神想象的极端化发展。正如中国谚语所说：“吃一堑，长一智。”（吃一堑，长一智）。人们从错误和困难中学习。真理和唯心主义也是如此。只有当一个唯心主义社会的唯一正确真理与物质现实发生冲突，跌入深渊，并通过一种新的社会工程与直接环境的实际感受相结合后，西方社会的头脑中才会形成一种新的、脚踏实地且平衡的真理。这是从事实、现实和物质辩证法中发现真理的过程，也即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1.4. 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发现

与西方的唯心主义发展及其思维和逻辑形式相比，中国在真理问题上的视角和讨论需要被立即关注，因为它们在思维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逻辑和分析的构建方式不同，因此中国人看待真理的

方式也不同；他们的标准显然有所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体系发挥着核心作用，它为人民提供了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影响他们的环境。要理解中国，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或缺的。

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没有深入教育背景的读者，尤其是来自西方教育体系的读者来说，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会引发主观情感，并由于已有的信息和解释而导致真理的扭曲。仅仅通过这个术语，就会产生主观感受，进而生成一种扭曲的客观真理，而没有真正理解深层次的实际情况。植入人们脑海中的，是计划经济失败和整个社会贫困的错误印象。人们常常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然而，仅仅“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以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事实，就足以与唯心主义形成对立。马克思主义者是那些以实际的经济生活条件为基础进行论证的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基于人类自身的具体自然条件和现实生活环境进行论证。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分析和观察世界的工具。我认为，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因此避免了与经济现实，如市场经济的冲突。相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卡尔·马克思在柏林洪堡大学的一句名言。这句话具有双重含义，是一个可能被广泛误解，同时也可以被正确解读的引言，是一种双重真理的真正美丽。读者立即会将这句话解读为行动的重要性，强调实际行动而不是仅仅发表言论。这是一种行动的呼吁。然而，同样的读者也可能批评说，没有哲学和思想的理论基础，变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句话具有双重含义。物质环境的改变是精神思想的起点。如果世界被积极改变，而物质环境也随之变化，那么实际的变革就会在客观真理中实现。物质的实际情况使人们能够客观地看待世界。当存在具体的物质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通过科学和客观的方法得到解决时，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真理也随之形成。这种思维模式并不是基于唯心主义的真理，而是根据个体和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的具体生活条件进行论

证。重点不在于行动本身，而在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冲突，作为行动的工具。这句引言正是区分马克思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工人和农民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在工厂工作的人们不关心精神原则。他们用双手制造机器，并根据实际情况评估机器的性能。机器是否精确不是信仰问题，而是现实中测量原则的问题：这是对精确客观真理的探寻。机器和工业的产生并非由于精神力量，而是由于经济利益。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现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尤其是在当下，因为它与当前西方的唯心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种唯心主义在过去经常导致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其结果往往是战争。接下来要讨论的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分析问题的方式，以及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在高度发达的形式下应用这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这为技术发达的世界中的现代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例，并展示了如何用新工具解决当代问题。这是人类的一条新路。

正如之前已经详细解释的那样，黑格尔和其他西方哲学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乃至启蒙时代，强调了精神和人类存在对环境的影响。精神的自由发展及其思想作为对环境的投射。这创造了一种新的主观真理形式和新的思维模式结构，其中新的标准被设立，新的价值被排序，用以评估环境并做出决策。这种唯心主义，在启蒙运动的大规模形式和最现代技术的利用中，与大众传播的结合，使得思想的强度和时间因素共同形成了精神的唯心主义。我们可以主张，每个人都必须穿绿色的衣服，因为这会拯救世界，而大众主观上相信这一点，即使客观现实并非如此，只要这种社会工程构建完美运行。然而，这也在人的内心中制造了心理冲突。当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之间的矛盾过于明显时，心理障碍便会出现。这些矛盾在物质现实和理想主义梦幻世界之间存在。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心理问题将会加剧，整个社会将变得越来越病态。这种病态表现为攻击性。攻击性来源于失控感。当人们对自己的现实失去控制，被唯心主义带入梦幻世界时，失

控感就会出现。因此，有必要保持脚踏实地，让人们接触到物质现实：即事实的物质真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黑格尔通过他的辩证法工具，解释了世界是如何通过正题、反题和合题的方式形成的。因此，精神作为主要现实，是世界变化的原因，精神的思想塑造了世界。黑格尔解释说，唯心主义社会的思想根据其理想塑造了环境。正如所解释的那样，这种唯心主义的极端发展最终引导人们走向法西斯主义，并在现代引发了如乌克兰或巴勒斯坦的战争。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

卡尔·马克思利用了黑格尔的工具来观察世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了许多其他视角，构建了自己的思维和分析方法。这种新形式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更具体地说，可能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更为贴切。简而言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并非人类的思想和精神塑造了世界，而是实际的经济和物质条件导致了世界的变化。历史的进程不是因为人们追随某种精神理念，而是由于经济关系和环境的运动，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影响了唯心主义的思维。如果我们考虑到世界应该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作为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世界各国应该朝着西方的意识形态方向发展，那么在一个拥有不同制度结构的国家中，如果其人民生活在良好的经济条件下，这种转变本质上是无法实现的。

关于真理的问题，即西方民主是否是唯一正确、绝对的民主形式，并因此被认为是唯一真实和正确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构建，如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而它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形成了对立，这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那样。因此，向西方民主的转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人民的具体客观标准根本不允许这样的思维模式存在。这种理念不在他们的标准范围内，只会引起困惑，因为他们的经济和历史背景是不同的。除非通过社会工程对其进行影响和主动改变，使其看起来新的国家结构可以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否则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一种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是由一系列物质关系推动的，这些关系决定了社会结构和经济因素，例如生产和工业。以国家层面为例，社会的社会结构或公司内部部门设置和公司管理结构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这是某种精神或意识形态的想法，而是因为以这种结构生产效率更高，并且作为盈利工具使用公司这一模式更接近于客观真理，因此与唯心主义的精神视角关联不大。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真正影响最大的不是那些在议会中作为民主代表出现的人，而是那些实际控制企业的人。试想一个虚构的企业家，他持有某个国家 X 中所有企业的 100% 股份。而由于国家 X 的法律隐瞒了他的名字，他从未公开露面，因此人们也无法识别他的物质或意识形态观点。如果这样的人控制着所有企业，民主制度还能真正发挥作用吗？答案显而易见。现在，只需看看你所在国家的社会结构，以及那些大型企业的股东是谁，就可以找到许多问题的答案。

因此，马克思通过具体的生产力，例如技术或工人，以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土地和具体的社会阶级结构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马克思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来解释社会中的矛盾。在现代社会和现实世界中，这种观点常常被视为典型的“罗宾汉式”共产主义。然而，这种幼稚的看法只是表象。这种对阶级暴力斗争的看法在现代世界中已经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与唯物主义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关系不大。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进行了大量对资产阶级的讽刺。马克思通过叙事和泛化变得理想化，产生了一种将“富人”视为敌人的主观真理。然而，富人也可以为所有阶级的利益服务，为公众利益和为人民服务。在马克思的观点中，阶级斗争被视为一种唯物主义的解决方案，用来消除物质不平等，并遏制那些为了垄断私利而扩张的盈利个体。因此，这种唯物主义的解决方案本身已经通过一种主观真理被理想化，并且也采用了看似客观的解决方法。因此，本书主张应有唯物主义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应基于主观标准和资产阶级的参与。现代社会主义解决方案，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此基础上发挥作用的。但是首先，让我们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和真理问题。

马克思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立面，甚至可以说是其反题。根据这一理论，变化和发展通过辩证运动和对立统一来实现。这种运动由正题、反题和合题组成。然而，这些运动和对抗并不发生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而是发生在物质条件的变化中。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如社会不平等、阶级斗争或经济生产关系，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条件。因此，可以说在乌克兰战争中，德国政府对俄罗斯天然气实施制裁，导致能源成本飙升。由于这场意识形态战争是长期的，因此长期的高能源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经济冲突必然导致德国工业向生产条件更优越的国家迁移。企业家们自然不会以主观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回应这种物质失衡，这种不平衡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他们也不会因此冒着失去整个企业的风险。

在第二步中，社会也不会接受大规模的失业。这个客观的物质冲突作为对政府对俄经济战的反题，迟早会促成一种新的物质合作形式。尽管意识形态支持者内部的主观情感压力可能非常强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却表明，最终经济条件将起决定性作用。

此外，马克思主义者不会仅仅将这一冲突视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它还涉及到国内生产要素的明确经济物质利益，无论是德国的军工产业、欧洲企业在战后重建中的作用，还是对乌克兰领土的占领。这些物质利益与进行战争的物质代价——数百万人的生命——形成冲突。因此，战争在客观上具有物质层面，推动了显著的物质利益，因此战争得以进行。而战争所带来的附带损害在某种程度上被接受，但这种损害往往被主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思维所掩盖，从而使客观性在决策中的影响力减弱。媒体和宣传是塑造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推动者。因此，某些具有意识形态的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活条件，以捍卫他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民主或理想。客观上，战争始终可以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然而，在主观上，生命的价值或维护和平的价值作为主观真理，已经将这种解决方案排除在思维模式之外。如今，基于新的理想主义视角和西方的新真理扭曲，这种新的主观看法正逐渐转变为客观真理。因此，

那些支持这场战争的人纯粹是意识形态驱动的，与纳粹法西斯主义有相似之处。同样，认为普京首先发起攻击并称他为真正的法西斯的观点，并没有理解这种意识形态在其自身真理扭曲中的作用。它没有理解这一冲突中的背景，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背景。那些是地缘政治的、客观的物质标准，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则。因此，人们应该问问自己，俄罗斯方面在其客观和主观真理中设立了哪些标准。理解他们的视角，理解他们的行为，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主观真理以及由此产生的唯物主义视角是必要的。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的进攻并不是单方面的行动，而是多种相互交织的唯物主义地缘政治冲突反应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因此成为解释世界上物质发展进程的工具。唯心主义则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真理尺度的失控和非理性的决策。一个社会越是将重点放在精神上，并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或思维方式代表着绝对真理，那么冲突的风险就越大。因此，不存在一种单一的主观真理，而是存在着各种真理的尺度和概率，而非绝对真理。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其他社会的真理尺度，而不是试图通过自身的唯心主义来调整这些尺度，从而忽视这些社会的文化和物质现实。

1.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思维构建

要理解中国，必须先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而要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就必须认识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分析工具和真理发现形式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看待，还包括了中国内部杰出人物的诸多重要著作，这些著作作为中国的思维方式引入了新的视角。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需要考虑中国的千年历史、文化以及不断发展的进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都是理解中国发展思维的关键支柱。

当然，尽管以下解释的特性能够阐明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但在广泛的真理探索领域中，这种分析更像是一个指南针，指引着

通往真理的方向。任何与中国接触的人都会遇到中国人不同思维方式的新视角和解释。然而，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体系仍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石，也是社会工程学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构成了个人性格结构的重要部分，因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这个建国日是伴随着战争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多年抗击日军，最终取得胜利，随后又经历了国内的内战，并最终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的成立而告终。对此将在后续部分进一步探讨。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在中国人民的思想和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作为理解和评判世界的基本基础，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影响的塑造。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强调从物质、客观的角度来改变和评判世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基本哲学被视为与中国人讨论和解释世界的主要前提。直至今日，中国人仍然将世界视为一个经济合作的平台，旨在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一个由唯心主义思想发展而成的体系。事实上，中国人高度非意识形态化，他们根据客观事实来评判世界，尽管在动荡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确实存在并需要明确的意识形态运动，以在极端情况下赢得并保护人民的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确立了改善经济生活条件和保护外部经济基础的目标。

然而，马克思并不是耶稣，《资本论》也既不是《圣经》也不是《古兰经》。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言，而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用来理解世界上的运动。中国人采纳了这个概念，并逐步将其进一步发展。像世界上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中国将其基本概念与物质环境相结合，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形式。地方历史事件已经形成了文化，最终也催生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今天，朝鲜的主体思想和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社会主义及其形式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相对年轻，鉴于具体的物质条件，它们需要不断调整 and 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这种持续发展的形式至今仍是中国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一个关键的推动者，他激励了所有中国的共产党员，甚至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要理解中国，无论是主观真理还是客观真理，每个人都必须清楚，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个人承载着情感和主观的真理。这不仅关乎他们的言论，更关乎他们作为历史人物的象征。在后续的中国历史分析中，必须始终记住，历史与人民的情感联系紧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联系可以创造或影响他们自己的主观真理。

此外，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与中国人民及其思维方式有着深厚的联系。一个关于古代火起源的例子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一点：在希腊神话中，泰坦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偷走了火，并将其带给了人类，这为他带来了宙斯的严厉惩罚。罗马人崇拜火与锻造之神伏尔坎，作为神圣的工匠，他使火得以为人类所用。在印度教中，火神阿耆尼在宗教仪式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作为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在北欧神话中，洛基这个诡计之神常常与火联系在一起，而火本身则常常是毁灭与重生的象征。

与这些将火视为神圣礼物的文化不同，中国神话中对火的起源解释没有神灵的投射。一个著名的传说讲述了燧人氏的故事，这位文化英雄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摩擦两根木棍来生火。这一发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端，显示出在中国神话中，火更被视为人类的一项实际成就，而非神赐的礼物。这些不同的解释表明，在不同的文化中，火往往被视为一种核心的、神圣的力量，为人类带来了力量和文明。而中国人则更多地将火视为人类创新的实际成果。

除了中国共产党（简称为 CPC）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外，中国还有许多历史上和现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宗教和文化，它们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多样性。例如，儒家哲学

（孔子，公元前 551 - 479 年）至今仍具有影响力。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家庭忠诚、尊敬长者和祖先崇拜，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在塑造中国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因此，当我们在后续探讨中解释中共的党组织架构及其权威和领导地位时，会发现它与儒家思想有许多联系。

此外，道教作为一种中国本土的宗教和哲学，基于老子和庄子的教义，强调顺应道（即“道”）以及宇宙自然力量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和文学方面，佛教和基督教也有影响，此外还有伊斯兰教以及中国境内的众少数民族和文化多样性。中国的文化、哲学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多样性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多样性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始终保持着对自然或物质世界的坚定立足点。

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要素。这意味着世界依然被以经济的视角来看待，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因此，尽管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但国家并没有推崇任何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或宗教。相反，中国坚持让所有文化和宗教在党的领导下和谐共存，仿佛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无论风雨来袭，都能确保所有人保持干燥和安全。经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一种分析和思维方式，是寻求真理的关键工具。本书将重点放在这一方面。

第 2 章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角色

“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领导力量中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

——毛泽东

2.1. 通过历史理解主观真理

要理解中国，尤其需要反思从近代到今天的历史。如果与大多数中国人交谈，会发现许多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饥饿，而直至今日，中国人民的历史痕迹依然清晰可见。即使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台湾，仍然被分裂分子占据，并且现今更是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如果希望以谨慎和专业的态度与中国打交道，就不能仅仅从西方的主观看法来评判中国共产党。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理解他们痛苦而富有经验的历史，理解这些历史在情感和视角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汉朝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 145 年至公元前 86 年）有句名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当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与历史的深厚联系。这种联系将人民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不断重复并从中学习。习近平曾说过：“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揭示一切，警醒我们。” 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及其领导层，必须强调，从基层到领导层，学习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历史不断重复，中华民族也在不断从中汲取教训。

世界上的一切都被重复、起伏所标记。就像观察光波一样，正弦波结构或量子物体也体现出一种起伏的形式。心跳决定生与死。阴阳，光与影。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心跳的无限循环，影响着世界上的一切生命。宇宙的自然法则就是一切都会重复。因此，历史本身也是如此。体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捕捉并反映人民的情感，这是理解中国的必要途径。这不是为了宣传或美化中国的视角，也不是为了美化中国共产党从而对读者进行单方面的操控。研究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实际意图和理解，基于实际研究，捕捉中国人民的情感，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中国的运作方式、人民的视角，以及他们如何在内心构建自我认知，从而理解自身和外部世界。因此，这关乎于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待世界，并基于他们的历史和经历来理解他们的真理。

2.2. 中日战争与朝鲜的历史背景（1894-1945）

从西方的视角来看，理解日本对整个亚洲的侵略战争及其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日本以及西方的历史书籍、教育系统和媒体中，这段战争历史往往被淡化甚至忽略。然而，这场战争的恐怖与德国纳粹法西斯的暴行相当，甚至在许多方面可以相提并论。因此，这段历史在理解中国人、韩国人以及其他受影响民族的基本认知中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接下来将特别探讨韩国的情况，因为直到今天，韩国的情况仍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被误解。此书不仅要探讨中国的历史，还要探讨社会主义本身以及真理的问题，因此我们也会深入探讨韩国的真理，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当地的具体条件。重点不在于西方主流的“真理”，而是专注于中国和韩国的真理，以期增加对局势的理解，并引发新的讨论。

中朝日三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充满了权力斗争。朝鲜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长期处于外交、经济和军事的交锋之中。朝鲜自身无法在军事上与这两大强国抗衡，因此通常选择与当时的中国帝国结盟，以抵御日本的入侵。朝鲜经常成为大国争夺的棋子，但数百年来，至少在领土上，朝鲜保持了自己的独立。1894 年至 1895 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导致中国失去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1895 年的《马关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并从西方或日本的角度来看，促成了朝鲜从中国的“独立”。然而，历史书籍中对此的描述各有不同。朝鲜是否真的独立，或者是否曾依附于中国，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日本来说，表面上是为了朝鲜的独立，但实际上朝鲜却被置于日本的影响之下。日本并非为了和平理想而战，而是为了获得对朝鲜领土的经济控制。朝鲜在日本的眼中一直是一个战略要地和长期的对手。

1910 年至 1945 年，随着日本帝国的进一步扩张，朝鲜被完全并入日本的版图，受到日本军队的占领，并由日本傀儡政府治理。日本通过施加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迫使当时的朝鲜国王签署了并入日本的条约，日本至今仍将这次兼并视为合法。如

果是任何一位德国法学家，都会将这种在一方意愿下签署的单方面条约视为无效。在占领期间，朝鲜的抵抗者被处死或被关入监狱。在这些监狱中，日本人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并早在那时就引入了残酷的集中营制度。一个当时的英雄例子是年轻的活动家柳宽顺，她在半岛南北两方都被视为英雄。她组织了超过 2000 人的和平示威，反对日本的占领。日本警察立即开枪，她被关进西大门监狱，17 岁时因遭受酷刑而死。日本人在这些集中营中进行了大量的人体实验。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日本占领期间的慰安妇问题，数千名妇女被迫作为性奴隶，其中许多人被带到日本。直到 21 世纪初，日本政府还在否认这一事实，直到日本司法部门最终承认了一些来自韩国的受害妇女的诉求，证实了日本的性奴隶制确实存在。在文化上，日本强迫朝鲜人使用日语作为主要语言，采用日本名字，并压制了朝鲜的文化。

1931 年，日本通过策划柳条湖事件，进一步扩张，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满洲）。自此，日本军队迅速扩张，继续推行侵略政策。战争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暴力和残酷程度不断升级。日本人将自己视为一种优越的亚洲“种族”，将被压迫的民族当作动物对待，对他们进行折磨，并将他们关押在集中营中，强迫他们从事苦役。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中国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必须认识到，日本在战争中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犯下了违反人道的罪行，这些罪行发生在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中的一个著名场景是 1937 年 12 月至 1938 年 1 月期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关于在这场屠杀中被杀害的中国人数目存在争议，大多数估计在 10 万到 30 多万之间。根据日本陆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命令，日军在南京犯下了无数的集体屠杀和成千上万起强奸案。日本军队洗劫了周围的村庄并焚毁了城市，摧毁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建筑物。1940 年，日本人将南京设为他们在中国的傀儡政府的首都，由汪精卫领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松井石根和参与谋杀和强奸的中将谷寿夫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犯有战争罪，并被处决。

日本的战争因此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和家庭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需要意识到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仍试图否认这些战争罪行。与德国不同，日本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反思文化。相反，日本士兵被视为英雄，日本国内有许多纪念碑，如靖国神社的游就馆战争纪念馆。日本的立场不承认在这场战争中的罪责，因为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一些单方面强加的条约赋予他们所谓的合法权利，因此也赋予他们镇压和杀害当地居民的权利。日本的教育系统至今掩盖了有关这些战争罪行的信息，因此大多数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战争中的极端暴行知之甚少。而历史可能重演，这让其他民族担心，日本的战争意图可能会在未来再次出现。

在战争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国家元首金日成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是一位战争英雄，在前线参与了游击战争，为解放朝鲜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韩国的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则由美国（夏威夷）派遣回到韩国，意图在战后建立一个傀儡国家。金日成被视为战争英雄，而李承晚则被视为美国的傀儡或西方自由民主的朋友。李承晚的“自由民主”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与美国合作，通过大规模屠杀和酷刑镇压韩国国内的统一运动和亲共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济州岛惨案，发生在 1948 年 4 月 3 日。这场屠杀导致济州岛上 3 万至 6 万名反对美军占领和西方自由民主政权的人被杀害。在西方的历史书籍中，这类信息至今仍被大幅削减，韩国本身也试图淡化这一事件，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些信息却是教育系统的核心内容，极大地影响了南北两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分析行为。需要认识到的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韩国相当一部分人口支持北方，反对美军占领。

类似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对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美国也在日本建立了一个新的自由民主政府。美国请求释放在中国被囚禁的岸信介，他是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祖父。战后，他被美国人任命为日本首相，以遏制共产主义影响。有趣的是，至今中国和韩国仍称他为“满洲怪物”，因为他是当时日本在

满洲地区的指挥官，曾下令实施了最残酷的大屠杀，将当地居民视为畜牲，并残忍地屠杀了他们。

2.3.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17 年俄国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全球传播，包括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解放人民，摆脱压迫性的制度，无论是前殖民统治者、日本侵略者，还是法西斯主义本身。在共产主义的框架下，人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这种系统的团结形式就是共产主义。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其他制度或思想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正是经济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如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最终的毛泽东思想，才使这一目标成为可能。需要明确的是，没有单一的“共产主义”。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层和干部都不会声称他们的共产主义体系是唯一正确的。相反，每个文化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前行。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生活时，我们才能认为他们的共产主义制度是“正确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之为主体思想。

19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一艘传统中国船只上成立，因为参加第一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受到秘密警察的追捕，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31 日召开。最初，代表们在上海的法租界内的一栋建筑中会面。由于受到警方的威胁，他们最终将会议地点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上的一艘船上。大会共有 13 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来自中国各地的不同共产主义团体。与会者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领导人的毛泽东和董必武。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制定了党的目标，包括废除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值国内动荡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两大主要派系试图互相压制和利用，以争夺在中国的主导权。中国共产党

的成立受到了 1917 年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的影响，后者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启发。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组成了统一战线。然而，这一战线在 1927 年由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发动的对共产党的清洗行动（即上海大屠杀）而破裂。清洗行动后，共产党退入农村地区，开始对国民党进行游击战争。一个关键时刻是长征（1934-1935 年），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战略性撤退，历时约一年，行程超过 9000 公里。长征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能够在背叛和长征的巨大困难中团结人民，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斗志。他完成了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任务。

1936 年的西安事变中，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被自己的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绑架。他们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的敌对行动，转而集中力量对抗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机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最终促成了 1937 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对抗共同的敌人——日本。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尤其擅长通过游击战击败军事上占优势的日本军队。这包括破坏日本的通信和供应线，并伏击日本军队。中国的农村人口通过土地改革和社会项目得到了支持，这使得对共产党的支持不断增长，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思想和政治基础结构。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与日本人作战中，从基层开始逐步形成的，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人民意愿自主创建的政治组织。像“百团大战”（1940 年）这样的关键战役，或者像陕西和河北的防御战，都增强了人民的士气。类似的战争策略也被朝鲜共产主义者在金日成的领导下采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后，中国出现了权力真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再次开始相互斗争和较量。中国共产党迅速收复了日本曾占领的地区，这极大地巩固了其地位。从 1946 年到 1949 年，中国再次爆发了内战，并进行了多次和平谈判，但始终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而未能达成共识。同时，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广泛的土地改革，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无地

农民。随着中国共产党获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1949 年他们成功占领了南京、上海和广州等经济重要城市。在中国共产党的进攻势不可挡之际，蒋介石和剩余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并在那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府，宣布台湾为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内战的结束，也宣告了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纪元的开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共产党开始塑造国家的新政治和经济结构。共产党立即推行进一步的土地改革，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于 1949 年成立。这一机构汇集了政治党派、群众组织和公共生活中的相关个人，作为政治咨询的机构。它是中国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不同的团体和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提出建议，共同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CPPCC 的首次全体会议于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在北京举行，作为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确定了新政府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寻求国际承认。一个重要的步骤是获得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承认，并展开合作。

最后，特别需要探讨战争期间的理想主义视角，以理解中国人至今的思维方式。这需要从心与心的层面，超越单纯的事实和战争发展的分析，深入理解人民的情感与理想主义。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展示了至今仍然存在的人的理想主义和情感视角。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一名讲师，我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提供详细见解。

在日本侵略战争期间，继续教育人民并传授知识，尤其是对党的干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战时建立了一所教育机构，当时的名字是“陕北公学”（1937-1939）。当时，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有了陕北公学，中国就不会灭亡。”学校开设了相关的主要课程，毛泽东亲自为学校题写了六条校训，并进行

了十次演讲。他还说：“我们必须培养尽可能多的人才。这些人才是各个层面的先锋。他们忠诚、正直、信仰坚定。他们有动力，无所畏惧，果断而勇敢。他们不为别的，只为人民和社会的理想而奋斗。他们时刻准备着克服困难和障碍，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有了这些人才，我们将能够完成我们的任务和目标。”这些话至今仍然激励着学生，成为他们学习的动力。他们将其视为实现目标的动力。

当时，这所大学位于山区，虽然偏远但靠近战场。它根据战争形势不断改变地点，如同一所流动的大学，必须在各种环境下保持教育和与人民的沟通。

1939年7月7日（至1948年），陕北公学与其他四所大学合并，成立了华北联合大学。教职工和学生在两个月内行军超过1500公里，最终到达河北省阜平县。这类似于在国民党背叛和上海清洗行动后的长征。在中国有一句谚语：“吃苦耐劳”（吃苦）。如果一个人非常勤奋，不怕困难，人们会说“你真能吃苦”。是的，在这个语境下，这是一个赞美。在这段战争内外的血腥时期，从年轻的学生到年长者，中国人民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忍受了种种艰辛，努力为他们的国家和同胞创造最好的生活。一个未来，一个希望，一个生命。

在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大学，并将其改名（至1949年）。毛主席亲自题写了“华北大学”四个字。周恩来总理致信吴玉章先生，邀请他担任校长。吴玉章在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延安度过，延安是共产党控制区的首府，位于陕西省。延安成为共产党活动和抗日斗争的中心，是培养共产党员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许多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来到这里，加入抗日队伍并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在中国，民众理想和重要权威人物的文化一直盛行，这与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特色密切相关。吴玉章是第一任校长。他本人参与了简化汉字的创造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评价他道：“偶尔做一件好事并不难，但一辈子都为公共利益而奋斗，并

承受几十年的艰辛，这真的不容易。但吴玉章同志正是这样做的。他用一生定义了这些美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的照片中，吴玉章先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紧挨着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在当天的游行队伍中，华北大学的学生队伍是唯一获准通过金水桥，靠近天安门并表达敬意的队伍。在 18 个月内，超过 2 万名学生在华北大学完成学业，并在日后的各个国家部门中成为领导者和中坚力量，致力于国家的发展。可以说，华北大学构成了整个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

最终，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简称 RUC）成立。1950 年 10 月 3 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出席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角色，并最终作为部长推动了基于合理性和计划性的发展经济改革，强调了专业知识和效率的重要性。他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其他大学应该向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一些来自前苏联的学者和专家也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苏联的法律体系通过苏联学者和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次传播和采用。自那时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了大量各领域的人才。其中，郝建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 1935 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后来在纺织业工作，发展了多种提高效率的方法。1977 年，她被任命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2003 年，她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她是一个通过努力工作实现个人成功和社会认可的典型例子。

在大学结构中，党的建设至关重要。学校自成立以来一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的领导在改革和发展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大学的每个部门和领域都有效而全面地开展工作。党始终不忘自日本战争以来对人民的初衷和承诺。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不仅在课堂上学习，还通过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参与实践研究和社会服务。习近平主席曾说，我们应该“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正如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们始

终与农民保持联系，并在农村地区建立了党组织，今天的学生也被要求保持这一原则。

为了进一步阐明教学方法，还可以举程方武教授的例子。他精通五种外语：日语、德语、英语、法语和俄语，并五次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学生们称他为“程妈妈”。他关心经济困难的学生，早晨与学生一起锻炼，并总是非常接近每个学生，关心他们的心理和物质福利。至今，这种教学风格仍然存在，教授们非常关心他们的学生，包括国际学生。

日本侵略战争的恐怖与共产党的团结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人民的统一。必须意识到，在最困难的时期，人们通过共产主义原则和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汲取了力量和希望。他们成功地以自己的策略击败了日本人，重新获得了民族主权，即整个中国人民的主权。这在客观和主观层面上无疑形成了一种新的真理观和思维方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将整个中国人民团结在一种纯粹的中国形式中，并影响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在后续讨论共产主义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相关事件必然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此外，中国人民非常重视记录历史和尊敬祖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历史非常精确地反映在许多公元前的手稿中，抗日战争也是如此。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些事件深深植根于家庭和人们的记忆中。

2.4. 悲惨的战后时期与中国的开放

即使在战后时期，中国人民仍然面临着内外部的挑战，这对他们提出了极大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中，仅凭知识和团结一致的努力，独立完成重建工作。有人可能会认为苏联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支持，但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学术和技术层面。苏联自身也在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了数百万人口，并需要独立进行战后重建。

2.4.1. 国内的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整个中国人民必须从废墟中重建国家和粮食供应。与此相比，日本和德国则得到了经济支持，例如通过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孤立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层面临着众多决策，这些决策可能会带来激进的变化，不论是好是坏。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对国家的长期发展造成影响，要么损害，要么受益。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中国经历了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国家的工业化和土地的归农民所有成为关键问题，农民最终也肩负起了保卫国家的责任。此外，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将农民组织成社会主义合作社。

1958 年至 1961 年的“大跃进”旨在迅速将中国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领导层希望通过在钢铁工业中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提高生产能力，并实施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如水电站，以加速发展并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不幸的是，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经验不足和专业知识，加上某些个人出于自身利益的影响，导致了許多错误的规划。这些人未能准确执行计划，反而通过虚假报告影响了计划的准确性，导致了許多人为的误判，现有基础设施的破坏，并最终导致了 1959 年至 1961 年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如干旱和洪水，这进一步影响了生产，最终摧毁了整个新的经济体系。由此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估计有 1500 万至 4500 万人丧生。这种局面引发了国内的信任危机和犯罪行为，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

从 1966 年到 1976 年，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饥荒和内部问题的时代，中国社会试图通过放弃旧有的传统并巩固共产主义来进行革新。学校和大学被关闭，教师和知识分子被视为敌人，年轻人被动员为红卫兵，镇压被认为是革命敌人的人。直到今天，文化大革命仍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痛苦篇章，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痛苦的战后时期深刻影响了今天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经历过饥饿和极大的痛苦。这个章节是中国历史上辉煌崛起后的重大挫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评判，也不能轻易地贬低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最终还是从底层社会中产生，代表了全体人民。然而，也不能否认决策中存在的错误。有些好的初衷最终导致了负面效应，进而引发了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连锁反应。今天的中国从过去的教训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这对于理解当今的中国至关重要。

2.4.2. 外部的挑战

与此同时，中国在外部也面临着四大挑战：朝鲜战争、台湾问题、与苏联的决裂以及最终的越南战争。

2.4.2.1 朝鲜战争

在 1950 年至 1953 年的后期朝鲜战争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迅速占领了韩国大部分地区，仅釜山港未被占领。当外国势力介入时，朝鲜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西方历史书籍通常将朝鲜在战争初期的胜利归因于经济优势，但这只是部分原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整个朝鲜半岛，尤其是在北方和南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韩国的自由民主总统李承晚对其人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如前所述，李承晚在年轻时曾在美国大学学习，并深受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战争中，他逃往美国，并在战争期间对其人民实施残酷的政策，受到美国的反共立场的影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被视为对自由民主的热爱，而事实上，韩国实际上再次被占领，这次的占领者不再是日本人，而是美国。

当战争继续进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几乎统一朝鲜时，联合国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了干预，阻止了朝鲜的统一。全球军

事实力的压倒性优势，特别是空袭，使得朝鲜北方以地面部队为主的军队无法抵挡。当美国军队进一步推进时，他们甚至袭击了中国的村庄。这种外国势力对朝鲜的进攻让中国人民联想到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再次是外国势力的入侵，再次是整个民族在战后被外国统治的威胁。这不仅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还关乎民族独立和自决的基本情感。

当美国及其盟友将朝鲜军队逼到中国边境，并烧毁中国的村庄时，中国决定派遣志愿军支援朝鲜军队。在彭德怀将军的领导下，中国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这场战争对于当时内乱中的中国来说，既昂贵又血腥，但中国展现了其决心和军事能力。甚至毛泽东的儿子也参与了这场战争，并在战争中牺牲。联合国军队在战争中展现了极大的残酷，这一点在西方历史书籍中以及在韩国几乎没有被提及，甚至被提及时也受到惩罚。联合国军队在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后来在越南战争中也采用了类似手段。整个村庄被摧毁，支持北方的平民被杀害。

一个例子是老圃里屠杀事件。1950年7月26日至29日，美军在老圃里附近遇到了一群韩国难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美军士兵将他们带到一座铁路桥下，并在那里将他们全部射杀。长期以来，这场屠杀被掩盖，但历史学家揭示了这一真相，直到1999年才被广泛知晓。在1950年10月的江华岛屠杀事件中，数百名平民被指控与朝鲜人民军合作，并被大规模处决。此外，还有许多报告和证据表明，美国通过飞机投放瘟疫、霍乱等病原体，或使用被污染的物资，试图从内部削弱朝鲜人民。至今，朝鲜北方的许多地区仍受污染，这些地区的村庄中常见流产和疾病的发生。1952年，中国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邀请了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来调查这些指控。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确实使用了生物武器。然而，这一结果在西方国家中基本上被拒绝，并被视为宣传。在西方历史书籍中，这一客观事实被抹去，因为这与所谓的自由民主标准不符。然而，越南战争表明，这种生物武器确实是西方实现目的的手段。1953年的停战协议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僵持局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两国解决方案。

在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决定采取一种新的战略，类似于马歇尔计划在德国的实施或日本重建期间的策略，以大规模的宣传和操纵来掩盖其在韩国的新附庸国的控制。这种新的宣传策略至今仍然非常有效，影响着人们的主观真理，并创造了一种客观的假现实。这种影响和宣传策略基于三个主要方面。毫无疑问，这种美国的构建非常高效，并且在实践中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深远的作用。通过同样的构建，甚至可以重新吞并旧的殖民地国家，而普通民众则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且自己的意志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

1. 通过技术和资本输入加强经济实力
2. 单方面的信息流入并排斥其他信息
3. 表面上的个人自由与深层的附庸国体制

在通过技术和资本输入加强经济实力方面，我们看到了今天经济上成功的韩国。毫无疑问，韩国在经济上优于北方，这给人一种优越体系的假象，并被视为“唯一的真理”。然而，已经设定了明确的客观障碍，这些障碍通过新的词语定义被转变为主观的真理。至今，来自北方的书籍和信息在韩国仍被禁止，并受到法律惩罚。韩国的信息被掩盖，未透露韩国实际上是被美国占领的。韩国受创伤的民众受到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韩国甚至与曾占领韩国近 40 年的日本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信息扭曲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北方的事实现实。任何访问首尔战争博物馆的人都会发现，博物馆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美国英雄，他们为了韩国的自由而战斗。在整个博物馆中，没有关于北方的任何信息，也没有关于北方战斗心态的介绍。没有关于他们的观点或原则的信息。在博物馆的最后，只提到一句话：“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是共产主义战犯。”没有关于金日成或北方民众支持的信息。仅指出今天的韩国在各方面都优越和自由，因此北方是坏的。

信息被阻断，呈现的仅是主观视角，但在与韩国人对话时，这种主观视角往往会引发强烈的矛盾情绪。2023 年，韩国新总统甚

至在韩国的教育体系中取消了统一的教育内容。韩国的教育体系和信息运动甚至能够将国家被美国占领的事实扭曲到让人们真正相信他们是受到保护的。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日本在吞并韩国时也是为了保护韩国免受中国的影响。当然，美国的殖民统治不能与日本的残酷统治相提并论。但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层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只是使用了不同的术语：“自由”和“保护”。可以想象，如果日本在吞并韩国时使用了同样的宣传手段，并让人们支持亲日政府，今天或许可以争辩说，日本殖民者修建了铁路网络，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和解放。

美国宣传者巧妙地运用无处不在的定义和词语来触及人们的主观情感。可以想象，美国今天会说：“我们保护韩国，因此我们在你们这里驻军，你们必须听从我们的指示。没有我们的允许，不能与北方进行任何交流。”或者：“我们已经占领了韩国，你们的经济是我们的经济。你们的总统是我们的代表。因此我们在你们这里驻军，你们必须听从我们的指示。没有我们的命令，不能与北方进行任何交流。”实际上，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作为韩国的统治者都是客观事实。但简单的词语选择和美国附庸国的经济成功足以让人们和他们的幻觉得以维持。通过简单的手段，词语和语言学就足以影响整个民族及其主观视角，让他们感受到美国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真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重新定义术语一直是美国的主要战略之一，并导致了对共产主义的重新解读。但对此将在后文中进一步讨论。当术语被扭曲时，韩国仍面临许多基础设施的挑战，普通民众在贫困、排斥以及医疗和基础设施方面面临困难。这本应自动导致对体系的抵抗，人们会要求改变体系，以改善低收入者的经济状况，甚至追求主权和独立。2023 年 6 月，美国 and 韩国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规定韩国将为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提供财政支持。根据当时的报道，韩国每年将为驻韩美军的驻扎提供约 16 亿美元的资金。必须认识到，这 16 亿美元的资金原本可以为基础设施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因此，这个系统具有双重底层结构。在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韩国推广基督教及基督教教派，以确保意识形态的基本保障。这意味着：当人的境况恶化，物质或客观的真相，即生活条件本身变得不再可接受时，宗教的意识形态便成为了一个安全网，防止人们产生“错误”的思想。当展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的视角时，相关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朝鲜的视角是以独立和主权为核心，并聚焦于战争罪行和外部攻击。因此，DPRK 的人民也将这一真相视为主观和客观的真理，并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创伤之后，更加倾向于追求独立。对于这种在北方存在的强烈主观成分，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和相互尊重的方式来对待和理解。

2.4.2.2. 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支持朝鲜保持独立的同时，也肩负着防止外国势力再次占领中国的任务。朝鲜战争发生时，中国正在为收复台湾进行准备。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已经撤退到台湾，并自称为中华民国。因此，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些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中国人占领着这座岛屿。因此，谈论“台湾人”的独立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已经开始为对台湾的两栖登陆作战和入侵舰队进行军事计划。然而，朝鲜战争作为美国的一项战略性作战行动，转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收复台湾的注意力和资源。台湾被美国作为附庸国使用，因此中国的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朝鲜而不是台湾。此外，美国及其第七舰队占领了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对台湾的入侵。

然而，在 1971 年，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联合国大会以及美国和英国通过了第 2758 号决议，正式宣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台湾的代表不再在联合国拥有席位。决议的确切措辞是：大会“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

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们在联合国及其所有附属机构中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2.4.2.3. 与苏联的决裂

另一个冲突领域是与苏联的决裂。在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苏联的政策和内部改革发生了变化。此外，中苏之间还爆发了边界冲突，导致1969年在乌苏里江发生了武装冲突。两国对边界划分持有不同的看法。此外，苏联在1960年撤回了其在中国的专家，这极大地恶化了两国关系。这一事件也影响了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需要记住的是，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由于其历史，都会与邻国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争议。

2.4.2.4. 越南战争

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越南战争带来了另一项资源消耗巨大的挑战。中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支持了越南，包括提供食品等重要物资。尽管中国本身已经非常疲惫，但还是派出了技术顾问，帮助越南建设基础设施和防御工事。越南同样寻求摆脱外国势力——美国的控制，实现独立自主，并经历了美国生物武器的使用。然而，不同的是，这些行为被记录在案，世界各地的民众至今都知道这些罪行，这也导致了美国的支持率下降。这正是信息对于人们判断是非善恶、形成正确观点的重要性一个典型例子。

最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内外动荡与战争的洗礼。国内外的战争和动荡使中国不得不依靠自身力量应对所有这些挑战。这对人民来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导致了非常沉重的情感和文化负担。这种负担至今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需要被理解。在当时，没有足够的资源可用，然而不得不进行战斗，即使人们的生活尚未得到保障。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几代人。必须理解的是，中国人民并不热衷于战争和对抗，而是更加关心安全问题。他们注重纪律和相互尊重，

尤其是对避免被外国势力控制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信息交流、相互理解与尊重同样至关重要。

2.5. 开放时代与和平时代

“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极大地影响了今天的中国。在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境。“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邻国战争以及冷战的总体影响使得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处于疲惫状态。生产力低下，贫困普遍存在，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隔绝。

1978 年，邓小平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顶峰，并开始进行广泛的改革。这种改革方式可以称之为伟大。邓小平在保持马克思主义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引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做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融合，虽然可以被视为一种悖论，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和谐的运作方式。此外，中国也采用了一种双重策略，与西方进行互动，而西方通常会在其附庸国中应用类似的信息战略。至今，西方仍未理解这一过程的真正含义，也无法理解他们自己的策略如何反被中国所用。他们无法理解这一悖论，但另一方面，也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的和谐实施，因为他们并未继续深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书将对此进行详细探讨。

在中国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是高素质专家的使用，以推动国家的发展。改革开放政策始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密集磋商。邓小平和他的盟友首先必须说服党内坚持毛主义计划经济的保守势力。这展示了邓小平非凡的外交技巧和卓越的战略论证能力，他成功地展示了市场导向经济的优势。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还进行了出国考察，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这种从最优秀的人那里学习的传统自古以来就在中国存在，早在帝王时代就是如此。邓小平 1978

年的新加坡之行尤其值得注意，他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国家的经济成功。

这些访问帮助邓小平收集了成功改革的具体实例，并加以调整和应用。中国还特别邀请了外国专家和顾问，提供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建议。这些专家带来了宝贵的知识和国际最佳实践，为许多改革奠定了基础。对此，邓小平有一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这描述了逐步推进改革的策略，特别是在风险最小化的情况下，以实验性的方式推进。另一句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校训的话是：“实事求是。”这源自汉朝哲学家王充的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指导原则。实践证明，成功的改革确实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一理念至今仍然是中国实践导向发展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以改善物质生活标准为重点的持续发展。

2.5.1. 与国际机构的合作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开放政策，是通过与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的密切合作得到极大推动的。这些合作以及世界银行的作用，对于中国改革的设计和实施至关重要，推动中国走上了通往市场经济和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与美国进行双边合作以实现市场经济改革，可能会迅速陷入依赖状态，进而威胁中国的主权，就像在德国、韩国或日本发生的情况一样。因此，中国战略性地将重点放在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上，这些组织由于其特殊的责任性和中立性，以及中国作为联合国成员的自身控制权，更容易被中国社会接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稳定中国货币和推进经济改革方面提供了支持。通过获取 IMF 的资源和技术援助，中国得以进行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整。联合国（UN）及其下属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粮农组织（FAO）和国际劳工组织（ILO）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培训和实施各类开发项目，帮助中国在农业、教育

和劳动市场等领域取得进展。亚洲开发银行（ADB）通过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发展和区域一体化。

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开放和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为中国提供了广泛的技术支持和建议，涵盖了经济改革、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改革和减贫等多个领域。世界银行帮助中国分析并实施基于国际最佳实践的战略。直到今天，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合作与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减贫方面。世界银行为中国的许多发展项目提供了贷款和资金支持，这些项目包括道路、桥梁、能源设施、学校和医院的建设，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世界银行还通过提供培训和教育，帮助中国建立执行复杂发展项目和经济改革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世界银行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分析，为中国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宝贵的见解。这些报告帮助中国政府做出明智的决策，并不断调整改革战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Luban-Cangzhou 水利项目。从 1981 年到 1987 年，世界银行为该项目提供了 1.47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提高中国北方平原的农业生产力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北方平原是一个具有巨大农业潜力的地区，但存在水资源管理效率低下和灌溉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该项目旨在现代化灌溉系统，优化水资源利用，并提高农业产量。项目还建设了排水系统，以防止洪水并改善土壤肥力，同时对当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培训，并传授了新技术。此外，还对管理和维护层面进行了深入培训。

2.5.2. 双边合作与投资

此外，中国还发展了双边合作。其中，中国通过的第一部法律之一就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该法于 1979 年 7 月 1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于 1980 年 1 月 1 日生效。该法开创了一种中国政府与外国企业之间全新的合作模式。迄今为止，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合资企业的例子。

1984 年，大众汽车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合资协议。中国的合作伙伴是上海汽车工业公司（SAIC），双方共同成立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众汽车持有 50% 的股份，另 50% 由上海汽车工业公司持有。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合作促进了技术转让，并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机会，尤其是在供应链行业，同时也帮助中国达到了国际标准。对于大众汽车来说，这意味着开拓市场，并在整个中国市场中占据了领先地位。首款在中国生产的车型是大众桑塔纳。1985 年，上海开始生产桑塔纳，这款车迅速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车型之一，象征着经济开放的成功。特别是，这样的关键产业在中国社会中成为了支柱产业，就像在德国一样。我们不能仅仅把它视为一个汽车制造商，因为每个汽车零部件都有自己的生产基地。仅仅为了生产汽车的一个部件就可能需要设立一家工厂，而这又创造了成千上万个新工作岗位。对于德国汽车制造商来说，至今仍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的工作态度，这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显著优势。在中国，由于文化、历史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影响，人们工作非常努力，这与汽车制造商的效率和生产方法高度契合。桑塔纳车型为其他国际汽车制造商树立了榜样，他们也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巨大增长和多样化。

此外，日本也看到了投资的机会。日本曾经历过美国收购其企业和控制其经济的过程，深知这一切的影响，因此它对中国的看法显而易见：中国不仅拥有低成本生产的潜力，而且还可以通过现代经济控制手段进行利用。作为中国生产企业的股东，日本实际上可以了解内部发展情况。对于中国来说，这确实存在风险，但由于政府始终持有企业股份，这种双重策略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更大的收益。日本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此外，欧盟，尤其是法国和美国，也带来了投资、技术知识以及新的方法和技术。

尽管松下是第一个日本投资者，但 1983 年捷太格特株式会社（当时为光洋精工）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成立的合资企业上海光洋轴承有限公司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标志着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紧张和中国经济孤立之后，日本和中国之间经济合作新时代

的开始。该项目主要生产轴承，如滚珠轴承和其他精密轴承。轴承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业，特别是在发动机等旋转部件中。对于不熟悉技术的人来说，可以将齿轮想象为推动物体旋转的部件，而轴承则是通过高速滚动的球体使得旋转成为可能的装置。通过轴承，两个移动部件之间的摩擦得以减少，因为这些球体在两个环之间高速滚动。由于日本与德国一样达到了很高的质量标准，中国企业也因此能够将产品质量提升到最高水平。这是供应链行业的关键项目。该项目的成功实施有助于增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信任，并为更多日本在中国的投资铺平了道路。

2.5.3. 学术合作

除了经济合作外，中国的开放还使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得以进入世界各地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国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一点自封建时代以来已经得到验证——是向最优秀的人学习，从成功和失败中汲取教训。从世界各国收集知识，并对比结果和经验，形成了中国至今的成功模式。如今，这些知识通过中国高校传授给外国学生，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能从中国的经验和对比中受益。国际交流项目对于培养中国的专业人才至关重要，并有助于将国际标准带入中国。私营非政府组织（NGO）和咨询公司也在这一过程中提供支持。

2.5.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与中国省份的角色

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制度，必须考察邓小平引入的众多制度和经济战略。这些战略基于合作和投资，决定了调控全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在西方社会中尚未完全理解，也没有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详尽观察。通过这些重要的改革，民主也得到了加强，并且在习近平时代通过法治结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关于习近平和当前的现代社会主义政策的讨论将在后文展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得到了广泛的自由化。这类似于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自由经济，当时进行商业活动几乎没有法律障碍。投资者有几乎无限的可能性开展业务。集中化的经济政策大大放松，形成了社会主义竞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一方面存在纵向的基本框架以提供补贴。中央政府的计划和年度计划与市场经济并行运作。某些特别值得促进的产业在特定时期会获得特别的补贴。这些产业可以通过外国投资者获得推动，同时通过中央政府的补贴进一步加强。一个特别值得促进的产业例如至今仍然是农业产业。由于过去严重的饥荒，长期稳定的需求被高度重视。此外，投资者也享有长期的规划安全和最小的风险，因为政府会提供支持。

在横向层面，各省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形成了竞争关系。各地政府被置于一个竞争环境中，其目标是极大地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这种竞争尤其由中国共产党推动，成功的省份会得到财政奖励，相关人员也会获得晋升。这种省份之间的纵向竞争也为企业家创造了竞争和激励机制。另一个激励机制是设立特殊经济区（SEZ）以及中国各地的特殊特权和专业化。此外，中国向国际贸易开放，并于 2001 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2. 5. 1. 1. 中国的自治区和少数民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 56 个少数民族。根据这些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设立了多个自治区。这些自治区包括内蒙古、西藏、新疆、宁夏和广西。这些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事务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从而能够特别促进当地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和传统习俗。在许多自治区内，政府支持双语教育。自治区有权促进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在教育政策方面，特别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视角、历史和医学，以保留其独特性。传统节日和习俗得到了保护和推广。在政治上，这些地区的领导人通常来自相应的少数民族，这加强了少数民族的政治代表性和参与度。这些特殊的促进措施在西方往往被忽视了。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支持甚至超越了地方层面的推广。少数民族在创办企业或在其他省

份就读高等院校时，面临的门槛较低。此外，法律体系也考虑到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进行了调整。

2.5.1.2. 特别行政区（SAR）

在特别行政区内，为了进行特定的经济实验，拥有高度的经济和行政自治权。香港就是这样的特别行政区，澳门也是，此外还有中国的台湾省，尽管它目前仍由中国内战时期的分裂势力占领，并且尽管有联合国的决议，但仍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现代西方信息世界的一个重大误解是认为特别行政区的结构会被完全改变。例如，在与被英国殖民和占领的香港的回归过程中，曾有传言称香港将被完全纳入中央集权的系统中，必要时甚至会使用武力。然而，这种错误的描述也是由于缺乏客观信息而形成的，基于一些缺乏西方信息中心专业知识的个体的主观感受。相反，香港仍然是一个经济实验的特别行政区，其目的是利用香港的经验 and 知识来惠及全中国。这是中国的战略——将差异视为机会，尊重这些差异，并与这些矛盾和谐共处。

香港、澳门甚至台湾至今仍拥有自己的货币，甚至有自己的法律体系。香港采用的是英国的普通法系统，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采用大陆法体系，以便观察这些差异，并找到对人民最好的解决方案。此外，香港的殖民化以及台湾目前的“殖民化”显示了同样的社会工程模式。这不仅仅是通过派遣士兵驻扎并通过物理暴力展示控制或占领这些地区的问题，而是通过直接使用特定的修辞来引发主观情感。间接殖民化是通过使用特定的修辞，并同时传播重新定义的自身真理内容。例如，“我们带给你们自由，而共产党夺走了你们的自由”这样的说法就是一个例子，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在后文中详细探讨。

2.5.1.3. 特殊经济区（SEZ）

此外，中国还设立了具有特殊经济法规和投资促进措施的特定经济区，这些地区还具有技术特色。这些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实

验和改革，比如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或海南。深圳，紧邻香港，是中国的“硅谷”。在城市中心的山顶上矗立着邓小平的雕像，他将这座曾经的渔村发展成了一座高度创新和先进的都市。如今，深圳被现代高楼环绕，绿色的环境和轻松的生活氛围让人联想到时尚的柏林社区。这座城市为居民提供了一个田园诗般的、和谐的生活环境。深圳特别注重科技发展，有像华为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和它们的科技园区驻扎在这里。深圳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典范城市。

2.5.5. 社会不平等与腐败

中国市场的改革和更新在带来诸多无法控制的变化变化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例如，腐败现象有所增加，党内纪律下降。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的问题，但在党的控制下，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得以运转。中国早期就着眼于消除贫困，帮助农民和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然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增加，加工业的安全条件低下，政治上，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金融实力也随之增加，而金融实力带来了国际影响力以及新的责任。因此，在西方的视角下，中国被视为一个不断壮大的国家，面对着日益增加的批评。

2.6. 中国过去的痕迹留在人们的骨子里

回顾历史，读者应当明白一个事实：中国人民是一个能够忍受苦难的民族。特别是 20 世纪，中国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挑战，对于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尤其是来自西方的人来说，这些挑战可能很难理解。尤其是当人们没有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抗日战争以及中国人民内部的斗争时，这种理解就更为困难。中国一直试图通过革命性的决策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些决策，如经济开放，取得了成功；而另一些决策，如“大跃进”，在实践中失败了。这些决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改善。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决策很难简单地被判定为好或

坏。因为每个决策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经验，这些经验在现代世界中被吸取，并且不应再重蹈覆辙。

要理解当今中国人民的心态，必须认识到，他们在过去经历了许多苦难，这些苦难远远超出了抗日战争的范围，还包括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将中国推向了毒品瘾的深渊，以达到控制的目的。现代的“鸦片战争”是通过西方信息中心的策略进行信息和操纵，试图使人们的思维混乱。与单纯地使人们麻痹和顺从不同，现代的战略旨在将他们变成外来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但这一点稍后会详细讨论。中国人民及其经验是主观性的产物。若不具备任何客观基础，仅仅用西方的主观性来交流，将会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巨大的误解。

第 3 章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约公元前 5 世纪

如果对这句话进行现代化的诠释，它可能会是这样的：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随心所欲地改变敌人，并通过这种方式取得胜利的人，称之为神。”

3.1. 重新语境化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就像人的心境也不会保持不变一样。生与死、阴与阳，这都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没有什么能够永远存在。为了取得进步，变化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当一切都在变化时，稳定性变得尤为重要。这种稳定性需要与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或者说与任何新创新的起源核心相连接。如果变化脱离了其起源核心，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而旧有的事物将瞬间失去其意义，甚至其存在的价值。实际上，它变成了一种脱离原有联系的独立事物。如果一切都失去了其起源和价值，那么人类就会陷入无尽的无意义之中。没有人会记得几千年前祖先的名字或他们的功绩，他们似乎毫无意义。然而，他们却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原因。他们的斗争、他们的历史，虽然可能已经消失，但却通过我们的血脉和心灵延续下来。因此，只有保持人类文明的基石，以及文化、传统和基本定义，才能使每一步发展、每一次创新和每一句话语在延续人类历史时得以发挥作用。

然而，如果整个文明仅仅保留了名称，而其全部内容和意义都发生了变化，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它的良好习俗、其物质基础和特征也会发生改变。这不仅适用于文明，也适用于政治或社会。当世界的物质条件由于如美国等国家的集中经济力量和金融资本而发生变化时，相应的垄断及其主导的物质影响力将扩展到周边国家的国家认同，甚至经济本身。这意味着，主导力量及其影响范围可以重新定义其主导的定义和词语。语言是可变的，基本含义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在西方被从其原始核心抽离出来，并以最荒谬的方式进行了再发展，虽然继续使用了象征性的符号，如镰刀和锤子，但其实质内容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毫无关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其自由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形式。同时，在中国等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不仅得以保持，而且通过历史上的多次灾难，不断深化和现代化，并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和改进。

重新语境化方法是西方宣传的常用手段，旨在改变人们的心灵和逻辑，通过新的定义彻底改变事物的意义。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中心，信息通过传播、娱乐和说服的方式被传递，以增强特定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叙事是沟通中的一个强大工具，它使人们能够通过简单的词汇和修辞手法，轻松理解复杂的问题，并与之建立情感联系，从而形成自己的真理。因此，在全世界的殖民国家，甚至在前苏联国家，乃至俄罗斯本身，马克思主义被以最初级的形式解读，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通过西方的重新语境化方法与其核心分离，并从特定的视角在社会中以其主观真理的形式加以理解。任何不是在中国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人，都会受到重新语境化方法的影响，西方的教育体系自苏联解体以来也不例外。我们只需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人们立即想到的可能是征收财产、计划经济和“红色”恐怖或压迫。然而，当今天人们看到中国时，他们发现中国的人们比那些所谓的自由制度下的人们更加自由。面对这样的事实，同样的人会说：“那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这些人从未从中国的角度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或物质辩证法，而是以西方的重新语境化方法为基础进行思考。由于他们生活在成功宣传的社会中，这些人自认为比拥有 14 亿人口的中国社会更“聪明”且“更有文化”，而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与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或物质辩证法一无所知却表现得像殖民统治者一样，并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中国人的人交流，可能是非常荒谬的。

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词语？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概念？词语和语言本身是否已经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幻想，我们赋予它们意义和深度？谁来定义，谁来决定哪个词语有何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词语和定义是否也在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习俗和价值观在变化，语言本身及其含义也是变化的，不受限制的。实际上，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语言的幻想结构上的，与物质现实的联系很少，而仅仅是用来塑造物质结构和目标的工具。当涉及到社会工程学、逻辑和我们的思维方式时，语言被用来通过宣

传和价值观的改变影响人们的心灵。与物质现实的矛盾在人民的头脑中产生矛盾的、心理上排斥的反应，真理也因此带有情感的印记。

当人们一方面批评苏联的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认为其工作过于繁重，人们缺乏自由，另一方面又认为今天的共产主义者是不愿工作的人，主张征收富人的财产并批评权威，要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时，这种矛盾就变得十分明显。这是一个悖论，它将所有“坏”社会的负面特征集中在一个词上：“共产主义者”。这种西方主导的重新解释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社会的思维方式。那些想要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试图颠覆整个西方社会形式，甚至宪法本身的人，通过这种重新解释，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和词语都被重新定义，并且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无法为新的思维方式留出空间。语言本身迫使人们处于一种位置，控制他们的行为和逻辑思维，从而影响他们自己的真理。语言作为对环境的感知工具，也作为发现真理的标准。

在艺术上，控制敌人的方式是通过改变敌人的本质。用羊群的语言与它们交流，并赋予这语言新的意义。告诉它们，应该奔向狼群，但却要告诉它们，狼并不是狼，而是它们的解放者。“解放者”这个词语在它们的语言中充满了说服力，使它们盲目地追随。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反向运作。牧羊犬不再保护羊群，而是被视为限制它们理想中的无限自由的存在。像食物或围栏这样的物质价值，突然之间被看作是自由的剥夺。因此，狼成了它们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但狼不再是狼。单靠旧的“狼”的说法无法奏效，因为在羊群心中，狼这个词语仍然带有负面的情感，由此产生了负面的主观真理。因此，必须通过宣传进行重新语境化。宣传在教科书、各种媒体和所有掌权者的口中，将狼描绘成英雄，从而理想化地改变内容，尽管物质现实并未改变。没有人能够逃脱这种重新语境化，因为这种重新定义被强行灌输给大众，直到他们毫不怀疑地感受到狼是他们的“救星”。客观上真正保护羊群的狗，被视为主观上的威胁；而客观上真正想吃羊的狼，则被主观上视为解放者。狼变得更狡猾，开始在暗中吃掉羊群，但随着宣传的

力度和时间的推移，狼甚至可以在羊群面前吃掉它们，而羊群的主观视角仍然会将狼视为英雄，直到整个羊群在物质上自我毁灭为止。当前的世界事件（稍后将详细讨论）展示了这一宣传艺术的最高境界：即使狼在吞食羊群，羊群仍然相信自己是被狼解放的。即使身体的痛苦被感受到，它们仍然会忍受，因为新的理想主导了它们的思想，因为它们被灌输了这样的修辞。这是控制羊群的艺术，是编程羊群的艺术，也是通过理想主义接受痛苦和毁灭的艺术。

然而，尽管这种大规模的控制是有效的，但只要世界上还有地方，仍然有人把狗视为保护和引导羊群的狗，狼是吃掉羊群的敌人，那么就不可能完全重新定义一切。在这些地方，真正的生活条件主导了实践，而不是理想化的文字游戏和修辞性重新编程。在这些地方，狗被视为保护者英雄，狼仍然是敌人。这里的保护者形象和狗的职责不断发展，围栏不断被延伸，食物供应也在增加。在这些地方，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实践。

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它们的历史和文化，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将在未来根据物质条件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基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基础上的过程，但通过一系列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不断调整和改进。像卡尔·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物质辩证法，或者列宁进一步发展的党组织作为人民先锋队等核心要素，是不可改变的。任何试图改变这些基本要素的行为，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定义，而会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产物。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经济体系构架，而世界在其经济条件中不断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也在其核心要素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改革是这个过程的体现——或者说，革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持续（物质）革命。世界的外部条件在变化，内部的核心要素却保持不变，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定义的稳定性及其发展的过程。

因此，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也意味着，西方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改变。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在于：脱离核心定义。由于核心的腐烂，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存在巨大不稳定性，而外壳却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的色彩。西方体系没有兴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毕竟马克思主义是其自身体系及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理念的对立面和敌对元素。再重申一次：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和经济现实主义。西方的理想主义及其极端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是基于自由人类原则的精神思想，远离物质现实。于是，西方“新”共产主义的情感虚幻性通过操控和传播新的自我解释得到了积极推动，并成功地植入人们的心中。同时，所谓的西方自由理想的原则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能够控制大众的视角，并由于缺乏替代选择而使他们的视野模糊不清。

在学术研究中，“重新语境化方法”被广泛使用。通过将文本、图像、符号和其他文化表达形式从其原有的背景中剥离，并置于新的背景中，从而改变其意义。新的环境会在时间、地理、文化或媒体上影响这些文本或符号的解读。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者更多关注这一方法在文化或文学讨论，或在市场广告领域的应用。然而，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这一方法的重点将脱离这些学术辩论，而应用于政治语境和国际理解领域。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语境化几乎无法发生，因为人们无法接触到之前的定义或替代选择。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信息被有意隐藏，错误信息被广泛传播。这不仅仅涉及政治语言的不同解释或重新解释，还关系到现有的信息，逻辑构造，以及关于真理的认知。这是一种社会工程的整体概念，远远超出了简单的重新语境化。它是基于不同信息的思维和逻辑构造，通过信息洪流的轰炸，使宣传深入人心。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重新语境化方法，这里有两个例子：

一个极右的德国政党 AfD 的政治家在 2024 年春天的公开演讲中使用了口号“Alles für Deutschland”。随后，他因使用这一口号而被判处巨额罚款，因为这一口号在二战期间被纳粹使用，

因此法院认定这一口号的原始背景仍然适用于今天。尽管这一口号在当代公众中与纳粹的联系不为人知，但法院认为其意义没有改变。这种惩罚的严重程度可以类比于像“Arbeit macht frei”这样的口号，该口号在集中营中使用，在公众中广为人知，并且与背景有着强烈的联系。

与此相对的是，乌克兰政府以及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自乌克兰战争以来，在多次演讲中使用了“Slava Ukraina”这一口号，例如在 2024 年 6 月 11 日的联邦议院演讲中。这一口号同样来源于二战期间，被法西斯分子用于屠杀人民和传播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中。这一口号在公众中也广为人知，带有法西斯主义的背景。因此，按理来说，在与 AfD 政治家口号的平行比较中，德国总理使用这一乌克兰口号也应受到惩罚。

德国记者 Florian Warweg (Nachdenkseiten) 在 2024 年 6 月中旬的联邦新闻发布会上询问了政府发言人 Hebestreit，关于总理使用这一口号的动机。发言人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将此类情况置于俄乌战争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背景下看待。这个口号在当今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表达了对一个自由、民主和欧洲化的乌克兰的支持。我知道这个口号曾有过历史上的含义，但现在的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任何试图将其重新定义的努力，我都会坚决反对。如果你环顾世界，许多西方领导人也在使用这个口号，以纪念乌克兰人民对抗俄罗斯的英勇抵抗。”

不论对这一讨论的深入探讨，这里特别明显的是，只要政府或“西方大多数政治家”愿意，任何口号都可以重新语境化。这是一个深刻的认识，涉及许多政治层面。它也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因为这意味着西方政治家认为他们有权对文化进行判断和定义，而不考虑现实或真理的尺度。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合作伙伴，如前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曾被视为合法的自由民主总统，他明天就可能被称为独裁者和压迫者，而不需要任何理由。无论现实或事实如何，意义都可以被突然重新定义，内容也会随之改变。这种

风险同样适用于像沙特阿拉伯或卡塔尔这样的国家，它们随时可能被重新语境化。

回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领域，“共产主义”在现有的负面观点基础上被重新定义，而在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学者们保留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核心要素，并根据具体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整和发展。然而，通过重新语境化，这些在西方的发展被忽略了，并被填充了新的自由主义内容。接下来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解释。

3.2. 西方自由主义作为“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在原本奉行市场自由主义的国家中被重新语境化。在此过程中，物质辩证法作为核心概念被移除，以及列宁关于党的领导的概念也被剔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概念。这种重新语境化非常成功，至今在全球范围内主导了几乎所有的信息中心，唯独社会主义国家除外。

3.2.1. 西方的“新左派”

当前自称西方共产主义者的形象主要受到各种“新左派”思潮的影响。这些思潮多种多样，各有不同的特点，每个人都追随自己的理想，而这些理想与经济的物质辩证法相距甚远。当新左派谈论阶级斗争时，却往往与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即那些在工厂等地工作的人的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道，资本主义本身及其物质环境总是导致社会的分裂，使社会分裂为越来越多的个体部分，而不是促进集体和社会的团结。因此，社会主义也被个体化和自由化。如今，每个个体都生活在自己的幻想泡沫中，实际上却只是在追随一种结构：资本主义本身，并形成了一种自认为优越的理想主义泡沫。今天，每个西方社会主义者或非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解读都不尽相同。现象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原因在于，巨大的信息

缺口被主观的、情绪化的“真理”所填补。大量的重新语境化和在保留基本社会主义符号的前提下进行的虚假信息传播，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形成了独特的理解，而无视了实际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像物质辩证法这样的基本原则了。

这些新左派及其思潮可以分为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通过一个原则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分歧通过“民主讨论和多样性”得到正当化，但却严重缺乏任何一致的团结、自我批评、纪律、勤奋或权威行为，而这些恰恰是社会主义的反面。例如，“同志”一词来源于农业社会，在那里，农民们为了共同耕种土地而成立合作社，其经济（物质）现实是生产的成果才是目标。通过一致的团结，艰苦的工作得以完成，从而他们共同获得成功。因此，这些术语本身就源于团结和物质辩证法。如今，这个词被异化使用，自由的理想主义者，追随那些没有物质现实基础的目标，利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新左派”基于多种思潮和不同的团体，这些团体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的。新左派并非通过物质辩证法，即通过实际的现实情况来决定情况，而是通过理想和幻想，这些与实际的现实相距甚远，因此也不会民众中获得支持。

其中一些著名的团体是托派，他们是列夫·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托洛茨基曾被斯大林追捕。其他分裂出来的团体建立在他的思想之上。托派的代表是当代的经典无政府主义者或左翼极端分子，他们认为世界处于不断的革命之中，没有边界，所有人都应统一。他们是今天那些最为主张开放边界的人，无视经济物质问题、文化冲突以及安全风险。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一个大批评家，斯大林主张国家边界，特别是强调本国文化的表现和发展，这意味着在斯大林看来，不同的地区居住着不同的文化和人群，他们的文化发展应该得到认可和推动。

托派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所有人应有一种文化——实际上这就是现代西方霸权国家所追求的概念。因此，他们不支持多极世界秩序，而是支持由西方单极霸权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此外，托派批评苏联共产党的权威和领导。他们是现代社会主义中国和

俄罗斯的大敌，支持美国的霸权野心。托派希望通过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所有人都被统一起来，成为他们的理想主义梦中的样子。然而，实际上，托派自己并不是企业中的工人，而是来自学术、理论背景，主要是学生或公务员。这是因为托派是理想主义者，受到重新语境化方法的深刻影响。他们不看经济现实，而是生活在一个远离实际“工人”的梦中，正因为他们的理论在他们的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也就是说，物质辩证法，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梦话。

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SO）就是这样一个托派组织，曾在美国活跃，专注于组织工人和学生。其他形式的组织则表现为像 Marx21 这样的组织。他们的目标是通过革命手段改变社会，克服资本主义。Marx21 和托派常与激进组织如反法西斯运动（Antifa）合作，后者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手段来塑造理想主义世界。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已经成为一种理想主义法西斯主义形式。这些团体强调文化和社会变革，而非经济变革。因此，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思潮越来越多地占据了辩论的中心。这意味着学术界的临时情绪被抓住，并通过各种公共宣传手段加以传播。因此，他们支持 LGBTQ，即认为性别不限于两种的理想主义思维。他们还支持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和动乱，以便推动理想主义原则。他们自称这是阶级斗争，或者是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压迫的斗争。这些新理想主义左派在西方的其他形式，包括德国的“反德”团体。他们明确声援以色列和反犹太主义，并支持美国，并认为作为德国人是一种耻辱，甚至认为德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耻辱。他们是这些群体中极端理想主义的一种形式，希望德国永远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控制，并消灭自己的德国文化。他们批判民族主义，极力支持自由主义思维。在经济上，他们反对核电或燃煤发电，关注自然保护，而忽视经济和工业的灾难性后果，如高昂的能源成本及其带来的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

总之，这些所谓的“新左派团体”追随的是反对国家思维和经济思维的理想主义原则，因而对整个社会的安全、发展和基本利

益构成了威胁。“左派”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左派”，而是明显的自由主义、反经济主义和托派。这是修辞重新语境化的一个显著例子。

3.2.2 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语境化

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是公私利益分离的天然敌人。通过全社会的团结促进合作，而不是对抗和分裂。自由主义体系反对这种现象，强调个性，并将每个人都在相互竞争而不是合作称为民主，“胜者全得”的思想盛行。因此，自由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天然敌人和对立面。因此，研究了语言、修辞和社会工程的思维结构如何改变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得到了西方金融体系的支持。最终，它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地通过大众宣传推行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

因此，他们在修辞上完全重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利用语言工具保留了共产主义的表象，同时保留了革命性的托派和无政府主义核心。理想主义因此成为核心。一个原则是批判理论和社会批评，重点关注文化和心理视角，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统治和压迫机制。如今，如果辛勤诚实的工作带来了心理压力，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将其视为资产阶级试图压迫人民的手段。因此，他们明确地将物质与理想分离，心理因素与物质现实脱钩。

另一个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或权威社会主义国家异化的尝试，是通过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对文化工业和媒体的批评。在他们的作品如《启蒙辩证法》中，他们批评了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利用文化工业和大众媒体来操纵人们，并使他们保持在一种被动和顺从的状态。然而，他们的批评和分析却被用来加深人们对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操纵，而不是被视为批评，西方宣传正是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的。在一个社会中，信息流动、教育和启蒙对于提高物质意识是必要的，尤其是当它们坚持社会的核心要素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错误的信息可能会导致削弱像物质辩证法这样的基本要素，但像中

国这样的国家的核心教育可以在现代多极世界中创造相互理解，使得所有人共同摆脱贫困，解救了八亿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文化工业是必要的，以维持社会和文化的核心理想，而不是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他们的媒体批评所做的那样。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物质辩证法中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经济基础决定一切，也就是说，实践是决定性的，而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础则是为了指引方向。在之前分析的基础上，人们总是被主观的“真理”所包围。作为人类，从根本上不可能完全客观地看待一切，因为我们根据各自的经验形成了不同的“真理”。因此，主观的因素在需要阐明核心价值观的地方作为意识形态的优先考虑是必要的。而文化则来源于我们的直接经济环境，是我们身份和我们物质环境的形成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将社会学、精神分析和哲学等元素结合在一起。他们将理想主义的、心理学的观点整合在一起，而这些观点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们不是物质存在的，而是纯粹的思想存在。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发展对社会互动的更深入理解，并追求社会心理学的路径。但这种方法正是与物质现实，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现实相对立的——它完全是理想主义的，也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相对立。2018年至2019年，我曾在德国一个小城镇担任地方政治家，进行过大量的挨家挨户访问，也与居民进行了本地对话。在发达的德国小镇上，人们在谈话中总是关注物质保障的相关性：经济实惠的住房、夜间的安全、能够养家糊口的高工资、儿童的抚养、或有更多的公园以及没有坑洼的道路——这些与学术界理想化的解放自由世界无关，而是与他们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思想。当与一些在北京留学的非洲居民，如来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交谈时，也是类似的情况。人们希望生活在安全中，并拥有良好的基础和基本保障；他们不关心谁执政或政体的形式，更不关心西方的理想主义或西方精神的解放，尤其是在性领域的解放。他们关心的是物质经济基础。然而，法兰克福学派、

新左派及当今西方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学术精英们并不理解这些经济基础。相反，他们更加关注学术理想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这些学者的另一个理想主义解释是关于解放和个人自由的问题。因此，他们关注的是从心理和文化压迫中解放出来。理论家（不是实践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埃里希·弗罗姆引入了更自由和更个体主义的解放视角，这些视角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更为集体主义和经济中心的观点截然不同。荒谬的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完全割裂了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现实。马尔库塞创造了“压抑性去升华”的概念，认为社会中的自由只不过是为了使人口处于压迫状态，从而中和革命的潜力。这种方法特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再语境化，马尔库塞的自由观点重新语境化了经典的物质马克思主义。

因此，在物质马克思主义中，人民的解放，即在市场中的自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要经济基础属于人民并且以人民的利益行事。然而，马尔库塞实际上提出，自由的经济自由是资本主义的工具，这在实际的现实中，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形式中，是不现实的，反映了经典的重新语境化。

但事情还变得更加荒谬：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释放被压抑的人类需求和愿望，无论是性方面还是创造性或智力方面的。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是一种压制性结构。因此，恋童癖或当前社会中的多种性别角色得以形成，这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理想主义的、甚至是梦幻般的、无边界的自由资本主义形式。需要再次明确的是，资本主义使社会个体化并分裂，以最大化利润，而不顾物质现实或社会现实。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重新语境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理想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当这种“解放”的冲动在各种层面上被优先考虑时，可能会导致法西斯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成员埃里希·弗罗姆，通过对新形式的自由和解放的解释，进一步超越了这些激进的理想主义理论，并紧密连接到托派的理想，认为人们害怕（精神上的）自由，因

此追随权威。因此，自我实现和精神自由的必要性是他所关注的视角。弗罗姆的理论也被称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心理解放。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最终追求的是个人自由和心理解放，而不是关注物质经济维度的重点。事实上，这些托派和理想主义理论在与经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中占了上风，并且甚至被采纳，这清楚地表明了西方托派的重新语境化。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纯物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已经存在根本的矛盾。因此，更应该将其视为一个新词的创造。现代左派的图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理想主义，更多地与黑格尔和德国精神哲学联系在一起。它是理想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在这种思潮中，这些学者认为任何形式的精神压迫都应该被对抗。当这些结构与当前的社会状况联系起来时，许多事情变得清晰起来。很明显，这些基本理论在教育系统、学校、幼儿园、政治甚至行政管理中得到实施，这也解释了为何身份认同和 LGBTQ 达到了性解放的极高形式，以至于 LGBTQ 的旗帜在公共机构的市政厅

上飘扬，导致了社会的物质衰退。法兰克福学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家私人基金会由约翰·D·洛克菲勒于 1913 年创立，是美国最古老的组织之一，旨在根据自定的标准促进智力发展和公益。在这一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了智力和科学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创新方法，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重新语境化。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法兰克福学派出版物的传播。这些出版物通过书籍、文章和讲座得以传播，对 20 世纪的智力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社会整体发展，尤其是新左派直到今天在整个西方主导的教育系统中的基石。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特别有助于发展对文化、社会和政治的批判性分析，涉及资本主义、大众媒体和社会正义。通过资金支持，不仅理论概念得到了完善，也使得新的思维方式得以向广泛的公众展示。这促

进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在学术界和公共辩论中的传播，从而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力，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约翰·D·洛克菲勒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企业家之一。他于 1839 年 7 月 8 日出生，1937 年 5 月 23 日去世。洛克菲勒因创立标准石油公司而闻名，他将其发展为一个垄断企业。他的商业成功使他成为当时最富有的人之一，也是首批个人财富达到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人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社会科学中的新创新方法。这也意味着支持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研究。约翰·D·洛克菲勒及其家族成员以及基金会本身都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些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体系和他们所支持和推广的市场经济构成了威胁。洛克菲勒基金会主要资助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相一致的项目，并支持资本主义秩序。就法兰克福学派而言，可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促进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洛克菲勒基金会在 20 世纪 30 年代资助了与资本主义体系不直接对立的智力工作，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直接推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种形式的资助就是一种重新语境化，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符号，但在内容上植入了自由主义观点。直到今天，这些影响仍然显著。

另一个赞助者是费利克斯·魏尔（1898-1975）。他是德裔阿根廷知识分子和赞助人，对社会研究所的成立和资助起到了重要作用，该研究所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

3.2.3. 法西斯无政府主义主导着当今西方的民主结构

法西斯主义是理想主义的极致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心理梦幻世界中的精神理想被用作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工具，遵循黑格尔的思路，而不顾实际的现实情况。法西斯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种族主义。种族理论和种族隔离本身就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形式，其中人们根据幻想被划分为低等和高等。当前社会中的法西斯主义表现为通过法西斯宣传方法在社会中推行心理、身份认同和性解放的理想形象，这些方法包括媒体、教育系统甚至文学，它们都专

注于解放这些方面并脱离任何物质现实。本质上，可以说一个人可以在精神病院中坐着，整天沉浸在自己的混乱梦境中，完全脱离物质现实。这可能是自由的最终形式。

作为一名德国作者，这里以德国社会为例，探讨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法西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经济主义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由于采用了重新语境化的方法，许多经典的政治思潮被填充了异化的内容，导致人们无法明确区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普通民众无法清楚地分辨法西斯主义、左翼极端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中间派的各个政党中，无论是社民党（SPD）、基民盟（CDU）、自民党（FDP）、前左翼党（Die Linke）还是绿党（Grüne），都出现了同样的模式，即心理价值观主导了政治发展。在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重心转向了心理理想的实现。在国际政治中，关注点变成了女权主义外交政策，而不是经济发展。文化和经典的发扬被个体的幻想所取代，成为社会的中心。德国社会不再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在全球经济上共同发展，也不再寻求在技术领域取得新的进展，甚至不再寻求通过合作实现人类经济文明的新高度，而是追求一种心理文明的新高度。

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它消灭了文化，并用身份认同的心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这导致了与经典的经济自由主义思维、文化保守主义思维以及国家权威马克思主义思维的诸多矛盾，整个社会因此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因此，经济问题和基础设施以及系统的物质衰败也日益加剧。当道路破损、学校供暖系统失灵、火车晚点、女性在夜晚面临危险、无法安全进入公园，因为那里毒品交易和抢劫成风、能源危机加剧，甚至战争就在眼前时，这一切都可以归因于心理理想化，而不是经济和个人物理稳定的缺失。如果回顾历史上如罗马帝国等帝国的衰落，可能正是由于一种极度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使得政治被权力和个人利益所引导，远离了人民的物质现实。

3.3.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其他西方国家，如美国，左翼力量的发展与德国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自由主义和托派思潮方面。批判理论、文化批判以及心理幻想的展开在美国深深扎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的著作，尤其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对美国的“新左派”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运动在美国催生了“新左派”，并且强烈关注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反战运动。这些运动部分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启发，通常对反权威和反官僚主义的倾向持开放态度。然而，从历史和经济条件（物质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其他影响因素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例如由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奴隶制引发的黑人解放运动。种族和民族运动在左翼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黑豹党、美国印第安人运动和奇卡诺运动是一些将具体文化和社会诉求融入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方法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重新语境化，采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方法，这些方法实际上也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近年来，社会主义思想有所复兴，特别是通过伯尼·桑德斯的竞选活动，他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些运动试图集中力量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但同时又支持身份政治和其他自由-理想主义观点，而这些观点与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工人阶级支持传统的家庭观念、经济安全以及身体安全，例如夜间在纽约地铁中的安全。这是现代“左派”典型的身份困扰问题。

重新语境化的成功尤其明显，当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与新左派的无政府主义立场相结合时更加显著。当美国以所谓的“人权”为名发动战争，实际上却是出于经济利益时，他们在国内得到了左翼的支持。因此，他们通常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些国家优先考虑基本需求和安全需求，而不是内心冲动的自由心理发展。因此，金融资本和金

融利益可以通过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论点得到合理化。这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结合，在忽视世界人口的基本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为理想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提供了支持。

3.4. 日本的马克思主义

日本共产党，作为西方国家中党员最多的共产主义政党，也受到了日本信息中心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原则进行重新语境化的影响。尽管日本共产党有着深厚的历史，并经历了许多变革，但如今它与其他自由派共产主义政党无异。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二战期间被禁止。共产主义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与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背道而驰。被迫害者被逮捕、拷打和杀害。

二战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尽管许多囚犯被释放，但在冷战期间，美国和日本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日本共产党的影响力。二战期间被称为“满洲怪物”的岸信介和他的政治势力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以控制共产主义运动。作为1957年至1960年的首相，他推动修订美日安保条约，以加强日美同盟，巩固反共路线。其战略是双管齐下的：一方面，通过监视、抹黑和偶尔拘禁共产党活动人士，将日本共产党边缘化；另一方面，开展宣传活动，并积极推动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原则对教育系统中的共产主义进行重新语境化。1952年颁布的《反间谍法》旨在打击“颠覆性活动”，直接针对共产党和其他左翼运动，授权政府对这些活动采取措施。

这种战略非常成功，日本共产党逐渐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距离，尤其是与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内部的多次改革，包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保持距离。中国的内部失败被用作宣传工具，在日本将共产党自由化。这种发展如此强烈，以至于身份政治和新左派的其他自由主义原则逐渐获得了影响力。仅有的一个例外是，由于其在二战中的历史责任，托派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军事干预的原则在日本并未得到采用。日本共产党批评中国的人权处理方式及其所谓的专制政策，认为这些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

日本共产党现在强调其独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民主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将民主和人权原则置于中心，这代表着从传统的权威社会主义模式或人民的物质辩证法基本利益的背离。日本共产党还在环境和性别平等问题上采取了新的左派原则，违背了传统的家庭观念或人民的经济利益。

3.5. 非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非洲国家至今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和复杂局势，这些局势深刻地动摇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稳定，导致资源被持续掠夺。然而，正值多极世界秩序的时代，这片大陆也在发生变革。在不同的非洲国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表现各不相同，并且与其经济和历史发展紧密相连。

在殖民时期及其后的独立运动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非洲解放斗士和政治领袖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摆脱殖民压迫、建设更公平社会的模式。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都支持了这些运动。例如，在埃塞俄比亚，1974年至1991年期间曾由一个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府执政，但在苏联解体后，该政府也随之倒台。苏联和中国在支持采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原则的非洲国家和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支持包括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帮助，使这些国家能够在经济剥削中捍卫自己的主权。然而需要补充的是，苏联和中国自身也经历了严重的冲突，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发展仍处于一个过程之中，这一过程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虽然具有兼容性，但在文化和经济上却不完全兼容。

然而，随着非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崩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及其基本支持也随之瓦解。相反，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取代了昔日的苏联势力，进入了新殖民主义模式。这对非洲来说是一场灾难性的演变。目前在非洲，公开宣扬共产主义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许多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转向了从属的市场经

济，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在某些政党和运动中仍然具有影响力。从属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意味着外国垄断集团控制着国家，而国家本身无法从收益（如股票）、土地所有权或发展中获利，发展则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或第三国实现的。此外，教育体系和宣传也通过所谓的“发展援助”被西方国家所调整。然而，非洲在多极世界秩序中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社会主义原则有可能得到更为深入的应用。

3.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思想

与西方的新左派相对立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它们至今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在其自身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下一章详细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首先通过朝鲜的主体思想来阐明其与西方自由派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发展路径，作为对社会发展的对照。主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包括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主体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思想，但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继承。这意味着它是一种包含朝鲜民族特征和历史的独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想象，马克思主义是基础，而主体思想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语境化。它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新创新哲学：主体思想。

主体思想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解释了世界的本质及其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意味着世界由物质构成，并根据物质规律发展，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然而，在主体思想中，人类自身掌握着世界观和物质转变的路径，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则将人类一般地溶解在物质中，从而将人类和世界的特性进行普遍化。因此，主体思想从以人为中心的角度解释了发展，认为人类是世界中的独特实体，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人类作为世界主人的变化规律。正是人类凭借其能力，物质地影响着经济现实。基本的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思想还在时间因素上有所不同。因此，主体思想的哲学受制于人类时代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及其《资本论》

中的基本理论侧重于工人阶级作为与资本斗争的革命力量，在 20 世纪初取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这一理论旨在克服人类的理想主义。这是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的基础理论——但如前所述，仅仅是基础。

然而，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各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的发展也在继续。与此相对立的是托派分子：他们至今仍在激进革命的意义解释这些理想主义的基础，而不考虑时间因素或人类的现实经济条件。因此，他们渴望在全球范围内发动无政府主义革命。

人类社会处于持续增长之中。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增长趋向包括：发展中的增长、产品销售的增加，以及尽量将竞争者排挤出市场以实现垄断的增长。这也意味着资源的不断开采和扩张。主体思想则致力于可持续地避免这种扩张。它是一种代表独立性的新时代哲学。工人阶级在内外敌人面前进行斗争的历史性革命，特别是在最近的历史中，面对国家分裂以及日本和美国的占领，形成了基于资本主义基本原理的韩国哲学。主体思想展望了一个新的时代，即独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努力工作并每天前进的人民不再被视为历史的对象，而是历史的主人。这意味着整个工人阶级包括了所有的人民，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所有根据自己的才能和能力从事个人工作的人民，都应该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命运，并以民族历史成就为基础。这是一个民族、阶级和人民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心是独立性和人类的需求。

列宁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现实中尚未完全成熟。他并没有试图具体描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因为他认为在他所生活和活动的时代，预见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是毫无意义的。相反，他提出了一系列零散的问题。他说：“我所指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指一切都是共同的，甚至连劳动也是。”主体思想则将重点放在人民群众上。金正日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所有人最终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完全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主人的社会。简单地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人民群众的独立性得到完全实现的社会。”在

关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讨论中，列宁的提议最为著名，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苏维埃政权”可以解读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附，而“全国电气化”则是为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物质基础。换句话说，列宁认为，在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通过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经济建设和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就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关键在于经济建设，而政策则是其保障。主体思想超越了物质界限，关注人的内在需求和自我实现。

因此，主体思想认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三个主要原则或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同时提高人民的作用。这意味着要提高人民的思想和智力能力，以及他们作为人民群众主人在人民群众中的责任和角色。这也意味着要对彼此负责。正如一个父亲在家里既要表现出严格性，也要表现出温和性，以便很好地抚养孩子，每个人都应该独立履行这一责任。高度的智力能力和创造能力能够促进每个人的独立性，使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己的最大优势，从而为公共利益、为作为人民之主的人民服务。例如，一个技师如果能够准确了解自己所建造的机器的工作原理及其可能出现的问题，就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提供改进机器的建议，甚至能够提出自己的创新，而不仅仅是以盈利为目的。这尤其有助于可持续性。能够使用数百年的机器，将通过技术革命来促进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然转型活动。技术革命是提升生产力水平并解放人类免受痛苦劳动的一项活动。最终，通过加强人民政权及其功能和角色，社会关系将相应地转变。如果这三个原则或革命为通过人类和自然的转变来改善社会关系创造了条件，那么人民政权将直接负责改善社会关系，同时政治上领导和保障人类和自然转型的活动。只有通过改善人民政权的功能和角色，才能有力地推进三大革命。人类和自然的转变将被推进，所有社会关系的共产主义转变将得到完成。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媒体在分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时，往往批评其是一个技术落后、不发达的国家，并声称这些技术只是为领导人服务的。然而，他们在没有进行学术研

究的情况下，立刻得出结论，既没有深入分析其历史，也没有分析其政治或马克思主义方向，更没有深入了解其文化。新闻业被视为一种专业技能，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是进行深入的调查或地方研究。这是宣传的本质，通过最大程度上触动人们的情感，将一个国家的所有方面都描绘成负面的。而文化、思想和技术作为三大原则，实际上是国家的支柱。然而，国家的主权或独立性等国家利益却几乎没有受到关注。然而，如果深入了解这个国家，可以明显看出其基本需求已经通过物质辩证法得到满足。大量的住房建设项目、经济改革，特别是对人类能力的培养，以实现人类的独立，展示了人们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能力。因此，艺术和文化，甚至是数学等领域的人类能力都得到了高度发展。个人特性的发挥与公共利益的促进齐头并进。因此，每个人既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人民的主人。

主体思想强调国家的自给自足和独立性，以及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关键在于，朝鲜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独立于外部影响行事。这一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对殖民历史和外部势力不断威胁的回应。在实践中，主体思想也意味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根据本国的具体需求和资源，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模式。这在大量旨在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项目和举措中得到了体现。这些项目包括大规模的住房建设项目、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以及对教育和科学的支持。同时，能够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建筑还是艺术，每一个项目的细节都是高度精确、美观和象征性的。这反映了个人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能力和才华。

主体思想的另一个应用实例是对文化认同发展的重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是追求国际文化、艺术、音乐或其他领域的标准，而是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和弘扬本国的朝鲜文化，以增强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豪感。这与托派原则相对立，后者主张国际革命和干涉他国事务，主张世界及所有民族和人民的平等，以及拒绝他们的文化。总的来说，主体思想不仅是一种政治哲学，也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和进步的实践指南。它促进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同时强调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重要性。

第 4 章

“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时代背景相结合，不断发展和完善它。推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保持其生命力，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 5 月 4 日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时的讲话。

4.1. 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领导的角色

物质辩证法是理解中国现代发展至今的基本基石之一。然而，列宁主义也在中国的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的问题。他在 1902 年发表的《怎么办？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基础。在历史背景下，无产阶级主要指的是工业中的劳动者，即经典的早期共产主义以及阶级矛盾的对立。历史上，这种对立通过一场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改变制度的内部革命得到了缓解。列宁将共产党定义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由最具奉献精神的工人代表组成，他们能够代表全体工人。在这些工人阶级中，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应当深入扎根，以便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并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此外，他在 1904 年的著作《进一步前进，一步后退》中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决策必须由所有党员贯彻执行，并统一协调，必须听取群众的意见，并与群众建立联系。这些基本原则成为了最早期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变革的基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外部侵略者时，帮助国家团结并取得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构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在中国的当前实践中已经在许多阶段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约瑟夫·斯大林（Iosseb Bessarionis dse Dschughaschwili）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苏联。

4.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国人民在历史和文化上都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在这个广阔的土地上，主要由农民居住，他们在大城市中从事时令性的工作，经济现实决定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意味着，手中握着的土地，浇灌的植物，或是每天蓝天之下的生活，都是真实的，也是个人接近真理的方式，而不需要过多的理想主义解释。物质辩证法从本质上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外国侵略和国内敌人的压力下，意识形态的发展加快了。毛泽东的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理解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性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意识形态发展框架。

我使用的是 1968 年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版。这本书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作品一直是社会发展的指南针，展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支柱，并在撰写这些作品时根据经济情况调整了发展的新方向。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人，这些作品不是法律，也不是宗教经文，不应该被严格解释和毫无例外地接受。相反，它们是可以解释的，并为概念和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根据个人观点，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书是一本关键的作品，解释了许多关于当今中国的问题，特别是关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现代中国的高度智能应用。

毛泽东在书的开头明确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没有矛盾。认为没有矛盾的观点，是一种不符合客观现实的幼稚思想。我们面临两种社会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矛盾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毛泽东定义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并举了抗日战争的例子。在抗日战争中，所有反对日本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都是人民，他们团结一致对抗外部的日本敌人，以及那些亲日的中国卖国贼和其他亲日分子。人民内部的敌人是那些反对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然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指出，人民内部有工人阶级的矛盾，农民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的矛盾，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与农民一方面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者一方面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

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不是人民内部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般斗争。资产阶级的性质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与人民一起具有革命性，支持宪法并作出妥协，但另一方面又剥削工人阶级。然而，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特定国家条件下，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和谐，而不是矛盾。毛泽东还谈到对抗性阶级矛盾的问题。目标是通过联合、批评和教育的政策和平解决民族资产阶

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个矛盾没有得到正确处理，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这种政策，这种矛盾就可能转变为人民与敌人之间的矛盾。人民与敌人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性质不同，必须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因此，必须在敌人与人民之间划清界限；在人民内部要分清是非。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极具时代特点的方法。人民应该主导秩序。解决办法包括逮捕和审判反革命分子，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和言论自由。这些措施旨在维护公共秩序，保护人民的利益。杀人犯、纵火犯、土匪和其他恶劣分子应当受到惩罚。这种人民的专政也意味着保护国家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目标是使人民能够在技术、现代工业或农业中实现和平发展。人民不能凌驾于自己之上并压迫自己。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因此，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游行和示威自由，信仰自由等都得到了保障。此外，国家机关必须深入群众，并为人民服务。

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它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但这种领导是集中的，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对人民政府和人民的暴力行为将导致国家和人民的受损，经济也将在短时间内遭受损失，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在中国，许多人也一直要求像西方那样更多的自由，他们主张实行西方式的两党制，即一个执政党和一个在野党。然而，毛泽东认为这种制度只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工人阶级在这种制度下永远无法保障自己的自由权利。只有具体的自由或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或抽象的民主。如果资产阶级享有民主，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就没有民主。如果西方国家容忍共产党的存在，那也是在威胁到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一旦超出这个界限，这种容忍就不复存在了。通过共产党作为人民的代表来领导国家，可以始终确保代表所有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例外和排斥。要求抽象自由和抽象民主的人将民主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但最终民主是为了服务于经济基础，即最大程度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民主和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在集中的民主中，自由与纪律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但在统一中却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方面不应否定另一个方面，一个方面也不能在没有另一个方面的情况下存在。在人民内部，没有自由就无法运作，同样，没有纪律也无法运作。没有民主也无法运作，同样，没有集中也无法运作。这种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统一就是民主集中制。对于人民内部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绝不能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来解决，因为这将是有损的。宗教不能通过行政强制手段被废除，任何人也不能被强迫不再信仰宗教。人们不能被强迫放弃理想主义，也不能被强迫信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或争论只能通过民主、讨论、批评、说服和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强制和压迫的手段来解决。

1942年，“团结-批评-团结”的民主方法得到了具体体现。这种方法始终以团结的愿望为出发点，并通过批评或斗争来解决矛盾，从而达到新的团结。经验表明，这是一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团结的主观愿望是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团结的愿望，斗争将自动导致最严重的分裂。我们应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避免未来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非常清楚地解释了矛盾法则在宇宙中无处不在。这个法则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本质和人类思想中。存在统一，也存在斗争。这导致了物质世界的变化。矛盾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具体，就像在本书开头所解释的对真理的理解一样。正如真理从来不是绝对的，统一也不是绝对的，甚至在交流和理解的层面上也是如此。因此，毛泽东认为，每个对立面的统一都包括时间因素，时间和经济变化会产生新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是绝对的。西方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激烈的对抗，即激烈的矛盾，这些矛盾通过一方主导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西方民主辩证解说，“多数”主导“少数”。通过媒体和信息传播、社会工程以及媒体的强大影响力，这种激烈的斗争得到了推动。这些激烈的

矛盾不能通过资本主义来消除，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来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差异以及劳动和生产关系中的问题仍将继续存在。但社会主义制度的重点是将生产力和整体能力的提高集中在改善所有人生生活质量的方向上。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过程中，建立了一种满足人民需求的社会主义经济。

这本著作只是众多对当今中国有深远影响的作品之一。但当谈到理解中国时，毛泽东的基本理论和分析至今仍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制度中。在当时的背景下，从外界来看，是否有许多经济决策是正确的，或者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是否成功，都是值得批判性评价的。新中国的建设过程是一个情感上和身体上都非常艰难的过程，经历了许多动荡的阶段。中国人民和广大群众并非全都受过同样的教育，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接受相同的教育，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国内的发展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解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进一步的分析过程中，尤其明确的是，毛泽东思想如何至今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及其他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理念如何也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围绕定义社会主义在当今时代中的建设发展过程逐步构建起来的。在西方世界的教育机构中，只研究了最初的阶段，或者以苏联等国家为例来定义资本和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其实，新时代社会主义的阶段和研究早已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这在此书的基本概念中得到了深入探讨。

4.3. 邓小平：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开放中国

现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分阶段进行，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经历改革。这些改革并非总是成功的，但它们为未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邓小平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推行了改革，保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结构，同时引入了类似于许多西方国家的表面市场经济。这种模式涉及影子经济或国家在经济中的“看不见的手”，而表面的自由市场经济仍然存在。这种新概念在西方的世界观和民

主理解中是不存在的。即便是中国人也未必完全理解他们行动的逻辑和实践，而邓小平的基本思想更像是变革的起点，而不是单一的行动。本文将通过实地研究进一步解释这一点。这与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有关。邓小平及其党内讨论深入理解了现代经济世界，并推动了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融入。

邓小平在 1978 年 12 月的讲话尤为重要，他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构成了他新发展方针的基石。他提出要将党的全部工作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在会议上，党内成员讨论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探讨党的未来和建设。具体而言，这意味着：

1. 解放思想：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从事实中寻求真理。解放思想应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要更好地在党内干部之间传递知识，并打破旧的历史观。这也意味着要超越马克思主义，从他人那里学习，正如许多在国外学习的中国学生所展示的那样。
2. 加强民主集中制：应减少党内和个人权力的过度集中。应更清楚地根据实际情况区分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而不应攻击那些采取不同路径的人。
3. 摒弃旧的教条：不再奏效的观念应被抛弃。进步和发展是必要的，而不是保持现状。中国共产党内的身份和经济的彻底转变是必要的。

邓小平强调了社会矛盾的新解决方法。他在讲话中指出，民主与集中相分离的错误往往导致先进和有能力的人难以表达和展示自己。重要的是要创造既能促进自由又能促进纪律的结构，以及愿望的统一与个人的轻松与活力。邓小平希望更广泛地调动群众。在经济方面，这意味着加强法律体系、管理体系和经济政策。应

在国内外学习，加强责任制度，并更多地奖励优秀表现。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旨在逐一解决矛盾。邓小平说：“我们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学习——通过实践，通过书本，通过他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我们自己的经验。应该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几百名成员及候补成员和各级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应当在深入研究现代经济发展方面起到带头作用。”

4.4.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今世界秩序正在经历诸多复杂的变化。中国的改革也在不断适应这些新环境并不断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初期，分阶段理论是适用的。这意味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发展。领导者的起源和思想从未被遗忘，而是根据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实际情况加以发展。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今仍然作为基础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未成文的思想，例如斯大林的思想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自2013年3月14日习近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些改革在不断向前推进。今天的中国通过新的发展路径被塑造，这些变化深远。自邓小平以来，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未能识别和研究现代社会主义及其在新阶段中的渐进性变化和应用。过分关注市场及其在中国市场发展的可能性，而忽略了党内和政治发展的研究，导致了对中国理解的空白，尤其是在中国现代化时代，这一空白带来了巨大的理解问题。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分阶段理论不再适用。习近平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坚定地遵循邓小平的路线，并将其调整为符合当地条件。在他担任国家主席期间，这些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邓小平时代从未真正结束。在全球迅速变化的时代，习近平发起了大规模的新改革，以适应这些变化。这些举措的每一个都可以

视为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步。要精确理解这一点，必须详细分析这些革命性的改革。然而，习近平时代的中国革命与改革可以被归为两个平行的阶段。这种平行意味着一些改革在习近平上任之初就已经开始，虽然它们的重要性在后期才显现出来，因此被归为更高的阶段。一方面，这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涉及中国在新时代的现代化。习近平上任以来国际层面的改革，到了中国现代化新时代，开始产生深远影响，可以比喻为一个有起点和产生效应的过程。这些改革历经十多年准备，现在开始显示其效果，同时中央理论基础也在不断发展。这种多层次的平行发展显示了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正是本文将要解释的内容。

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前，习近平自 2003 年起担任浙江省的省委书记。他今天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邓小平的倡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设计者，习近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籍《之江新语：浙江发展新理念》深入探讨了习近平的原则，并收录了他在 2003 年 2 月至 2007 年 3 月期间在《浙江日报》上发表的 232 篇文章。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习近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不仅展示了他作为今天的国家主席的能力和素质，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定期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这些发展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4.4.1. 民主集中制与新的集体民主

邓小平将民主集中制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核心位置，并不断推进其发展。作者在地方民主、区级民主和政治与国家民主层面上详细研究了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不仅仅是在应用民主集中制的概念，还在实践一种横向集体人民民主与纵向民主集中制的混合形式。

2024 年 3 月，在北京的几个地方基层进行了调查。调查中观察并研究了有关地方管理的民主讨论。在一个基层社区中，参与者讨论了在社区内引入机械限速装置以减缓车辆速度的问题。参与

者包括居民、律师、物业管理人员、房地产代表以及作为讨论主持人的共产党员代表等。党的领导仅承担了促进讨论和总结结果的角色。主持人特别关注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并多次询问是否有被遗忘的观点或不合理的地方。有趣的是，这并不是一场旨在推广特定观点的经典辩论。例如，销售限速装置的商人并没有积极推销，而是每位参与者都努力从其他人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包括未到场的儿童、老人或司机等。讨论中考虑了整合性和心理因素，并进行了一次比例评估。甚至那些最终需要支付费用的人也考虑到商人的盈利需求，因此不应购买过少的限速装置，但也不应购买过多以至于对社区居民没有实际效用。

通过对所有相关方的同理心，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立场，党的主席确保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表达自己。另一个特点是专业性，特别是专家参与了讨论。居民能够亲自聆听并评估所有专家的意见。通过这种公开的专业性，立即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案。在与一位年长居民的个人交谈中，他特别强调了专家参与的重要性。他说：“在中国，每场民主讨论都以专业性为标志，专家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是我们作为居民的愿望。”那些缺乏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政治代表往往面临着难以妥善分析复杂问题的巨大挑战。因此，党的参与和引入专家作为不同方之间的调解者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党几乎像一位智慧的父亲，将孩子们召集在一起，促进理性和建设性的讨论。

在另一个有数万名居民的北京市区基层中，可以看到一种企业和居民之间的特殊民主形式。与西方民主形式完全不同，企业在公民义务问题上并未与自然人严格区分。相反，企业在其所在地承担特殊的责任，并享有特权。一个当地的航空航天研究所支持建设了一个小型亭子和儿童游乐场，这样年长的居民可以在清晨步行不远就能购买到新鲜食品。

我参与了开幕式，并见证了社区居民、企业代表以及党员干部如何共同主持了这一仪式。另一项关怀体现在该研究所员工为社区居民修理自行车或处理其他小任务。在开幕式上，我问到了一

位代表当前社区面临的挑战。他提到最大的问题是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参与社区活动。我告诉他，在虚拟世界的时代，这在西方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然而，他解释说，党的作用至关重要。通过其网络，党可以帮助例如从附近大学招募学生作为志愿者提供支持。一般来说，所有社区都有一个共享的办公室，其中既有党员也有社区居民或其他党派成员，他们共同处理不同的行政任务、秩序、协调、官僚事务、地方发展、纪律或意见形成等。

在更高层面上，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例如，在整个区举办了一场有数百名参与者的专业会议。在会议上，企业、党员和社区代表就区内项目达成了一致。甚至一些驻地的外国企业也参与了会议，展示了他们如何在区内积极参与，以及他们如何与地方政府和市民共同改善整个区的生活条件，并探讨了未来的项目和投资计划。会上还展示了如何更好地促进本地企业之间的合作。例如，“智慧基础设施城市”、“人工智能城市”和“智能生产与供应链”的建设等主题得到了特别讨论。企业通过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的杰出表现赢得了政府和党的特别支持以及补贴。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因此，在实施民主集中制时可以看出，党和其代表在不同层面执行中央政府的目标、方针或原则。但这些目标往往是粗略的。新冠疫情是一个明确的例子。应对疫情的政策方向是广泛的，但并不具体。地方政府或城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近年来，除了这种纵向的民主集中制，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横向民主形式。这种新的集体民主和共赢原则成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这不仅仅是消除矛盾，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共同参与彼此的成功。

在中国基层民主的层面上，这意味着企业、当地居民、政府、个人和所有民主党派合作，解决公共利益问题。公共利益主要指当地居民能够找到工作，获得合理价格的食物，拥有住房，甚至实现现代化技术社会的新层次。因此，在横向层面上存在“集体”或“包容性”民主，所有公共领域的参与者，特别是专家、组织

和企业，都会参与讨论。按照马克思的理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无阶级社会的特点，所有参与者都应参与社会改革和发展。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集体民主的形式在不同的城市因其文化和经济情况而有所不同，不应简单地用于解释整个中国。这样简化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必须逐一分析和审视。在中国的一个农村地区，由于缺乏专家，党将更自主地承担领导责任，做出决策，但如果决策失败，他们将不得不向更高的党组织负责。

4.4.2. 通过专业性实现言论自由和讨论文化

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依然存在。具体而言，这意味着通过寻求团结，通过批评和斗争来消除矛盾，从而重新实现团结。必须早期发现错误，避免未来出现问题，通过治病救人来解决问题。矛盾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干扰因素。如今，矛盾主要出现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以及土地重新分配和迁移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矛盾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纠结，解决它们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政府和各级干部必须从人民的矛盾中学习，深入洞察，并寻求正确和有效的解决方法。在新形势下，关键在于找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适当方法。

消除这些矛盾并改善人民生活意味着需要解决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为此，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这正是讨论的层面所在。因此，讨论是明确提倡的，但必须区分不同的层次。在基层，党通常派遣干部直接到场，与人民交流。同时，邻里委员会提供额外的支持，并且上级也会派遣干部进行调查。其次，有大量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在现场进行研究，从而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实践中。讨论意味着在现场直接解决问题。然而，当涉及更高层次的问题和国家政策以及立法时，专家们则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讨论主要在特殊的学术层次上进行。

国家的变革、改革以及其他发展或改进，都由国家的智库推动。因此，如果外国人士在没有进行专业研究的情况下批评中国复杂

且各异的地区情况，只会让人们感到不解，外国代表也会因此蒙羞。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主义仍然被视为内部的敌人，自由主义的形式会在不同理想的基础上分裂人民，并可能发展为法西斯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标是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结合自由和纪律。与之相对的是西方的讨论文化，代表民主通常将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政客置于重要的决策者职位，而未能根据人民的利益进行田野调查。因此，决策并非根据最优秀的能力，而是根据意识形态优先次序做出。

习近平在此特别强调了党干部的重要特质之一，即贴近人民工作。“干部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他们的仆人。”因此，田野调查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各级干部必须始终努力展现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应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背景的人结交，尤其是普通人，并解决他们的问题。干部不仅要组织传统的会议或接待时间，还要积极邀请人们进行对话并进行个人调查。解决方案也直接来自人民，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贴近生活的经验以及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同时要严格遵守党的群众路线。

4. 4. 3. 促进文化与自然的和谐

作为上海附近浙江省的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推动中国文化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成就现在已成为全国发展的榜样。“文化是人民心灵的体现。像艺术这样的文化作品不应追求最大的商业成功，还必须充分发挥其启蒙和教育功能。它们应激励人们，并具有群众性特征。此外，经济应得到文化的丰富。因此，城市也应以典型的文化氛围发展。”因此，地方文化在他领导下得到了特别的促进，这种促进后来扩展到了全国。这也意味着促进全国 56 个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特色和思想。

我在浙江的青田进行了调查，并亲自考察了习近平在该省领导下多年来的发展情况，并进行了田野研究。在青田的一个石雕博物馆前，墙上刻着镰刀锤子图案和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这也许是共产党的宣传手段？但这种浅薄和情绪化的视角太过于肤浅，仅仅基于西方的真理观。共产党以捕捉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心灵为目标。人民的心灵和个性表现于他们的出身和文化之中。这是人民的身份，是民族的身份，并已延续了数百年。文化基于物质辩证法在当地经济条件下发展。因此，文化是当地环境的展现，但它也反映了人民的精神发展和情感。这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和社区的家园。

青田博物馆的青田石是在大约 1.4 亿年前因火山活动而形成的，它们是精美石雕的基础，这些石雕不仅代表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也象征着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一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得以成功保存，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当地居民希望他们的文化能世代传承，他们的价值观得以保留。正是这种中国文化和人民的利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核心。除了这些雕塑，许多其他地区也建立了文化遗址。本地人在市场上表演了传统舞蹈。

值得一提的是，青田独特的稻鱼共生系统，这一理念不仅保护了水稻，还提供了额外的食物来源。在稻田中建立了文化遗址，传统与当地条件相结合。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企业也提供了资金支持，带来了技术和理念，帮助这些地区的发展。这种以实现双赢为目标的整体方法，将该地区转变为一个自然天堂，使其成为旅游、休闲和经济发展的理想之地。我与之交谈的居民非常欢迎这种发展，并希望吸引更多的游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早在西方世界要求全球实施环保标准之前，中国就已深刻领会了这些原则。这不仅关乎文化遗产，也涉及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关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便为后代留下一片美好的天地。

4.4.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的“看不见的手”

在现代社会中，中国政府深刻理解了一点：创新和自由竞争是公民的愿望。但企业在没有责任和党的控制下享有无边界的自由，会导致社会分裂，并且国内的政治和经济事件将始终根据特定个

体的利益进行调整。人民内部的矛盾将增加，甚至无限制地扩展，从而在内部引发更多的分裂。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外国敌人通过纯粹的金融主导地位，外国金融资本将控制企业的股份，从而控制国家的企业政策和经济政策。迄今为止，整个国家因此陷入了对外国的依赖和屈服。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是部分私有化的，而不是完全或全部由国家控制的。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得以防止金融资本、外国投资者或银行削弱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国家也支持、鼓励甚至补贴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的优势和自由。关于中国经济控制的两面性，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浙江，中国：一个发展的新愿景》一书中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从长远来看，公共部门不能独自完成所有项目。需要私人投资者参与有利可图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还应邀请外国投资者及其专业人员、管理模式和技术，将该省提升到一个新水平。重要的是不要满足于现有的结构并在其中安逸，而是要促进多样性和新思想，以通过创造力推动经济。中国经济必须启动全球前所未有的新试点项目，并为此开发新的工业园区和新的思维方式。在此过程中，应奖励成功，容忍失败，纠正错误。领导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改革热情必须保持下去。民营企业必须占据上风，打造自己的品牌，并以科学的发展理念为指导，走出一条基于自主创新的新发展道路。”

因此，发展与国际合作以及自由市场的利益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古代中国，有句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食果不忘栽树人。’ 在现代社会，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这些细胞成长的母体。因此，企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其公民责任，心怀感恩并回馈社会。这不仅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只有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才能在长期竞争中保持活力。”

国家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通过党的“深层国家”来发挥作用的。除了国家的影响力外，党的成员、CEO 以及其他高级干部也在中国的重要岗位上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确保这些领导人

遵守道德和纪律原则，能够保证企业始终为人民服务，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中国的“深层国家”是党的深层结构，是人民意志的体现。相反，西方的“深层国家”则不为人知。我们只知道金融资本如贝莱德（BlackRock）或先锋集团（Vanguard）等公司在市场上持有最大份额的公司股份。不论是好莱坞、微软还是苹果公司，这些公司的背后都是拥有明确私人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私人股东，他们通过自主决定企业政策，进而影响社会和政治。然而，真正掌控大局的深层结构和谁在发号施令却是未知的。这削弱了民主，对整体社会有害。中国走的是人民民主的道路，人民本身就是中国的游说者和“深层国家”代表。毕竟，中国共产党拥有超过一亿的党员。

4.4.5. 学术发展与青年

在中国，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发展原则：即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从实际出发，寻找真理。”因此，贴近人民、贴近研究对象的实际发展、实际讨论和实际研究尤为重要。这并不是要把某些个人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中国的学术界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目标是始终瞄准人民的物质利益，即人民的团结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抓住人民的心灵。在中国，还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在做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所忽视甚至因傲慢而不愿去做的事情。那就是与外国的比较研究、在国外学习以及在学术层面的交流。现代世界变得极其复杂，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大量的学术研究、期刊和出版物，中国对此了然于心，并在全球范围内收集人类知识，不论系统结构或意识形态取向如何，中国都会在学术界进行比较研究，在不同的经济区实验这些知识，最终在实际中加以应用，并且结合当地文化和条件，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将其进一步发展。这些知识在中国被赋予了中国的特色。这一点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西方，由于他们的霸权思维，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应用。西方主要从自身和西方内部流通的知识中学习。虽然有例外，但与中国的活动相比，这些例外非常有限。这导致了西方不再拥有专家。然

而，关于这一点的更多内容将在本书关于欧中关系的结尾部分详述。

习近平还对此表示：“万事万物都处在不可阻挡的变革之中，因此必须随时做好应对变化的准备。我们的行动方式应该根据时间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重要的是要不断开拓创新，持续引入新的理念，以应对经济、社会和世界的变化。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和进步。同时，不能只关注增长，还要注重质量和效率。”

中国是一个注重成果的社会，在这里行动胜于言辞。中国人根据实际行动来评判，而不是根据言语。同时，教育系统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一方面，过去几十年间教育系统主要集中在技术培训上，导致社会科学的教育相对不足。另一方面，教育质量差异很大。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顶尖大学只对少数中国学生开放。这些学生必须花费多年时间备战入学考试。一旦通过考试进入大学，他们还需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以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些多重筛选机制迅速培养了一批精英学生，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拥有比其他大学毕业生更多的机会。这种压力主导了青年的生活，并引发了他们的忧虑。此外，不同大学之间的管理规定和限制措施也存在差异。一些大学在特定时间后会关闭宿舍入口，而另一些则不会。有些大学的宿舍传统上安排八人一间，而另一些则安排两人一间。这些差异显著影响了学生的未来和发展。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教育系统也随之发展，但学术讨论清楚地表明，党和各大学都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中国人从不会满足于现状，永远需要持续的改革、持续的人民革命和发展，才能将国家带到更高的水平，并最大程度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批评是出于团结的愿望而显得重要，而这种批评通常在学术层面进行，并伴随着为决策者提供的最佳解决方案。

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领导期间还对青少年问题表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关切。这也是大多数家长的心愿。然而，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教育

中出现的新现实和问题也暴露出了其阴暗面。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传播的误导性信息，对青少年的发展是有害的。此外，政府、党内和商业中的不正之风，假冒伪劣商品的销售，以及赌博、吸毒或卖淫等现象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成长和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家长们的极大担忧，社会呼吁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治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因此，传递价值观，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些公众利益代表的重要性是必要的。政府必须全力以赴支持青少年的发展。青少年的精神发展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因此，价值观教育是必要的，要努力追求具有坚实基础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涉及到对祖国的热爱、孩子们的心灵、良好的行为和道德品质的培养。”

在实践中，家长的期望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因此成为焦点，努力应对和适应新时代的新情况。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逐渐得到了物质化，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单靠文化在现代世界中无法引导人们的心灵，超越个人利益，关注社会的福祉。而社会主义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正是当今世界的现代青年，常常思考一个触动心灵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在寻找什么？为了学习、求知、寻找人生道路，我们需要巨大的努力和进取心。在中国，每个人都在孜孜不倦地努力，力求取得优异的成绩和高水平的表现。然而，疲惫感往往随之而来。许多人会问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辛勤工作的意义何在？自我和自我实现的问题。这是一个终将出现在每个人脑海中的问题。而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以及像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大学的历史，为中国人民提供了答案。这些历史为中国人民提供了见解，许多其他国家或社会在解决自己国内问题时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是保持清晰愿景的关键：这关乎一个更高的目标，关乎整个社会。

当我们回顾社会中的偶像以及他们的历史时，我们经常庆祝和赞赏他们的成果和行动。然而，每个人都不是通过无所作为而达到这些成就的。每个人都在非常努力地工作，并将这种努力奉献给公益事业。这不仅仅关乎金钱，而是关乎变革的渴望，以及为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使之变得更美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志们总是追求更高的目标，服务人民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多文化中都有一句类似的谚语：“艰难的时代造就了坚强的人，坚强的人创造了美好的时代，美好的时代孕育了软弱的人，而软弱的人创造了艰难的时代。”中国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以防止衰退。因此，艰苦的工作和持续的发展是必要的，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并应对尚未出现的未来问题。这是青年的任务，不能安于过去的成功。这将违背生命的意义，而对无限虚无的绝望将对心理产生影响。因为精神会变得脆弱，心灵、身体、国家和未来也会随之脆弱。

在中国，每个社会主义学生都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帮助他人。他们可以消除贫困，推动国家前进，并确保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或其他合作项目，全球没有人会挨饿。这可能听起来像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对吗？但道路即是目标。有时只是一些微小的变化，比如一项法律的修改，就可以引发全国政策的变化，从而拯救生命。当我们帮助他人时，每个人的个人优势和才能都会得到展现。而金钱和安全感自然会随之而来。在上海的一家艺术博物馆里，有一张 20 世纪 80 年代的照片，展示了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坐在光秃秃的地上，夜以继日地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复习。那是一个电力不足的时代，没有足够照明的地方，因此他们不得不在那里学习。这是一张极为感人的照片，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人民的特点和令人钦佩的精神。无论情况多么艰难，中国人民从不放弃，始终为国家和人民奋斗，甚至在最艰难的时期也是如此。党的领导引领着人民，但人民也是党的领导。人民就是党，每个人都在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工作。没有什么比让别人幸福更美好的了。更重要的是，青年一代不能偏离这条道路。在数字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玩虚拟游戏，忘记了现实中的发生的事情，这些原则绝不能被遗忘。相反，无论是在海淀区的基层社区，还是在中国农村的实地研究中，都必须始终站在同志和人民的一边，给予他们支持，尤其是在老龄化人口日益需要支持的情况下。这就是社会主义方向的道路，每个人都并肩前行，互相帮助，追求共同的目标。这展示了一种生命的意义。

4.4.6. 各阶级共同打击敌人：贫困

各阶级的团结和党领导下的具体目标，在消除贫困方面尤为明显。1980年，中国有8亿人生活在贫困中。2021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立志让所有人都能在和平与繁荣中生活，不让任何人挨饿。这是以人民的物质需求为核心的国家目标。近年来，党加大了对这些原则的推动力度，重点不在于纪律规定或限制，而在于如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承担国家任务。以下是中国共产党扶贫条例第六条的内容，以此为例来解释这些原则，并以原文阐明这一原则。

根据扶贫条例第六条的规定，由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建立一个针对扶贫的大数据平台，建立跨部门的信息联动和共享机制，改进农村贫困的统计监测系统。根据扶贫条例第七、八、十六和十七条的规定，利用产业资源，进行纪律检查和问责审查，监督落实情况，并根据规定动员能力。此外，根据扶贫条例第二十二的规定，军队和武装警察部队应积极参与地方扶贫工作，利用严格的组织和强大的执行力，承担规定的援助任务。根据扶贫条例第二十三的规定，民主党派也必须参与其中。他们应充分发挥人才和智力培养的优势，做好扶贫民主监督工作。此外，根据扶贫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还应鼓励私营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扶贫工作。

此外，《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规定，这些条例应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见《农村工作条例》第一条。根据《农村工作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必须优先发展农业和农村地区，并促进其振兴。应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聚焦扶贫或防止返贫，走共同富裕之路。《农村工作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了加强党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任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即应协调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管理。这些党规涉及农业绿色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农村生活环境改善以及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农村工作条例》第四条明确了党的农村工作原则，包括协调各方、推动农村改革、尊重农民、

保护其利益、促进乡村振兴以及与农民紧密合作。党强调农民教育，并采取现实的、循序渐进的方法，而不诉诸强制手段。

这些在扶贫战略中的示范性指导方针清楚地表明，相关规定是基于所有民间和公共自然人及法人，包括军队、个人或民主党派的参与与结构化，以消除贫困，同时促进自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支持。因此，这些策略旨在让各种参与者参与发展，并从中受益，甚至包括那些没有发言权的参与者：自然环境。

作为作者，我在中国北中部的保定附近进行了扶贫实地考察。在保定，山区的居民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贫困中。他们几乎没有食物，与外界隔绝。没有医疗、干净的水、教育或耐寒的住所，更不用说应对恶劣环境的技术或设备了。此外，当地的犯罪、日常生存压力和为生存而战的斗争使情况更加恶化。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今天在世界许多国家仍然如此。因此，中国共产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的生存，不能让任何人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在中国，集体和人是社会的中心。这是一种被称为“以人为本的政治”的民主理念，党代表了全体人民的主要利益，而不是个体的身份认同。中央政府改变了农村所有人的生活。在保定，为山区居民免费建造了新房。他们获得了免费的财产，五年后只需首次支付水电费用。同时，政府在通常不适宜的山区也进行了农业开发，建设了新的商业工业园区。最好的专家和技术被引入，以培训山民并使他们能够使用最先进的技术。这样一来，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还建立了分销渠道、超市、药店和与邻近地区学校的新基础设施连接。地方政府与企业、银行和中央政府合作，还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合作。公司投资于扶贫项目，而原本失业的山民突然变成了富有的（部分）自营企业家，他们拥有自己的财产，不必出售或放弃任何东西。我在保定周边地区看到，鸽子养殖、蘑菇农场和水稻种植都在进行，以供应邻近城市。

此外，还创造了清洁环境和恢复自然的工作机会。建造了旅游景点，自然与美丽的山脉吸引着游客。这一切都体现了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繁荣。在这里，体现了共赢合作与各阶级联合的精神：投资的公司获得股份和利润，开辟了新市场和路线。国家机构或个人员工前往这些地区进行旅游休闲。同时，地方居民也从中受益，国家履行了作为人民代表的公共职责。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整个国家的增长。目前，还有一项土地改革，外国企业通过国家补贴成为事实上的土地所有者，从而在中国建立新的产业，而村民们始终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与企业 and 地方政府共同作为工人和股东参与决策。村民不仅仅在本地区代表自己。尽管像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众多，但大部分人口仍以土地集体形式生活在农村地区。因此，中共还代表了广大的农村民众心态，这也对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是一个由经历过饥饿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国家。所有政党共同努力，创造了对所有人有利的项目。企业在实现其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结合了他人的利益。这显示了明确的发展导向政策，并且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结合在一起。这再次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利用技术不断改善物质生活水平。

4.4.7.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在过去几年里，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一项关键改革，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这一发展与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的特点密切相关。对“法治”的信仰构成了依法治国全面治理的精神基础。这个概念不仅体现为一个物质系统，而且深植于人民的精神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在 2021 年第一届中央法治会议上强调，中国应探索一条基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法律道路。他还表示，中国的法律应体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同时借鉴国外有益的法律成果。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呼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相协调。他指出，法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中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从他的言辞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落实，如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大力推动。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法治原则在

基础上与西方概念类似，采用了市场的交易概念。然而，正如国家的无形之手一样，在法治中也有一只无形的马克思主义之手，使其在概念上与西方的法治理念有很大不同。

“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是在毛泽东主席之后的改革时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产生的。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领导下，为全球贸易、技术转让和外国投资开辟了新的道路。在与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密切合作中，甚至在中国学者进行双边法律研究期间，中国的法律逐步发展起来。最初是从合资企业法开始的。德国民法和美国公司法的影响在中国法治的基本原则中有所体现。实质上，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德国为蓝本的民法体系，而不是像英国殖民国家那样的普通法体系。唯一的例外是此前曾被英国殖民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或澳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领导人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一理念。法律本身随着国家发展的速度不断调整，这意味着私人市场自治的边界是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来设定的。为了实现快速发展，企业在法律执行方面受到的约束和监管相对较少。在开放政策的推动下，私人自治得到了极大的鼓励，这为中国的成功奠定了明确的基础。

自 2012 年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确立了新的里程碑。习近平主席领导全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在 2014 年第十八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党集中力量建设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体系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信仰法治、维护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尊重法律、诚信友善、生机勃勃、和谐有序”的社会。中国的法律体系的特点在于将党-国家-社会主义原则与传统法治相结合。

在实践中，自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非凡的进展。在贸易、信息和 21 世纪的新科学领域，许多法律在 2020 年代初期得以引入和调整。专利、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法与国际法律保持一致。2020 年，中国引入了几乎与欧洲数据保护法相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2022 年，中国的《反垄断法》进行了更新。在中国经营的公司还肩负着特殊的社会企

业责任，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中国理解方式，规定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担环境保护、员工保护、所在地保护的责任，还必须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以促进全民和社会的和谐与繁荣，而不仅仅是为了富裕阶层或企业主。更深入地说，中国的公司法和商业法律不仅仅是为了限制强大的市场参与者，而是为了理解法律作为发展工具的作用。它为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指导原则，旨在实现双赢的局面。法律不仅不应是限制，而应是新发展进程的指南和推动力。

为了确保这些规定的有效实施，必须打击腐败，防止任何自私的经济利益影响法律。对中国成功起到关键作用的具体标准是作为社会和政府的政治指导方针的双赢规则和法律。例如，2023 年 9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或 2023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以及 2018 年的《监察法》和 2021 年全新的《民法典》都属于此类政治指导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自成立以来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阶段，私人自治几乎没有边界，类似于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情况。然而，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通过引入大量额外的法规，防止事态失控，以保护所有法律交易参与者的利益。自 2012 年以来，社会主义作为法律体系发展的核心，已成为国家建设和现代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基础要素。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法律是党和人民的一种自我调节形式。与自由主义理论不同，党将人民视为一个政治概念，而党本身则是人民的代表和领导者。党站在人民的前列，代表整个中国人民，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群体，党是法律的守护者和引领者，而不是法律之下的组织。党的内部法律和宪法对党员的意义至少与国家法律同等重要。此外，法律对党员的约束更为严格，特别是在反腐败领域，体现了更高的纪律要求。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表达，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手段，但在实践中，法律并不会被狭隘地解读，而是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加以执行。强调的是，自由主义法律理论在社会主义背景下不适用，因为它们将规范独立于人民意志之外设定，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是不同的。人们应该通过法律

来治理自己，法律不应被视为一种限制，而是作为一种工具，使人们能够在民事活动中更轻松、更有针对性地实现他们的意愿，并将其视为指导方针。

批评者，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者，质疑党引领和代表人民的特权。他们认为，党的特权政治角色会导致操控，而不是代表人民的领导。然而，在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国家中，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也有人认为，西方人民并不把自己视为法律的一部分，也不承认法律，因为法律体现的是隐藏在国家背后的统治阶层的意志，而不是人民的意志。这种情况导致法律和法律纠纷迅速通过繁文缛节的律师手段进行处理，即使是小事也会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不仅不利于社会和谐，还会使社会气氛变得紧张，陷入一种永久的限制状态。例如，发表错误言论可能会导致法律诉讼。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人们更多的是通过法律来自我治理，将法律视为工具而非限制。打个比方，西方的自由主义法律体系通过法律形成了个人自治的外部边界，可以想象成多个圈层，作为亲密关系的领域。在这个圈子内，所有民事活动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其他个体及其利益也有自己的圈子，当他们的利益在自己圈外发生冲突时，法律会防止利益的升级，避免强者对弱者造成伤害，或通过赔偿弥补损失。涉及更深层的圈层时，损害也会更大，法律对行为的惩处也会更严厉。党派之间的错误行为会受到制裁。而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更像是一个发展路径，所有民事法律的参与者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走上这条道路。正如过去战时同志们共同走过这片土地，现在他们通过法律的物质构建共同走在这片土地上，努力通过党的意识形态概念将一切都规划为双赢，而不是对抗。

法律作为民事活动发展路径的指导方针。在中国，监管政策的实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党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发挥着作用。然而，在实践中，通过对大学的观察，可以迅速发现，整个立法战略是在与学者、企业家和其他领域的

专家紧密交流的基础上进行的，党在这一过程中只是引领人民的意志，并总结出高质量的结果。在现代世界中，党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随着快速发展的步伐不可阻挡，技术（如人工智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不可避免的是，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采用一种能够迅速做出决策的治理政策，能够在短时间内召集专家。中国人民认为党的领导对提高进步至关重要。党是发展中的巨大风险吸收者，特别是在风险投资中。然而，正是这种快速发展导致了传统社会构成与新基础设施之间、以及组织和大众成分之间的分裂。然而，这些传统成分目前通过政府的大规模文化振兴项目得到了大幅补偿。

但在官僚层面，仍然存在其他挑战。可以设想，当法律体系发生变化时，这些新变化尚未在基层深入扎根，导致各级之间存在信息鸿沟。此外，新的技术或系统的变化往往带来新的责任，这些责任需要创建新的工作岗位，但管理部门往往低估了工作量，导致员工同时担任多项职务，而实际上应该创建新职位。同时，并非所有事物都是兼容的，因此需要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味着党内规章制度的建设也在不断加强。习近平加大了对纪律和干部责任的关注，尤其是在反腐败领域，并建立了许多新的监督机构和结构。关于中国法律体系的讨论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受制于法治，以及其自身党规的实际适用性。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桥梁连接党规和法治，但在实践中，党规正在明显地被应用，并且影响到普通民众，例如扶贫战略和党章等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乍一看，这似乎表明了一种自由化的趋势，但在机构结构上明显存在差异。西方学者声称，中国没有明确的权力分立，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所有机构都有影响力。这些学者对这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项目的前景表示怀疑，认为法治的基础在于法律至上的地位，宪法必须位于所谓的等级体系的顶端，甚至在党之上。这种观点部分得到了支持，因为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构建了整个法

律体系，并以社会主义原则指导法律体系。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只有从西方视角看待外在的国家系统时，这种说法才显得合理。这种观点只在西方视角下成立，因此常常被视为负面的评价。西方学者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只关注结构的表面形式，而不深入探究现有系统的更深层次和分支，也无法从其他角度理解这些系统。他们的“真理”哲学停留在形式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这可以从现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阶级角度来解释。形式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有一个清晰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结构，且没有内部平衡机制。然而，这一自上而下的结构通过机构和委员会内部的平衡因素，如监督机制和纪律机制，来限制滥用权力的情况。通过党的监督机构和反腐机制，以及不断强化的纪律规定，确保了党始终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为目标。

相比之下，在西方，这些平衡机制往往仅通过制度本身在形式上得以平衡，而内部结构则可能因缺乏监督功能而变得不透明和腐败（深层国家）。没人确切知道谁坐在国家的最高法院或最高机构中。即使这些制度形式上是平衡的，一旦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或特定群体的利益行事，制度就会开始崩解。由于缺乏纪律责任，并且各机构中的个人原则和利益在公众面前被掩盖，导致过去几十年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民主都被严重削弱了。

与此相对，中国的党内结构和内部规定是透明公开的，而在西方，组织、游说团体或情报机构则往往在幕后非正式地运作。在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人民的游说组织。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强调了在宪法基础上加强治理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必要性。这一方法与西方的“宪政主义”有显著不同。习近平强调，与外国宪法不同，中国的宪法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不是高于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但自身也必须在宪法框架内行动。毕竟，宪法也是基于党的章程而制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宪法保障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而不否定或放弃党的领导。宪法在基于过去的基础上规范现状，并引导未来。它规定了国家的基本任务、中心工作、主要指导方针和国家的主要政策，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战略指南，也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最高

纲领。此外，西方学者未能认识到人民自身参与了法治国家的发展，并体现了法治精神，包括人民在自律方面的努力；而党只是领导这一精神的实现。

关于党的规章制度及其自律意义，不仅仅是演讲和原则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党的内部规章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是公开可见的，尽管这些信息主要以中文发布。这些规章制度揭示了成为共产党员意味着什么。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 36 条第一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应该在新时代的序言中得到落实，而且还规定了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涉及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意味着，问题不应仅仅从主观或意识形态的观点或个人利益出发来解决，而应从一种经济视角出发，其中所有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作为无阶级的共产主义集体，代表共同的意志。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 36 条第二款至第五款还规定，党的干部应该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具备实践经验、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领导专长，并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他们必须依法办事，诚实守信，勤奋工作，树立模范，努力工作，具有批判精神，道德修养，自尊、自省、自律、自励，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任何形式的滥用职权和谋取私利行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第 36 条第六款明确提到要与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合作。关于党的干部，理想的行为标准应当是正直和诚实。这些都是行为规范，涉及党纪，包括第 39 条，这是一条行为准则，所有级别的党组织和党员都必须遵守。

遵守纪律、法律和社会道德不仅在众多指令和规范中得到强调，也不限于纪律规定本身。最新的纪律规定于 2023 年进行了修订，并于 2024 年 1 月 1 日生效。例如，党的纪律规定强调“四种形态”的监督和纪律，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谈话提醒、问题澄清、巡

视整顿和诫勉谈话，见纪律规定第 5 条。根据纪律审查规定第 30 条，即使刑法的严格界限未定义为犯罪行为，但如果该行为在法律中被界定，也可以对党员进行审查。因此，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以及其他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非法行为，可以根据刑法在党内纪律中适用。第 4 条规定了纪律工作的原则，包括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反腐败纪律领域也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在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领域，纪律旨在建立和促进廉洁政府和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方面发挥作用。企业管理者也负有特殊的责任。诸如重大损失和公款或国家资产（资源）的浪费等后果是不可接受的。在人口保护领域，利用危机如自私地利用资源也是一种犯罪行为。

目前，法治系统正在建设中。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作为政府的工具，对于管理和提供强大的社会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司法管理系统必须具备专业性，包括法律专门化和高素质的人员。其次，为了加强其结构并创造创新的社会管理，司法系统必须服务于社会，并在基层层面上吸引社会的参与和支持。除了人员外，另一个重要的建设工具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传播法律系统建设的知识。截至 2013 年，在 389 万名申请者中，53.3 万人通过了最终的司法资格考试。从 2003 年到 2012 年，有 12 万名省级和部级干部参加了法律讲座，另有 890 万名县市级干部也参与其中。全国共有 1800 万名公务员接受了培训，2000 万名公务员获得了法律知识，还有数亿农民、学生和社区工作者也接受了培训。法治建设包括在基层层面提供法律援助，例如通过建立新的法律事务所、公证处或证人出庭以及提供法律援助。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实现通过法律教育数亿民众，建设一个法律主导的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些努力，公民将能够通过调解自行解决冲突，并展现民主精神。然而，只有通过司法资格考试的人才能够进入法律职业，并获得由司法部颁发的证书。

没有任何一个司法系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其庞大的人口、地理特征、文化和经济差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与大城市之间的差异，而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它旨在服务人民，赢得人民对重大发展的信任，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民主系统创造了社会稳定和广泛的自我自治。它从全球各种法律体系中汲取和比较了科学知识，不论其组织形式和权限如何。尽管司法系统尊重国内的具体情况，但它仍然保持高度的集中化。法院系统由四级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以及军事法院组成，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即二审判决为最终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最高机构，负责审理重大案件，制定法律解释和规章文件，并监督下级法院。它可以重新启动程序或审查请愿书。这种集中化的系统在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SPP）是中国的最高检察机关，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工作指示传达给地方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并监督其工作和人事管理。通过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密切合作，也可以明显看出，党对检察系统的影响非常深远。

4.5. 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2022 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未来几年的政治目标。这次大会标志着疫情的结束，也是与病毒长期斗争的成果。这次会议在北京的不同地点举行，讨论了不同的主题，其中一个地点是中国人民大学，作者也曾在此地参与。在这些地点，党内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们讨论了各种主题及其发展。2023 年 3 月 10 日，来自 56 个民族的 2900 多名代表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这些目标付诸实践。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启新的征程，类似于当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毛泽东思想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革命性推动。这也涉及到新一轮的开放，面向人类共同未来的国际合作以及中国在上承担的新责任。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项核心改革，影响着国家的各个方面，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际。这一全面的转型对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造了一个如同科幻小说中描述的未来主义国家。其目标是将中国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全人类受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有志于与世界分享其成功。现代化涉及多个关键领域，并通过一种规模空前的战略加以实施，这种战略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未曾准备过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进程得以推进，因为党不仅代表着人民的心声，也代表着他们的物质需求和公共利益。除了学术文献外，中国国务院及各大学还发布了大量的资料和思想，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现代化中的实践概念。

4.5.1. 内部现代化

推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全国各参与者的协调、系统规划和整体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党起着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对全球发展趋势的深入洞察以及对人类共同愿望的准确理解也是关键。现代化将全国人民的专长和利益汇聚在一起，通过这种集体智慧的凝聚，国家得以迈向新的发展阶段。这标志着新时代大众力量的集中。202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习近平主席阐述并详细介绍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他强调了中国在实现复兴的努力，包括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实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性突破。中国的现代化旨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近年来，习近平曾经执政的浙江省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去年，这个东部省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7,565 元（约合 5,438 美元），使得城乡收入比从 2012 年的 2.37 降至 2022 年的 1.9。全国范围内，这一比率在过去十年间从 2.88 降至 2.45。比率的降低意味着城乡之间的财富差距缩小，而这一数字的变化反映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显著改善。中国计划到 2035 年将人均 GDP 提升至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并在 15 年内将中产阶级人口扩大到 8 亿以上。因此，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并在整体人口中增加财富。

4.5.1.1. 向未来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在人工智能和大规模通信的初级时代，中国正以现代化为契机，开启一个全新的项目，其影响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显现，甚至将整个世界推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将迈入一个尚未书写的新时代，但这一愿景已清晰可见。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要素，目标是推动全社会在科研、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将得到推动，以确保可持续性和开放性。这不仅仅是让未来成为现实，而是超越幻想的实现。前国家主席胡锦涛（2003-2012）曾恰当地表达了这种中国的心态：他的一个指导原则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正是他的倡导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快速发展。行动是关键，具体措施是关键。优先考虑的不是在无休止的辩论中徘徊，而是将概念付诸实践。这种精神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得以延续。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已成为科学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国家之一。在航天领域，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已经实现了长期载人运行。国家的空间站项目已进入应用和发展阶段，每年将发射两艘载人飞船以及一到两艘货运飞船。这仅仅是中国航天史发展的开端。中国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公路网络 and 世界级港口网络。航空和海运航线已开通，连接世界各地。一个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已经建立。到 2035 年，全国性的 1-2-3 旅行圈——即城市内一小时通勤、城市群内两小时旅行、大城市间三小时旅行——将初步成形，方便乘客出行。中国在智能铁路技术的发展方面引领全球。正如中国谚语所说：“仓廩实，天下安。”2022 年，尽管面临新冠疫情和自然灾害的诸多挑战，中国的粮食产量依然保持高位，连续八年超过 6.5 亿吨。对于工业来说，能源如同粮食一样重要。因此，能源安全在国家安全系统和能力现代化中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从所有这些项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重点在于公共利益、公共空间以及国家和人类的福祉。

4.5.1.2. 高新技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在西方，人工智能正日益影响着人类的发展。西方在这些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印象广为流传，因为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中国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娱乐产业和大众消费，尽管在这些领域也存在大量的人工智能应用，如图像处理等。中国的目标更在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工业，以显著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整体提高生活水平。人工智能的一种形式是虚拟投影整个城市及其全部基础设施。通过这种方式，人工智能可以自动进行虚拟投影，从而更快、更高质量地推动城市的发展。这涉及到智能城市的建设，网络与数据的互联互通，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分析，以最佳方式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两大重镇。两地都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其作为技术和创新中心的地位。根据各自的经济和战略定位，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2024年7月5日，《上海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宣言》发布，讨论了人工智能（AI）的潜力和挑战。宣言承认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性影响，并强调了确保安全和道德标准的必要性。宣言呼吁在医疗、教育和工业等领域推动研发，以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潜力。同时，宣言还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以消除技术壁垒，改善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访问。宣言呼吁加强数据开发与安全，培养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并促进平等获取人工智能技术。此外，还强调了加强网络安全、防止人工智能被滥用的重要性。联合国应在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并应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宣言还倡导公众参与人工智能决策过程。最后，宣言呼吁各方共同努力，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改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上海特别重视将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如制造业、金融、医疗和物流等行业的整合。这一战略旨在大幅提高这些行业的生产力和效率。该市设立了多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支持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开发新技术。在财政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每年在人工智能上的投入比整个德国的总投入还要多。用于发展的资金规模极为庞大。

2024 年 7 月 31 日，深圳发布了一项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行动计划，旨在将这座城市定位为人工智能创新的先锋。该计划包括建立一个计算能力为 4000 PFLOPS 的智能计算中心，并聚焦于智能产品、联网车辆和应用场景等领域。此外，还将创建一个中央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一个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创新中心。深圳计划利用其在硬件和软件开发方面的优势，引入各种智能产品，如可穿戴设备和车辆技术。该市计划在政府、工业、教育和娱乐等 40 多个公共场景中整合人工智能，并在智能驾驶领域确立领先地位。为此，深圳将开发一个统一的智能驾驶技术监管和评估体系。

深圳还将加大对初创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动新技术的发展。该市为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和激励措施，以增强其创新能力。深圳已经开发了多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和高科技的科技园区，为企业创造了一个协作的环境。这些园区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在制造业中的应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深圳的另一个重点是开发机器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等前沿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该市成立了多个研究所，专注于人工智能尖端技术的发展。为支持人工智能行业的增长，深圳鼓励私人和国家对人工智能项目的投资。在深圳，街道上可以看到自制的计算机芯片，也可以通过无人机订购咖啡。深圳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技术。

尽管上海和深圳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它们都分享着成为中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开发领先中心的目标。两座城市都专注于创造强大的创新和合作基础设施，培养人才，并将人工智能融入各个行业。

在 2023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还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部，以推动国家的发展。大量的新结构正在建立，例如专注于数字冲突的司法建筑。此外，还将推动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并有大规模的项目来促进技术转移和加强区域科学与创新体系。现在，进展大大加快，并且包括了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全面改革，使其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此外，还成立

了一个新的数据办公室，专注于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大数据”是促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关键词。国家大数据战略旨在建设国家基本数据要素和数字基础设施布局，这一战略已经在 2021 年 11 月 30 日的十四五规划中得到了明确。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转型，目标是生成、收集、存储、处理、分析和服数据，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大数据通常用于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的背景下。在人工智能时代，它可以成为此类项目的主要来源，并以惊人的速度为经济和技术发展做出贡献。数据将提供给人工智能使用。在未来 10 年，中国将在人工智能和数据的推动下，通过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自动化实现人类的最大发展。这将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可以设想，未来的中央集权民主或集体民主可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借助人工智能的强大咨询能力转型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而在西方的民主进程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往往因西方体系中的利润导向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容易失败。

4. 5. 1. 3. 融资与金融基础设施

西方的叙事之一围绕着资金的来源问题，特别是新债务的角色。国家预算常常被拿来与私人家庭的预算相比较，但这种比较忽略了实际的社会现实和长远的视角。以德国为例，“黑零”原则（Schwarze Null）类似于欧盟限制新债务的指令，禁止政府举债。这使得投资变得几乎不可能，预算规划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和日本等国家对债务问题的理解远远超过整个西方世界。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截至 2023 年底，美国的国债达到了 34 万亿美元，但国家并未因此崩溃。这个问题经常被忽略，人们缺乏对如何正确处理投资的全面理解。现代货币理论（MMT）等理论和其他一些概念提供了一些解决之道。

中国在所有被认为是必要的项目上进行投资。如果需要幼儿园，中国就建设幼儿园；如果道路老化，中国就修建新道路。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所谓的财政紧张而让公共基础设施崩溃。而每一条新

建的道路都能创造就业机会，并带动供应链的发展，进而通过税收和消费回流到国家财政。这与西方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国家常常将新债务或政府支出视为恐怖的负担，尤其是在地方一级，资金严重短缺。

如今，中国甚至建立了新的金融监管结构，以改善金融资本的分配并加强金融市场的稳健性。银行业通过新分支机构的开设而得到扩展。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确保对金融部门的统一监管，涵盖了机构监管、功能监管、行为监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风险管理得到加强，非法行为受到打击，尤其是在证券、金融控股和其他金融集团领域，以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权益。国际投资者因此可以在更为安全的环境中进行投资，并受到更为严密的法律和行政保护。此外，还建立了对外贸易的管理和服务功能，以促进和保障国际贸易的发展。

4.5.1.4. 以人为本的发展与自然和谐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项目，因为中国致力于将超过 14 亿人口现代化，这一数字超过了当今所有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这个挑战具有前所未有的难度和复杂性。中国必须在推进转型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以弥补关键发展领域的短板。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目标不仅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系统更高的效率水平，还要确保较高的社会平衡，为 14 亿人提供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并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的高级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省部级领导干部。习近平强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意味着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的现代化之旅是独一无二的，国家领导人决心确保它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习近平主席常引用的格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生动地体现了中共以人为本的

治国理念。为了确保没有人掉队，中国进行了长期的反贫困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的历史性成就，提供了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和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确保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努力。

在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和现代化进程中，还涉及到对民族文化根基的重新发现和重视，这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有针对性推动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核心元素之一。以 2024 年法国奥运会为例：蒙古代表队以其传统服饰作为文化身份的代表形式，令世界瞩目。蒙古所做的，正在逐渐成为世界的未来，并在多极化世界秩序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涉及到 56 个少数民族时，政府支持各民族人口的区域发展，从文化、艺术甚至到时尚方面都得到推动，少数民族可以更容易地进入高校和公共基础设施，以促进他们的发展，也促进了多样性。通过这种方式，党正在增强各民族的特色，并在展览、电影甚至地方上给予支持。今天的中国正促进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发展出更强的文化自信。现代化所包含的物质和文化伦理进步，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手段。中国现代化道路旨在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以人文关怀和人类利益为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一种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对于人民来说，安全感通过 98.62% 的中国人口的安全感指数得以衡量。

这也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过去十年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倡的，并且是中国古老的谚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和坚定的承诺。中国已经成功地走上了一条绿色发展的道路。到第十四个五年计划（2021-2025）结束时，中国计划将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20 年减少 18%，并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高到约 20%。同时，在城市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改革计划旨在通过促进社会事务、农村服务和城市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农村地区将根据代表农民需求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进行生态和宜居化改造。扶贫工作也将进一步加强。这

些发展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巨大机遇，因为新的市场和可能性正在不断涌现。

4.5.2. 第二次对外开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宇宙中只有一个地球，这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不幸的是，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这些危机既有已知的，也有未知的，既有可预见的，也有不可预见的。人类文明是否能度过这些危机，已成为我们必须坚决应对的生存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其积累物质财富，不如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之路，因为我们的未来息息相关。十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回答世界、历史和时代提出的问题：‘人类的未来走向何方？’他的建议为寻找解决方案的世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展现了中国对全球努力的贡献，以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并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更美好的未来。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和所有个人——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必须在逆境中同舟共济，在顺境中同心协力，朝着更大的和谐迈进，共同建设这个我们称之为家的星球。我们应该努力创造一个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并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既基于对当前的观察，也着眼于未来的远见规划。它设定了目标，描绘了路径，并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计划。它关乎全人类的未来和每一个人的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主张与行动》文件，2023年9月。

中国在40年内成功使约8亿人摆脱了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至2023年10月，全球约9.2%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约为7.16亿人。极端贫困意味着这些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2.15美元。然而，仅从财务角度来看，这一标准并不足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衡量。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标准应进行调整，更应该关注那些受贫困影响的人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安全保障和住所，从而即使生活在2.15美元的标准下，他们也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中国成功使 8 亿人摆脱贫困的经验不仅局限于国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今的时代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专业的思维和经验的支持下，中国能够带领世界共同解决贫困问题，即使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

疫情显示出，各国之间的联系紧密，一个国家发生的小事件也可能引发全球连锁反应。它凸显了无论国家大小或影响力如何，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受到影响。因此，所有国家都必须相互关照，在像疫情这样的危机时刻，共同汇聚资源，齐心协力应对共同的挑战。这关乎全球人口的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以及在人类发展的新方向上，实现普遍繁荣的目标。在这个共同的地球上，我们应齐心协力，在发展中取得进步，不论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技术的交流，还是为社会中最弱势群体带来繁荣和关爱。

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中国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的责任与行动。它代表着中国关心世界的责任感，象征着多极世界秩序的大旗。这意味着所有的利益都将被考虑，无论是全球南方还是西方。旧有结构将被打破，新结构将塑造人类社会。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世界社会的矛盾，找到合作和互利的路径，基于共同利益而非对立的立场。

习近平主席首次在 2013 年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一愿景不断得以扩展和深化。在 2015 年联合国大会第 70 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他提出了一个五点建议，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一理念：

1. 我们应当构建平等相待、全面协商、相互理解的伙伴关系。
2. 我们应当营造公正、平等、共担责任、共享利益的安全环境。
3. 我们应当推动开放、创新、包容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

4. 我们应当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和谐、包容、尊重差异的氛围。
5. 我们应当构建以自然母亲和绿色发展为优先的生态系统。

这一理念在习近平主席的后续讲话和国际平台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具体化，包括在 2015 年联合国大会第 70 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该理念强调了全球合作与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呼吁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以确保为所有国家创造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4.5.2.1. 正确处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向其他国家强加意识形态原则并不感兴趣。甚至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肩负着关爱和责任的意识形态外衣。核心仍然是中国文明和中华文化，这又在 56 个民族中得到体现。因此，意识形态的传播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形式，是人民的工具，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旨在实现物质基础。这是一种工具，恰恰与意识形态相反。其核心在于马克思的物质辩证法作为基础。唯一的意识形态或许就是：互相关怀和共情。这是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基本理念。

中共干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层并不感兴趣于向其他国家强加其理想或规定其政府形式或制度构建。他们关注的是物质辩证法的基础，以及如何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带来新的发展。当前世界的状况非常明确：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以及贫富之间，经济强国与资源丰富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中国希望铺平一条道路，以重新定义这些矛盾，并通过新的概念促进双赢合作。关键在于尊重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核心利益，正确处理世界上的矛盾。

这种新的处理世界矛盾的方式通过外交、平等对话、相互尊重利益和双赢合作体现出来。在经济上，不是通过单方面主导的合同进行谈判，而是无论国家的大小或实力如何，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不干涉内政。例如，经过数月的谈判，由中国外

长王毅主持，中国在 2023 年 3 月成功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伊朗重回谈判桌，并在北京达成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该协议包括重新开放大使馆、恢复贸易和安全谈判，以及承诺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7 月 22 日星期二，在中国的斡旋下，包括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内的 14 个巴勒斯坦组织的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了一项声明，承诺结束分裂，加强团结。这两个组织在过去曾争夺巴勒斯坦领土的政治领导权。外长王毅在闭幕日表示，“谈判中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是 14 个派别的和解与团结，其核心结果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全体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代表。”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人类科技和文化交流领域的一项新发展，引领世界走向一个以民族和谐为主导而非对抗的未来乌托邦社会。世界历史的形成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经济利益和世界物质资本的转移。历史表明，这通常通过掠夺、殖民主义以及今天的新殖民主义来实现。过去，在纯粹的经济利益驱动下，西方教会首次引入了意识形态上的装饰。今天，公司掠夺着国家和他们的资源，但现在的意识形态装饰是“人权”，这一概念根据西方的标准进行定义，并随着内政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身份政治是这里的关键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倡议下的未来乌托邦中，贫困将被消除，世界将被连接，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将得到提高。因此，可以将重点放在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条件和推动世界的发展上。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和全体的繁荣。

4.5.2.2. 新丝绸之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

11 年前，即 2013 年 9 月 7 日，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新丝绸之路倡议。习近平主席当时阐述了该倡议的目标，包括政治协调、促进道路联通、自由和无障碍的贸易、货币循环以及在双边层面上“民心相通”的交流。到 2023 年，“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 32 个国际组织和 152 个国家达成了协议。所有协议都是在没有政治条件的情况下自愿达成的，且未影响各成员国的内部政治关系。该项目重点在于经济、政治、

技术，特别是社会合作，甚至包括文化交流与在新世界秩序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

共同在平等基础上，通过双赢合作实现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2017 年，习近平主席进一步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即通过尊重各国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增强所有国家的互联互通。倡议的核心在于通过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无论是在陆地、海洋、空中，还是从线下到线上，都在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多维度的网络。“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各国的平等地位，共享利益，促进政治协调和“民心相通”的交流。

2023 年秋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发布了八本用九种语言编写的书籍。参与研讨会的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前总理、塞尔维亚的前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前总理等国际政要。该书系的主编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这套书籍经过详细分析，成为以下信息的基础，同时结合了多项政府声明、会议参与以及与相关责任人的个人对话。

“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与各国及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沟通与协调项目。例如，在医疗领域，中国创建了“健康丝绸之路”，实施了公共卫生战略，并启动了“公共卫生合作网络”和“热带医学联盟”等平台。2017 年 1 月，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通过健康丝绸之路平台向 153 个国家和 15 个国际组织分发了数百亿件抗疫物资，并向超过 120 个国家提供了 22 亿剂疫苗。

许多欠发达国家既缺乏吸引经济投资者的条件，也缺乏自身的设施和金融资本来独立进行融资。如果没有外部支持，这些国家要实现适当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自“一带一路”倡议（BRI）启

动以来，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地和国际以及私人机构之间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中国的银行，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融资者。每个项目的决策过程都是通过相互协商和合作来进行的，而不是以中国的单方面条件来强加，因此已有 2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选择参与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多种投资方式，如开放式贷款、投资基金、公私合营（PPP）和企业投资。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项目、水资源和食品供应、公共卫生、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对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长期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产出效率的提高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国际组织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丝路基金，以及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私营企业，都是 2021 年中国 2134.8 亿美元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在私营部门，截至 2021 年底，约有 500 家中国企业共计投资了 430.8 亿美元。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经济合作计划，所有参与的国家都是自愿加入并从中受益的。这也意味着经验的交流，中国的经济崛起已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这些国家可以学习中国如何在 40 年内使 8 亿人摆脱贫困，并根据本国的特点加以应用。“一带一路”还引领所有合作伙伴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新时代，并提供技术转让。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参与国家的实际工资将增长 2 至 4 倍。这有助于解决贫困问题，并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同时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在过去的 10 年中，已经建成了如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等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在西方是前所未见的。随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未来的物流项目将逐渐实现自动化并成为现实。即使是偏远地区的地方制造商也能够通过新的结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销售，而不仅限于大型工业。这也意味着市场的自由化，以促进更多的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但这一发展主要体现在西方以外的地区。

2022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发起了新的全球倡议，其中包括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旨在确保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性、全面性和可持续性安全，进而构建一个安全的社会。此外，还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些倡议的核心是构建一个共享责任、安全与发展的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全球健康与地球生命的可持续性。这些倡议的重点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倡议”超越了传统的由某些霸权国家自我定义的民主与自由的意识形态结构。西方的安全利益通常以地缘政治安全为基础，其核心理念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安全往往是以牺牲他国的安全为代价的。因此，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常常被视为不安全和具有风险的，导致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

过去，政治安全理念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胜者通吃”，这一思维主导了旧世界秩序中的所有政治和经济层面。霸权国家被视为拥有所谓的合法主导权。根据“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概念，据称只有通过霸权才能保证稳定，而霸权的改变则意味着不稳定和战争。这种思维仍然停留在冷战的心态中，试图维持现有的霸权世界秩序。康德的“永恒和平”理论提出了在社会、国家和全球层面实现和平的理念。他提出了六项前提条件和三项实现和平的主要条件：1. 建立国际联盟，2. 实现民主国家，3. 推进自由贸易。“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建立全球伙伴关系，推动合作伙伴关系而非联盟关系，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和通过消除壁垒实现的自由化。其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先进、开放、平衡、包容的双赢全球化进程，构建一个具有责任感和共同利益的全球安全社会，以及一个具有共同未来的人类社会。

这些倡议旨在调整和发展现有的障碍，以实现全人类的繁荣。“一带一路”倡议支持改造现有的、过时的结构，转向适应全球

发展的新增长模式。这也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对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和包容持开放态度。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2021 年中欧之间的贸易量位列世界进口和出口的第一和第三位，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13%至 10%。在过去的 10 年中，中国与合作伙伴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总值达到 19.1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6.4%，超过了中国外贸的整体增长率。从 2013 年到 2022 年，中国对合作伙伴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了 2400 亿美元。同时，2022 年与合作伙伴国家签订的项目合同金额为 519 亿美元，占总额的 45%，比前一年增长了 3.4%。在过去的十年里，“一带一路”倡议从“点对点”、“线对线”逐步发展到“网络对网络”和“面对面”。每年都有新的里程碑被设立，改善了不同地区超过 30 亿人的生活质量。据预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到 2030 年每年将使 201,000 人摆脱贫困，并将使全球 760 万人脱离贫困。这一切在没有与西方国家合作的情况下取得的。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经济繁荣将惠及所有国家，并保护环境。全球社会将因此成为一个具有共同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4.5.2.3. 中国的第二次开放作为现代化改革

习近平在 2022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推动高度相关的对外开放。这不仅意味着对外开放，也包括国内的开放。在疫情期间，许多经济合同未能续签，沟通变得困难，导致了许多误解。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几乎没有进行磋商，主要精力集中在疫情应对和共同挑战的解决上。如今，这些后果正在得到弥补，但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改革，为新的经济合作开辟全新的区域。这意味着外国对华投资将逐步简化，进入中国的途径也将变得更加便捷。基础设施障碍将被清除，进入的渠道将更加畅通。习近平指出，“中国将不断扩大在规则、规章、管理和标准方面的制度性开放。”他说，“将努力加快国家向质量供应商的转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的高质量发展，并维护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的多样性和稳定性。”

各省和政府在这一时期也纷纷建立新的合作关系，甚至在吸引外国合作和投资方面相互竞争。新疆的开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23 年 10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了一项关于自由贸易区的新条例，经济和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世界各国可以在这一地区参与建设，转移自己的技术和企业，以实现经济成功。这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新疆在陆路上与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息息相关，特别是那里的资源，如丰富的石油储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新疆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国与阿富汗、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连接枢纽。它也被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地区。新疆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其土地面积占中国领土的六分之一，几乎是法国的三倍大。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自然美景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包括广袤的沙漠、山脉和草原。根据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新疆已开通了 118 条双边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地区与欧洲之间的高速公路已全部贯通，第二条通往哈萨克斯坦的铁路也已完工并投入运营。

截至 8 月底，新疆在中欧（中亚）货运列车线路上已经通过了 70,000 列火车，占全国总量的 57% 以上。今年有 8,024 列国际货运列车从新疆出发，平均年增长率为 50.4%。今年也见证了加强“走出去和邀请进来”的努力。该地区的党员和政府领导人与外国客人举行了多次会晤，接待了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并在多个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为国际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新的空间。新疆的例子标志着中国全境一个新开放进程的启动，这不仅仅影响到新疆，而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大量工业园区和新项目正在兴起，各方都能从中受益，中国政府也在各个方面支持投资者的利益。

第五章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方对全球人类未来的理解与关怀

当今世界对中国在新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甚少，这一进步、变革乃至革命在全球范围内仍广为人知却未被完全理解。尽管进行了多次磋商，外界对中国的雄心壮志及其根本原则仍存在诸多误解。本书旨在帮助解释并澄清这些问题和原则，希望通过这一作品，能让人们从全新的视角看待现代中国，并通过中国的视角来观察世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在 1930 年 5 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

没有知识、深入研究和对问题的深刻理解，人们不应做出决定或判断。仅凭假设或理论推测是不够的。主观或感觉上的“真理”，即使被主流舆论不断重复，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于中国及其雄心的叙述仍在继续主导全球舆论。西方世界的知识基础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时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重塑或媒体在启蒙中的作用依然主导着高校、专家和社会——然而，他们的实际作用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价值。这种结构性的断裂，使得西方世界逐渐成为一个与全球新发展趋势隔绝的孤立世界，其长期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对西方学术界的最大批评在于他们对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缺乏理解。这些叙述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长，西方如果承认自己在对中国的批评中错了，那将与其自认为是人类文明中心和自视优越的大国的傲慢态度不相符。因此，西方保持着自认为的“真理”，并将中国在世界上的行为描述为虚假的，甚至是怀有隐藏意图的。然而，中国的项目和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法律体系、党的所有指导方针以及中国国内所有的学术和媒体信息，都集中于一个目标：与世

界的和谐与和平合作，这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信念。任何其他的企图或言论都是未经仔细研究和错误解释的。中国并不完美，许多行为也遭到了误解，但通过基本的研究，这些误解可以被消除。中国愿意在经过专业磋商后重新考虑其行动路线。

纵观世界历史，强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战争。然而，中国展示了一条和平成功的道路。这意味着，即便西方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采取的攻击方式类似于冷战思维，中国仍排除了与西方对抗的军事因素。西方社会有机会参与并共同塑造“一带一路”倡议，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全球规则。西方有机会为自己的人民开辟新道路，使世界因此繁荣。然而，西方却自我封闭，沉迷于自己的真理和视角之中，无法看到全局。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是元代学者关汉卿的古典诗句，至今深植于中国社会中，揭示了事物的真实本质。最初的印象和偏见往往是错误的。要理解事物的真实本质，需要耐心。将这一古老智慧应用于当前世界的发展，希望西方也能理解中国的雄心。然而，对方的行为表明，他们正通过一切手段试图通过错误的信息和操控大众来阻止这一理解。然而，这不仅不会对中国造成伤害，反而会损害西方自己的人民，使他们无法参与当下的发展，进而脱离未来。其长期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5.1 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利益的核心

在当今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主权和独立，并根据本国人民的优先事项和经济利益推动国家建设。这明确意味着，不应强制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如无限多元性别的认可，而应基于各国的自身文化、原则以及所需物资来发展和转型。所谓的“人权”和“自由民主”往往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旨在为西方的经济优势辩护。来自战乱和贫困国家的人们之所以逃往西方，并非因受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吸引，而是由于西方拥有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基础之所以得以形成，正是因为西方自殖民时代起便将资源剥削作为其政策的核心，并用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来进行辩护。本质上，这关乎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战略。

在合作过程中，西方往往将政治条件和难以满足的要求与不平等的合同捆绑在一起。在合同法的框架下，西方并不考虑建立合作友谊或双赢局面，更不愿承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利益。其真正目的在于以意识形态为幌子，坚定地推进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一意识形态通常被称为“人权”。迄今为止，所有“自由、民主”的殖民地，尤其是在非洲，依然饱受内部冲突和资源剥削的困扰。西方国家更是将制裁作为遏制发展的手段。例如，欧盟威胁对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之间的一条有前景的石油管道项目实施制裁，理由是该项目与气候目标不符。然而，欧盟对此举将剥夺数百万人脱贫和发展的机会毫不在意。这显然是对他国内政的干涉，是由于新的“气候意识形态”而出现的现代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与内部稳定、安全或粮食保障无关。这一点在非洲国家如马里或布基纳法索的黄金开采中尤为明显，这些国家几乎无法控制或影响黄金开采活动，而外国公司几乎完全掌握了其自然资源。这些国家至今依然不稳定，财富却流向了殖民国家如法国或加拿大。

现代殖民主义的特点不再是单纯依靠军事存在或外国军队的残酷压迫，而是通过腐败、企业控制、股东对政府的影响以及物质和金融资源向国外流动来实现，且当地民众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国际法和合同法则被用作辩护工具。

然而，即便是在以改善所有人生活条件为首要任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意识形态教条的争论仍未停息，且这些争论往往缺乏深入的研究。2023 年 4 月，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访问中国。在为期三天的访问中，她与中国外长秦刚进行了公开会谈，许多国际和中国记者也参与了此次采访。在会谈中，贝尔博克提及台湾问题，并批评了“人权和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对此，秦刚明确回应：“中国最不需要的就是西方的教师。”他指出，新疆的主要问题是外部反华势力的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此外，秦外长还强调，中德两国都是理性与思考的国家，因此可以采取建设性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

然而，除了西方的意识形态批评之外，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对外开放也受到了阻碍。西方试图通过阻止外国投资和技术转让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还排斥中国的技术，如在德国电信系统中排除华为设备。为了能够在法律上推行其意识形态利益，西方甚至通过了诸如德国的新《供应链法》这样的法律。2021 年 5 月 20 日，欧盟以涉及中国国内“人权”问题的决议为由，冻结了 2020 年《欧中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谈判。此举看似是为了保护人权，实际上却是为了明确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些决策并非基于专业的研究，而是出于主观的感性判断。西方对阻碍贫困地区的发展、以及因此导致的生命损失毫不在意。他们希望维持全球的贫困现状。

5.1.1. 意识形态比帮助残疾人更重要

与对抗贫困相比，更应关注那些在变革和发展时期往往被忽视的最脆弱的人群：残疾人。由于西方的制裁、脱钩政策以及阻碍合作，残疾人领域的技术转让难以进行，因为在西方看来，意识形态比实际需求更为重要。贫困地区的资源有限，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基本需求，而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引进为残疾人服务的先进技术。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在残疾人事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45 条的规定，公民在年老、患病或残疾时有权利获得国家和社会的物质帮助。国家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以及医疗卫生服务，以确保公民能够行使这一权利。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组织盲人、聋哑人和其他残疾公民的就业、生活和教育。1990 年 12 月 28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并于 2008 年 7 月 1 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进行了修订。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残疾人的法律，也是社会保障领域的首部立法。1994 年 9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例》发布并由国务院实施。2007 年 2 月 14 日，中国国务院第 169 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残疾人就业条例》，并于 200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这些条例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一部分，与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人权议题无关。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主义是保障人民基本需求的主要动力，以确保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改善整个社会的福祉。因此，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忽视了这一点是自相矛盾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感情用事的真理，是荒谬的。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发起的国际项目中，始终将人放在中心位置。

我就残疾人援助主题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并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会议——“一带一路残疾合作主题论坛”。在论坛上，各合作组织和国家展示了在残疾人合作方面的目标和活动。北京市副市长强调，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全人类的繁荣。阿联酋扎耶德高级决策组织秘书长阿卜杜拉·阿尔·胡迈丹先生也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共同建立一个强大的残疾人支持系统。包容性的发展是未来的关键驱动力，它促进了技术、教育和经验的交流。”全面包容意味着开放和建设性的对话。其他非政府组织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CDPF）的发言者也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强大合作。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位代表表示，印尼的 2250 万残疾人将从该项目中受益匪浅，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此外，活动期间还签署了许多非政府组织与哈

萨克斯坦、法国、马来西亚和柬埔寨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尤其是在康复、辅助器具、技术和国际交流领域。

中国共产党现行的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到 2025 年要为残疾人提供更多支持，并显著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43 个中国部委和部门正在合作。原则是：为所有人谋福祉。中国有 8500 万残疾人。相比之下，德国总人口为 8300 万。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22 年 9 月 28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有 255 万身体残疾的女性脱贫，1050 万残疾女性获得了新住房和医疗设施，590 万人获得了新的工作岗位和专业培训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还公布，从 2017 年到 2021 年，905 万残疾人找到了基于技能和知识的新工作，而非依赖体力劳动。此外，过去几十年间还进行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以确保残疾人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保护。例如，《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二条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意味着发展的全面性，不仅城市和大都市区的人们应有更好的生活，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居民也应享有更高的生活质量。这包括为残疾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提供服务和补贴，帮助他们找到工作或创业。目标是为残疾人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体的独特性。残疾人往往从一种其他人无法看到的角度看世界，因此他们对社会的繁荣发展和新的视角的启发至关重要。必须代表他们的利益，确保他们的就业机会，并建立无障碍设施。

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希望通过各层面的交流与合作，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西方对世界开放，并专注于合作，而中国则相对封闭。如今，中国对外开放，致力于合作，而西方则逐渐拒绝合作，甚至对合作加以制裁。然而，西方的无情孤立和制裁最为伤害的正是那些最弱势的人群——残疾人及全球贫困人口的基本人权。因此，我们应质疑，究竟是中国真的有负面意图，还是西方在这里采取了不负责任的行动，通过制裁政

策和单方面的主导地位，损害了联合国所宣称的物质人权，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中国将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发展人权，并反对以人权为借口进行干涉和遏制的行为，中国外长秦刚在 2023 年 1 月 2 日的联合国演讲中表示。中国已经找到了符合时代潮流并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各国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秦刚表示。各国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与合作，反对某些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工具化。西方批评中国的国别人权发展路径，而中国则将国际人权标准解释为优先考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对话可以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更好的水平。尽管西方试图进行教育，但并非所有西方人权理解都排除从中国视角出发的社会支持。通过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点，可以促进人民的发展。

5.1.2 阻碍脱贫与新疆的未来前景

经济战争往往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新疆是对外开放的典范，正是目前研究充分的地方。2024 年初，在国内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德国企业大众和巴斯夫被迫关闭了他们在中国新疆省的工厂，原因是所谓的“人权侵犯”指控。这一决策显然不考虑脱贫战略的破坏，也无视了当地人失去工作甚至生计的事实，德国的政策对此并不关心。

德国政府宗教与世界观自由事务专员弗兰克·施瓦贝（Frank Schwabe，社民党）对《每日镜报》表示，德国企业不应在新疆开展业务，因为“新疆的人权状况‘糟糕且混乱’。”这一声明深刻反映了西方的状况及其对全球现实的理解。决策和判断不是基于扎实的研究，而是基于主观的感觉性真理，甚至是意识形态的真理。这不仅涉及政治、学术，尤其是新闻，还深深影响了社会结构的断裂。所谓“混乱”实际上描述了一种难以掌握全貌或找到方向的状态。这可能是由于信息量大、结构复杂或元素排列混乱造成的。简而言之：关于新疆的信息匮乏，没有经过充分整理，因此盲目地作出了情绪化的决策。而由此在外交、经济和当地人民的层面上造成的损失，这些决策者显然并不关心。这是不负责

任的。这种严重疏忽的做法不仅损害了德国人民的就业和前景，也剥夺了德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机会。例如，大众公司与上海汽车公司（SAIC）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建立了合资企业。为了调查所谓的人权侵犯，大众公司派出了专业的审计员和检查员前往新疆。他们在检查该工厂的工作条件时，报告称没有发现任何强迫劳动的迹象或证据。基金公司联合投资（Union Investment）在 2023 年 12 月仍将大众股票评为可“投资”的可持续性金融产品。同样，巴斯夫公司通过定期的内部和外部审计和尽职调查措施，也未发现任何人权侵犯的证据。然而，在德国，仍有人指责巴斯夫打压维吾尔族人并对他们进行监视。

中国政府过去一直坚决否认这些指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此作出了回应，表示某些政治势力散布了太多关于新疆的谎言，传播了太多虚假信息，其中“种族灭绝”就是这些大谎言之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来，维吾尔族人口从三百多万增长到今天的超过一千二百万。与此同时，新疆各族人民的平均寿命也从 30 岁提高到了 75.6 岁。王毅指出，这些事实是人权保障的最好证明，并强调新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保护。目前，新疆有足够的宗教场所，政府甚至资助了清真寺的修缮和维护工作。

一方面，这个高度敏感的话题确实需要更多的澄清。中国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向世界传达其立场。特别是在存在许多指责的地方，中国需要加强公关工作。中国正在通过对外开放来实现这一目标。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任务，西方学术界也应摒弃旧有叙事，以新的视角看待中国，并且认可审计员或检查员的能力和信​​息。因为即便审计员和他们的报告低于情感真理的标准，长期来看，这场辩论也会走向死胡同。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立场必须得到考虑和分析，否则情感和感受的真理将占据上风。

新疆人民的生活条件只有在企业扩展尽职调查范围而不是关闭工厂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改善。大众和巴斯夫通过其供应链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有助于整体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疆的增

长得益于德国企业的贡献。如果我们的政策真正关注人权状况，并且关心加强德国经济，那就应该推动大众和巴斯夫扩大其影响力。因为通过更多的影响力与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合作，可以积极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这正是整个中国的成功之道。在过去的 40 年里，中国已经使超过 8 亿人脱贫。企业关注地方发展并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恰恰是成功的关键。曾经贫困的人口通过当地的教育机构和大学接受了教育，这些机构教会了他们如何建设地方经济、管理自己以及在私营企业中创业。这是一种通过教育和技术转移来帮助地区发展的扶贫概念。如果这些教育和培训机构被称为劳改营，而没有进行专业调查，那么理性的界限就被超越了。这些指控必须经过专业的调查，责任人应被追究责任。然而，专业审计员显示，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中国的新疆省是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许多媒体声称该地区存在所谓的人权侵犯、强迫劳动甚至种族灭绝。这种媒体策略的目的是反复提出这些指控，直到它们被接受为情感真理。客观、学术和专业的专家意见在这一过程中被尽可能压制——这也适用于审计专家的结论——最终导致当地人民的痛苦。

5.2 主观真理、重新语境化与缺乏能力

无论是扶贫、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众多其他项目，西方的信息系统往往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议程，忽视了这些发展背后的根本原因，同时仍然依赖于冷战时期或霸权思维的旧有基础设施，未能适应多极化世界的变化。当前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从一种特定的视角来传授的。然而，这种视角已经过时，它将抑制西方的发展，扭曲预期，增加风险。这将导致误解和偏见，限制合作，削弱创新能力，并造成信任的丧失。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这将是一场灾难。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中国的古老智慧，出自《周易》。《周易》的成书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 1200 年到公元后 200 年。

欧洲联盟（欧盟）正日益卷入其邻国边界的冲突，尤其是在乌克兰和以色列地区。欧盟内部则面临基础设施问题，文明冲突在难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爆发，社会保障体系负担沉重。能源政策导致产业外迁，进一步加剧了自欧盟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与其着眼于这些关键问题，主导的讨论却集中在边缘问题上，如身份政治、气候变化，甚至是大麻的合法化。缺乏经济愿景、理性的专家以及明确的领导结构，导致难以推动关键合作和纠错机制的建立。相反，全球化的决策层面充斥着各种值得质疑的决策，这些决策往往与民族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这表明，在现代西方，意识形态正在以极端形式复苏，如同上世纪 30 年代的法西斯主义。

欧洲不断恶化的状况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迅速发展、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崛起，以及中国与其合作伙伴国家对新世界规则的日益制定，形成了一个对比鲜明的局面。在多极化的世界中，民族国家、其文化和经济得到了强调，而欧盟却在向一个带有集体意识形态的集体体制演变。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民族国家不会因霸权意识形态而被消灭，因为人们根植于他们的家园。正因这种矛盾，欧洲人无法理解世界向平等共存方向发展的趋势，而旧的殖民思维将成为历史。欧盟担心失去全球影响力，这可能导致不稳定和全球危机。相比之下，中国则看到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崛起，并认为由霸权国家主导、将其标准强加于他国的单极世界已经过时。然而，根本问题在于缺乏相互理解。欧盟及其机构未能关注中国的发展，也未能认清自身的不足。他们主要关注风险，并在所有信息和管理层面，包括学术界、智库和媒体，错误地解读局势。解决近年来这些缺陷，对于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现在关键是回归现实，冷静地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西方所谓的“专家”通常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而中国和其他国家则更多地从自身的非西方视角定义事实 and 标准。双方的主观视角中包含着不同的基本理解。双方在历史上在各自社会中经历了不同的实践和经济发展。对西方有利的东西，未必对其他国家同样有利，特别是在殖民时代，这一点尤为明显。

历史、文化，甚至语言本身都包含着对真理和基本理解的不同解释。西方的专家、智库（如德国的 MERICS）通常通过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和前殖民及霸权国家的身份来感知中国的事件，而很少去核实实际的现场情况，更不用说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了。而中国在历史上，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从未成为一个殖民或霸权国家，反而饱受内外动荡甚至饥荒之苦。因此，不同的优先事项由此产生，如内部的扶贫和外部的独立。此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以及中国文化的视角出发，解释事件或政策时，得出的概念框架也完全不同。中国人民有着不同的主观看法，但他们也有着明确的客观看法，即始终通过事实寻求真理——实事求是。

其次，中国内部的信息流动和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方式也存在根本差异。由于经济的显著发展，在理解社会方面，社会科学领域存在许多空白。这也意味着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未能充分承担起填补这些空白的责任，因而未能消除在相互理解上的误解。当西方专家失误时，中国需要提出新的建议来填补这些空白。中国的唯物辩证法和实践应用方式更倾向于用行动来说话而非言语。然而，如果不对这些行动进行解释，在现代世界和海量的信息积累、误解以及地缘政治利益中，这些行动很容易被误解。这种差异往往被双方所低估，导致了严重的误解。例如，疫情期间法治发展的情况并未得到深入研究。专家们无法深入权衡这些不同的社会现实，导致他们将自己的社会标准强加于其他社会，或依赖于过时的信息。在专家培训方面，缺乏共同标准。因此，并非所有专家都是平等的。

主观的、未经反思的自我解读主导着讨论，尤其是在欧洲，在那里，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自己是专家。一个研究过清朝历史的人可能会被迅速加冕为现代国际政治的中国问题专家，或者一个仅仅学习了中文的人也被视为中国问题专家，这是荒谬的，这样的人无法深入理解复杂的背景。西方的政治家在完全不同的专业背景下做出关于中国的决策，而他们从未进行过有关中国的研究。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导致缺乏同理心。而缺乏专业知识意味着情感上的真理占据上风。

专业知识的匮乏还源于专家们没有在国外学习过，或者不尊重、接受外国的立场。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立场是宣传，这不仅是不尊重的，而且是幼稚的。

为了说明欧盟与中国之间关系的严峻形势及其相互理解，首先必须解释当前的理解状况。以下是一个例子，它是一个所谓的《欧盟-中国关系事实清单》(Factsheet)，发布于2023年12月7日，由欧盟外交事务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该文件中清楚地描述了欧盟-中国关系的现状及其所描绘的问题，以便阐明核心问题。

文件中写道：“欧盟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性对手。然而，由于日益增多的摩擦，欧中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对世界变得不那么开放，并且在国内变得更加压制，同时在国际上采取了更加强势的姿态，诉诸经济胁迫，抵制欧洲商品，并对关键原材料实行出口管制。”

这份事实清单的声明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描述了欧盟对中国的现有立场。第二句概述了当前负面发展的总体原因，第三句则给出了这些发展的具体原因。仔细分析这些表述，“日益增多的摩擦”被描述为第一句中负面发展的原因。这个词语“摩擦”正好指出了欧盟-中国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摩擦意味着困惑，意味着有些事情没有通过信息得以具体和深入理解。如果某些事情未被理解，那么信息提供者、客观专家、政府机构或媒体应该填补这一理解差距，消除摩擦，从而促进所有人的顺畅合作。然而，如第三句所示，这并没有发生。相反，情感上的指责，即情感上的真理，被列举出来。例如，文件声称中国在国内变得更加压制，并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封闭。欧盟将这些感知的“真理”当作“事实”来宣称，其表述之肤浅和与现实的脱节难以衡量，仅仅对比新疆的开放情况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所在。

因此，基于欧洲背景下的官僚个案而形成的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变得更加限制性的这种错误认知，实际上反映了法律体系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意味着发展和变化，无论是在中国境内

还是在周边地区。发展意味着变化，变化则意味着现有的或“旧”的知识可能不再适应当前的现实。因此，更新信息以跟上最新的知识是必要的。然而，专家、欧洲政府或智库往往无法捕捉和理解这些更新，因为他们缺乏法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KPCh）和学术领域的专业知识。他们缺乏对中国现代化的专业理解，并且过于固守冷战时期的旧有教条和意识形态。因此，声称中国引发了“摩擦”，实则是极为肤浅的表现，反映了能力的缺失，并损害了欧盟的能力建设。

由于缺乏关于现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专业人才，“半合格”甚至“自封的非专家”在智库或政府中承担了咨询和指导角色。在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中，缺乏对中国有全面理解的专家。这也意味着缺少实地研究等相关经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议会党团提出的小型质询（Drucksache 20/9815, 2024）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尽管德国的大学和智库（如 MERICS）获得了大量的资助，但却没有研究人员或项目进行中国内部的调查研究。没有资助用于在中国进行的全面研究项目，如博士研究计划。相反，德国政府当前的意图是将中国研究能力发展置于国内。这显然不利于进行实地研究和获取实践经验，更不用说公平接触中国的材料和观点了。此外，德国政府还与受制裁的智库如 MERICS 进行咨询，这些智库传播的内容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清楚地体现了“半合格的专业知识”的典型问题。这严重影响了质量，并加剧了误解。

这些少数例子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基本信息方面存在沟通和理解障碍，这些问题延伸至外交高层，并暴露了整个欧盟系统中信息结构的缺陷以及中国方面可能的解释不足。因此，存在着基础知识的缺口。德国政府试图通过在国内培养中国研究能力来填补这一空白，而非在中国进行实地研究。这是一个错误，因为问题不仅仅涉及中国。关键在于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地研究，并从现实中汲取经验。欧洲不再是世界的霸主。

5.3. 正确处理与西方的矛盾

在所有的冲突中，一个事实是明确的：世界必须向前发展，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当前存在着巨大的信息鸿沟，利益冲突导致了这些矛盾。因此，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必要的。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处理？答案是：正确的信息传递。正如西方无法在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展示其“意识形态”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难以仅通过自身的主观视角来讲述其“故事”。因为各国文化、情感和思维构建方式存在差异，修辞方式也不同。解决矛盾需要一种专业的方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是道家经典《道德经》中老子的一句名言，老子是公元前6世纪的一位哲学家。

专家培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欧洲需要走上一条全新的海外留学之路。西方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经无法满足这一需求；相反，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硕士或博士阶段的学习应当在国外完成，并且所访问国家的教育体系应当注重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培养，以促进相互理解。在中国，这一领域的核心内容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这还包括开拓精神和一个新时代的启蒙运动。西方国家必须勇敢迈出新的一步，在国外培养新一代的专家，并以相互理解的精神为指导。恐惧和傲慢必须成为过去，而好奇心、同情心和对持不同观点的人的尊重应该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也需要中国和其他多极化世界秩序中的国家的合作，准备相应的学习项目，并提供奖学金及其他经济支持。这是一个新的探索时代的需求。

其次，媒体结构必须得到充分利用和扩展。在信息洪流中，不仅要触及特权专家群体，还要触及基层民众和所有社会阶层，以消除误解。然而，西方媒体及其所有者目前似乎正在采取一种与和平、原则及多极化世界新规则背道而驰的策略。他们的行为与重新审视一个国家及其文化的愿望相违背。这也源于他们从自身

角度回答真理的问题。媒体在西方国家的舆论形成中至关重要，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政府层面的结构缺乏透明度，特别是在欧盟，欧洲民主制度中的公民通过选举代表并通过讨论基本上影响了政治方向。如果社会对中国的整体认知是负面的而非中立的，那么合作在基层就会受到阻碍。目前，中国在娱乐产业如好莱坞和 Netflix 以及主流新闻媒体中被负面描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娱乐产业为西方股东（如 Blackrock、Vanguard 等）服务有关。

类似的策略也在各国的主流媒体中应用。如 2024 年 4 月德国公共广播媒体工作人员的最新意见声明所示，国营媒体并不能被完全视为中立。因此，媒体在报道与中国的合作时，往往与其自身利益不符。此外，记者们缺乏对中国的深入知识，无法将那里的事件放在正确的背景下解读。因此，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媒体合作或新媒体构建之路。然而，如上所述，单靠中国的自有媒体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的主观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其他国家的逻辑或思维构建中并不存在，因此需要选择另一种论证和逻辑的方式。中国应与国外的小型现有媒体合作。只要这些媒体提供的是在教育领域的专业、客观报道，这就不构成对内政的干涉。

第三，欧洲基层社会的辩论文化非常活跃。在中国，辩论文化更多地集中在大学的学术层面。即使在基层的民主自我管理中，也总是邀请专家而不仅仅是政治家。因此，中国更多地依赖学术交流或国家间的磋商，以便让专家之间进行交流，而不是半专业人士。然而，这一视角在欧洲的一般认知中被忽视了。如前所述，在中国相关领域，半专业人士占据主导地位。西方的政治情感推动了更强的行动主义和压力，使得精确内容难以得到反思。如果中国能够通过事实和媒体影响政治，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自己的软实力或信息流向政治展示中国的真相，那么反对反华战略的学术对抗将更加强大，并且基于正确理解的新合作机会将大量涌现。实际上，关于中国的信息在学校、大学、企业和新媒体中的传播将激发更广泛的讨论，并推动关于其他国家的讨论。

所有这些挑战有一个共同点：信息流。基本信息没有得到有效地生成、传播，也没有到达基层或决策者，尤其是在欧中关系的背景下。相反，明确持有负面立场的信息传播者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必须创建新的结构，并照亮新的视角，以消除误解。由于当前欧中关系处于严重危机之中，每天都有如以色列战争这样的新情况震撼世界，时间因素变得尤为重要。必须找到长期的解决方案，但也必须找到短期的解决方案，以停止附带损害。否则，一种不可阻挡的恶性循环将会出现。

在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其他众多倡议，表明自己已经成为全球政治发展的新发起者。这自然也包括经济发展和贸易，长期以来，这些因素已经推动了中国自身、邻国，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然而，随着自身的发展和这些倡议的推进，新时代也要求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尤其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在国际上重新定位自己，特别是在信息传播领域。重新定位和承担责任意味着中国必须对外提供透明度，并传递内部信息处理和立场建设的结构。内部发生的事情为外部发展提供了洞见。中国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世界可以向中国学习。例如，中国不仅应停留在自身立场上，而应解释这些立场。尤其是在新疆或台湾等敏感话题上，需要向世界传递更多的解释、定义和信息，而不是忽略这些问题。中国尊重其他国家的国际主权，因此不会干涉内政。但在与西方的沟通中，这些内部事务以及外部经济政策对于理解至关重要。语言、文化、历史甚至政治制度都有所不同。因此，基于缺乏知识的偏见很容易产生。在语言本身、在交流中，使用的术语也可能在各文化中不为人知。例如“互相理解”、“心连心交流”或“共赢合作”等中国术语在世界通用语言中并不常见。在讲故事或在如德国这样一个非常逻辑和精确的语言环境中进行沟通时，有必要基于社会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背景进行逻辑的定义和讲述。这也是区分真正专家与半专家的关键。艺术在于客观和中立地展现政治和历史，使得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不会将其视为亲华宣传，而是视为足够有趣和有说服力的事实，从而使群众能够接受和内化。讲故事和塑造国家政治形象正

是其中的关键。没有深刻的修辞学专业知识，正如法学家所具备的那样，只有少数人能够熟悉这种修辞的强度和质量。特别是如果没有与中国友好媒体甚至西方媒体的合作，中国媒体几乎无法达到这一目标。

最终，媒体的角色，尤其是新媒体和人工智能在未来媒体中的角色，将变得高度相关。人工智能将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正如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一样。世界的所有领域都将受到影响，但像聊天机器人这样的人工智能通常带有特定的政治议程，并以编程国的思维角度来描述世界。由于世界的互联互通，因此将人工智能进行连接，使其能够在考虑到不同国际视角的情况下，纳入多元观点，变得尤为重要。这不仅适用于西方国家，也适用于全球南方国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相互学习。

第六章

卡尔·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所创造的，是一场改革人类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运动的开端。这是对明天的世界应当如何发展以及人类如何进步的回答。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工具，这意味着了解、理解经济发展，并以其事实为基础推动人类的变革。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发展和实践以多种方式得以实现。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一条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应该学习和必须学习的道路，以便在当前世界发展中找到答案，即如何实现世界的和平、和谐与人民的发展。

6.1. 关于现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正确应用

在新时代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的工具加以运用，需要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世界的总体形势进行深入理解。尽管世界正在朝着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发展，各国的利益根据各自的文化和内政状况进行调整，但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是不可阻挡的。正确运用这种经济联系，可以消除贫困，促进共同的经济目标，实现尊重的文化交流。然而，这种发展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分析能力有深入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具备经济学的素养。现代左翼思潮以及西方和全球范围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基于法兰克福学派。同样，那些依赖斯大林或列宁基础的人也不应被意识形态所蒙蔽，而忽视全球的发展。2024年已经不是1900年。世界的复杂性已经达到了一个个体或单一的国家共产主义运动无法通过没有专家知识的情况下完全掌握的地步。更为必要的是，世界各地的同志们应当接受人民的心声和利益，团结所有阶级，共同应对新的挑战和发展，并且更进一步，达到人类文明的新形式。

如果新的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政府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现有体系，并试图在复杂的世界中实施重新解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那么这是幼稚的，明显违背人民利益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甚至类似内战的状态导致国家的不稳定，显然不符合人类的利益。这样的做法不仅会导致现代经济体系在国内崩溃，还会危及国际供应链和合作。全球经济不稳定影响所有国家，而不仅仅限于某些国家。这种动荡的影响难以估量，尤其对那些原本就拥有最少财富的普通民众造成伤害。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必须考虑到人民的需求和愿望，并通过和平方式发展一种以人为本的政治新方法。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自二战以来经历了无数挑战，以确保他们的家庭能够过上好生活，从而巩固了中产阶级。然而，即使是中产阶级也正面临日益加剧的贫困威胁，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冲突将世界推向了其最大危机之一，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世界大战。变革是必要的，只有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带来这种变革。

要求退出北约并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排他性合作，这既不现实，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意愿。即使是俄罗斯或中国本身，也希望合作而不是对抗，希望打破过去冷战的思维模式。同样，单纯与美国结盟，并充当其附庸国的做法也是荒谬的。在新的多极世界秩序中，必须考虑到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这意味着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性，以及对每个国家的尊重。

同样，必须尊重国家文化。这意味着在新时代必须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开展贸易、和平与合作。这需要相互理解。共产主义者应当支持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并施加压力，以促使政治或地缘政治利益的改变。这并不一定需要导致可能引发不稳定的根本性变革。如果德国是北约成员国，通过斗争退出北约可能是一条正当的途径，但可能并不是消除世界矛盾的最佳方式。相反，应该着手推动内部变革，并以战略性的智慧应对现有局势。北约及其他联盟组织必须从内部进行改革，各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共产主义者应在其中担任领导角色，凝聚人民的利益。

因此，问题是：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在当今世界，经典的阶级结构早已过时，国家结构因少数国家的霸权而被严重削弱。现代世界的君主或殖民统治者不再公开出现，而是隐藏在幕后。像贝莱德（BlackRock）或先锋集团（Vanguard）这样的巨型金融垄断集团的股东被许多批评者视为世界的真正掌权者。然而，即使是这种看法也不够深入，因为那些在幕后下达指令、进行腐败或可能拥有其他国家领导人把柄的人往往隐藏在黑暗中。对他们来说，公开露面并因此面临生命危险是极其不谨慎的。此外，除了这些股东或隐秘的君主外，社会工程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媒体被用作工具，甚至将外国军事占领描绘为保护国家的正当行为。如果像德国或韩国这样的国家自二战以来或自朝鲜战争以来一直有美军驻扎，这就需要进行严肃的审视。第三，一些政客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违背国家利益行事。乌克兰战争表明，像能源这样的关键资源被德国政府放弃，以优先考虑意识形态目标。

因此，内部敌人包括这些股东、驻扎的外国军队、被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结构以及那些违背国家利益的政客。这些众多的敌对因素阻碍了国家、人类以及创新和变革的发展。在危机时期，显然，控制权力比考虑人民的利益更为重要。同样，新左派也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通过推动自由化和个性化的道路来反对家庭、安全或整个民族的经济利益，只为追求意识形态目标。

作为人民的朋友，应该认真审视那些推动国家发展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工人、政治家、学者和爱国精英。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仍有许多德国企业家坚信，他们能够推动德国前进。无论文化背景如何，许多人每天都为德国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关键在于那些维持并发展德国国内物质资源和经济的人们，不应过于关注他们所属的党派或团体，而是应致力于保障人民的物质基本需求。共产主义者应当支持这些爱国力量。在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合作的路径应当相应调整；这一点将在下一个章节中详细探讨。此外，还不应忘记，海外有大量的民族爱国者和同志存在。这些德国人因国内糟糕的国家结构被迫流亡国外，或者因担心在法律层面上遭受严重打压而不得不离开。他们在政治正确、言论禁止、疫情期间或乌克兰战争中的新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下被迫沉默，但他们始终保持德国人的身份，依然希望改善人民的物质利益。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识别谁是国家的敌人，谁是国家的朋友。然而，在新时代，敌人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国家内部，消除敌人或与之斗争变得异常困难。政治条件极其复杂。因此，基于中国历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训与经验，必须将这些经验和认识应用于现代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关键在于如何在人民中妥善处理矛盾，推动合作与双赢局面，而非相互斗争，并团结所有阶级和群体。与此同时，也需要与朋友合作，让敌人承担更多责任，直面问题。正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共同作战一样，现代世界中的西方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需要合作，以改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生活条件。同时，旧有的关于权力关系的思维模式，以及对敌人的积极打击或消灭的做法，都需要重新

审视，因为这些做法可能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动荡，因此必须在新的合作光芒下重新考虑：为了人民的新合作。

因此，必须采取关键步骤，以便在新时代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引入改革，从而纠正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这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过程。然而，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优势在于，如今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中国的渐进式发展可以根据现代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进行调整，并结合各自的国家特色。例如，这可能表现为具有德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

6.2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新时代，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更新思维，重塑政党，完全致力于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追求文化利益，并将安全置于首位。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基本机制：

1. 团结所有阶级，而非阶级斗争

首要的概念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团结各阶级和结构。在西方所有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对富人征收更高税收”等传统观念依然存在。民众担心这会伤害那些勤奋工作、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从而成为高收入者的人群，因为他们的上升潜力可能会因共产主义运动而受到影响。这种上升机会被情感上认为是受到攻击。将国家的高收入者视为敌人并与之斗争是一个错误。这种做法必然会引发对抗，即与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不平衡且片面的。相反，关键在于让国家的精英和高收入者与共产主义者站在同一战线，共同奋斗。富人也有他们的担忧、家庭，甚至对他们的企业和国家的责任。他们是利益的参与者，必须履行这份责任。

因此，共产主义者需要找到合作和双赢的道路。这意味着必须促进相互尊重和理解。可以设想三条路径：第一，通过共产主义者的倡议，精英们需要走向公众，展现自我；第二，他们必须在

公共利益上表现出更多的参与度，共产主义者需要更多地将他们纳入其中，并保护他们的利益。当人们站在公众视野中，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时，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和政治观点都会被公开，他们的影响力也会变得显而易见。通过这种方式，权力和控制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精英的行为及其政治立场将变得透明。如果他们的行为对人民不利，人民会通过抵制或类似措施作出反应。其次，他们的责任感、国家意识甚至生活意义都会增强。如果他们将资金投入当地基础设施中，而不是被征收更高的税收，他们在民众中的声誉也会提高。以埃隆·马斯克为例，他通过自己的活动以及作为勤奋工作和创新的象征，甚至被视为英雄。这意味着要通过企业家的象征力量引导研究和经济计划进入新时代，同时将公共利益置于中心。这也意味着他们作为民众权威的责任地位和行为必须得到明确表明。在当今世界，公众和新媒体是一个重要的权力工具和人民的控制机构。总体而言，这意味着新的立法倡议必须来自于那些不会增加人们之间壁垒的同志，而是促进双赢合作的立法倡议。

2. 作为分析工具和工具的卡尔·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其次，必须在新时代将卡尔·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教育引入现代共产主义者的思维和分析方法中。这意味着关注的是全体人民的经济利益，而非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关注经济的发展，保障家庭、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安全。关键在于让所有阶级的人都能赚钱，并减少人民内部的矛盾。与其斗争，不如培养对持不同观点者的同理心，通过专业知识进行斗争。重点必须放在国家文化上，在国际层面上，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以防止剥削，并通过双赢帮助国家建设自己的经济。

3. 专业知识而非情绪化的激进主义

现代世界是复杂的，人类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由于这种高度的复杂性，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支持那些可以成为国家引路人的专家。这些专家，无论是技术人员、生物学家、学者还是企业高管，

都应带来创新的思想。在各个层面和政府机构，甚至在学术界，情绪化的“真理”和伪专家太过盛行，以至于他们因自己的洗脑而无法看到真相。共产主义者必须将所有这些人纳入对话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并在各个层面上成为人民的领导者。如果一位同志自身没有所需的资格，他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支持专家，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帮助组织活动或其他工作。关键在于，在志愿基础上为国家的所有专家提供更大的影响力和声音，以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物质基础，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在新时代，专家将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意味着共产主义者必须找到自己的新培养方式，例如在国外学习。他们是新时代的先锋，必须具备权威和榜样作用。我们代表制民主中，不应再是通过关系上位，而是通过他们的素质。与其进行情绪化的辩论，不如让同志们通过扎实的研究和知识主导学术界、报纸文章甚至社交媒体的讨论。这意味着干部培训、专家培训和注重勤奋。这并不是要比人民“更懂”，更不是要告诉别人该怎么做。而是要成为一个榜样，首先自我约束。重要的是倾听人民的声音，从他们身上学习，并为他们服务。

4. 人才培养与以人为本

另一个重要的核心要素是以人为本和人才培养。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必须作为启迪智慧的先锋，并将自己发展为专家，无论他们的职业背景如何。无论是邮局的工作人员、实验室的女性还是企业的负责人，他们都必须成为国家的优秀代表。我称之为“一人为百人工作”的概念。过去几十年在西方的斗争表明，共产主义者没有财力，并且由于与新左派的激烈争斗以及主流和虚假信息的挑战，必须以完全志愿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这需要巨大的力量 and 精力，尤其是当同时考虑到自己的家庭和安全时。因此，重要的是超越自我设限，在跨越文化和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展示不懈的努力。作为“一人军队”，要为百人工作，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成为国家的榜样，成为人民尊敬的人物。这也意味着关心和支持他人。共产主义者必须成为国家的榜样，以纪律和自我批评为标志。他们必须成为年轻一代的先锋，领导国家的发展和重建。他们必须在别人没有答案的地方提供答案。这也意味着

学习学术工具，与国外和世界进行比较。这种勤奋还意味着支持其他同志，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而是为共同的事业服务。目标是加强党、运动和团队，从而正确解决国家中的问题，解决矛盾并承担责任。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和消费新闻媒体是不够的，而是要打破思维定式，与世界各地的政党和人民达成共识。人民必须成为国内的中心，通过物质辩证法消除法兰克福学派造成的心理疾病的影响。

5. 新时代的国家认同发展

为了赢得人民的心，共产主义者必须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而人民并不意味着那些由好莱坞和其他媒体作品创造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人民意味着家乡，经济条件塑造了文化和国家的地方，也是人民的心脏。共产主义者必须促进国家认同，重新点燃国家的自豪感。这也意味着保持历史的活力。当谈到文化时，不仅现代文化重要，所有时代的文化都同样重要。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文化活动，例如中世纪节日或其他传统活动，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拥有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小企业并促进民族时尚。当人们想到德国时，许多人会想到巴伐利亚文化和皮裤。但德国文化远不止于此。所有地区都必须能够恢复他们的区域文化，当地的面包师、教堂或当地的啤酒厂都必须焕发新的国家光彩。诗人和思想家、工程师和新创新者必须得到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尤其是在新时代的多极世界秩序中。与资本主义带来的疏离感相对，必须恢复与邻居、面包师甚至购买产品的个人联系，恢复对家乡、质量乃至艺术的依恋。

6. 共产主义政党与运动

在新时代，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发展和传播，以及他们之间的网络联系，必须得到建立和加强。没有纪律和安全，自由是不存在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与其他政党和结构，甚至与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内部的共同敌人，并承担新的责任。新左派永远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但那些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斯大林主

义或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时代有潜力发展壮大。应该考虑联盟的可能性。意识形态的建设至关重要；机会主义是敌人。与其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不如尊重人民的基本需求。尤其是在文化冲突的时代，必须通过技术和国家来保障安全，并保持纪律和公共秩序。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成为榜样，绝不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因素。他们必须努力工作，自己成为精英。共同努力，网络联系至关重要。必须贴近人民，利用信息传播的工具，并不仅仅是代表人民，而是真正成为人民和人民专家。

7. 多极世界与国际运动

共产主义者不应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或对其进行评判。没有专业研究和专业知识的批评只是激进主义，是不专业的；它损害了共产主义事业。因此，共产主义者应该作为国际专家参与对话，通过与各国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或安全。在新时代，还涉及到连接性、人民之间的交流、心与心的交流，以及对所有阶级、民族和人民的尊重与同情。共产主义者必须环游世界，学习并从世界各地的人民那里汲取经验，以共同塑造未来。他们应该在中国、朝鲜、整个非洲、中东甚至美国学习，深入了解国家利益，引导国家实现共赢局面并进行变革。与其剥削资源，不如寻找让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和国家共同受益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某些精英受益。但同样重要的是在现场建立网络，见到其他同志，共同设定目标，并将勤奋、纪律和努力工作付诸实践。这是关于彼此的关爱、同情心和对主权及国家利益的相互尊重。目标是在新世界中实现和谐、和平与经济合作。

8. 为国家的经济愿景开创者

最终，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是将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历史可以重演，他们现在是全球经济合作的倡导者，旨在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条件。

“历史总是重复的，如同四季更替”（历史总是重复的，如同四季更替）- 老子

这个认识强调了研究历史的必要性。共产主义者必须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识别出国家在何时达到了最佳状态，以便从中学习，并可能重新焕发那个时代。例如，德国的汉萨城市曾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在当今时代，恢复这些古老的汉萨城市可能会带来新的经济繁荣，塑造未来的几十年，甚至下一个世纪。共产主义者必须推动发展——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在这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对于确保原材料供应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企业的部分私有化。通过这种方式，只要共产主义者拥有影响力，国家就可以在持有公司股份的同时，将风险降到最低。与此同时，可以确保企业不会将其垄断力量转而对付人民。这涉及对人民的责任，但同时也是双赢的，因为在自由市场上，创新的自由和灵活性将得到保持。

9. 人工智能发展下的马克思主义未来

人工智能将在新时代塑造世界的未来。在新时代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人工智能显著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不可忽视的是，人工智能是由人类编程的，而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背景。尽管人工智能可以被视为专家，但它在传播特定意识形态方面也具有明确的社会工程意图。因此，重要的是在城市发展、工作条件的改善和预期寿命的延长等所有领域中，与同志们合作使用人工智能，并成为其使用的专家。同志们是专家，结合人工智能，可以完全实现“一人军队”的概念。他们可以在不同维度上执行任务，以接触并服务于人民。世界变得越来越互联，这加强了信息和技术的交流。共产主义者将与人工智能一道巩固他们的地位，并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10. 思维建设与社会工程

最后一个重要特点必须基于社会工程领域的最新发现。同志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由于各自国家的教育体系而导致的思维局限必须得到克服。逻辑、世界观以及他们所看到的是否真的是真实的，必须伴随着批判性思维，尤其是自我批评。除了生命意义的问题，同志们的抱负应该在于通过为人民谋福利而获得意义。几千年来，我们通过体育运动学到，身体的界限可以很快被打破；而可行性的界限只存在于思想中。同样，这也适用于我们心理和精神力量的发展。我们有能力自我编程，克服精神上的限制，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发展我们的才能。每一项才能和技能的发挥都将为社会做出宝贵贡献。因为最终，这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人民

